



尺度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自身有长短的东西才可以去权衡别的东西的轻重；同样也只有自身有价值的货币才可以测度别的商品的价值。如果物产证券论者不愿意承认“秤可以量长短，尺可以秤轻重”的无稽之谈，那么也只好承认物产证券的货币论是同样的无稽之谈。

所以，物产证券论者对于这一点后来不得不做了相当让步。根据太原物产证券研究会复《申报月刊》的信中说：物产证券“仍以现有之元为单位……依现有市场之价格，以定物产证券与百物之比价”。或者说，物产证券的“尺度单位仍应沿用以往货币七钱二分之银元单位，其名称仍应称为元角分厘”。不过“一经规定与银元永远脱离，不因银价之涨落而生变动”^①。如此说来，物产证券论者仍旧不得不借重银元来做尺度价值的工具，在这一点上，物产证券正与发行纸币相类似了。

但是商品价值既然是劳动量来规定的，那么物产证券正可以如俞寰澄先生所说的直接用劳动时间来做计算单位了，例如他提倡“发行半工、一工、双工、五工、十工之证券”^②。关于这一点太原物产证券研究会曾加以驳复过了，不过还不充分。

不能以工作时间直接来表示物品价格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私的劳动和社会劳动之矛盾，在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矛盾。两样东西一定要具有同样的性质才可以相比较。商品之所以能够交换，因为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社会的抽象劳动。但是在商品社会中社会的抽象劳动不经过交换不能直接体现出来。而每个具体的私的劳动却有形式、复杂程度和生产率大小之不同，同

① 《益世报》，1935年2月21日。

② 《申报月刊》，1935，4（1），81页。



时每个商品是许多生产部门中许多职业不同的劳动者所创造成的，所以在商品社会中绝对没有可能计算每个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我们说1条牛值5担谷，这样是表示1条牛和5担谷包含同量的社会的抽象劳动；但实际上它们所包含的私的具体劳动是可以完全不相等的。

我们在前面用过物产证券“发明者”这名称。但事实上这种思想是许多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早已发表过的。“物产证券”实际上便是格策和欧文的“劳动证券”之变形，“公营商场”实际上也就是欧文的特设商场。“劳动证券”和“特设商场”之失败是对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实际的批评。

我们读完了物产证券的理论，倒并不佩服阎锡山能够“复活”前数世纪的西欧的乌托邦思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绥靖主任正忙着料理许多军政事务，翻古书抄文章自有许多秘书官和清客们替他做。我们佩服他的，是他常能够把这种“美丽的”思想同他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在前数年（民国22、23年）因乡村金融恐慌，银根紧急的时候，在山西曾以田产作抵，发行了一种“土地合作券”，用作抵债付款等用途，结果因发兑者不能兑现而失败了。如今又在“新的”理论掩护下想发行“物产证券”了，可惜这理论被迟发现了几天，否则1931年内战时，山西省银行的纸币政策也可以得到一个绝好的理论根据了。



两个世界中的乌克兰农村*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乌克兰的大部分是沙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有一小部分为奥国的殖民地）。它同白俄罗斯、波兰、和沿波罗的海的其他国度都被称为小俄罗斯。十月革命以后，在东部的乌克兰，成立了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并加入苏联，成为后者的分子；西部乌克兰就被并入波兰的版图，实际上是成了后者的属地，由小俄罗斯而变成小波兰了。

所以，把东、西两部分的乌克兰的社会经济现状对照一下，正可以显出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的优劣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主要是讲这两个世界中的乌克兰的农村经济，但是为明了整个景象起见，先谈一谈一般的经济状况。

据波兰的财政部长克维脱谷夫斯基说，如今波兰的工业生产量只有1928年～1929年间的60%。据国联统计局的材料，如今波兰的石炭产量只有1929年的60%。全波兰的失业工人大约有100万左右。在有些工业部门中，失业工人占全体工人队伍的半数左右。此外局部的失业工人，占到全体在业工人的33.2%（这还是不大完全的统计）。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6，2（4）。



在波兰，劳动大众的经济地位，随着一般经济状况的衰落，而一天天地恶劣起来；剥削率是一天天地增加起来。譬如在石炭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在最近二三年间增加了45%，可是在同一期间，工资反而减低了40%。在有些产业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可是工资往往减少了一半左右。例如在华沙的瓦斯工厂中，生产率已增加了150%，而工资反减低了一半。

据波兰一位政论家说，就是在1927年~1929年的经济繁荣时期，波兰工人的生活程度也只有中等生活程度的82%。

西部乌克兰的劳动大众的生活状况当然是愈加恶劣了，因为波兰的地主资本家们，本来就把这里的人民当做殖民地奴隶看待的。例如西部乌克兰的乡村雇工的工资，在1932年~1933年间，比波兰其他地方要低贱24.7%。在5年以内，波兰的平均工资是减低了51.4%，西部乌克兰的工资是减低了55.3%。

在整个波兰，尤其是在西部乌克兰，农村经济是在崩溃过程中。在1929年间，波兰的裸麦收获面积有579.8万公顷，但是在1934年间，只有567.1万公顷了。1934年间波兰的小麦耕种面积，比1931年差不多要减少10%左右。同时，波兰的畜养事业也在逐渐衰落，例如马匹的数目在1934年比1931年要减少36.4万头，在同一期间，牛的只数减少了54.9万头。波兰全国农业人口的总购买力，在1928年~1929年间为37亿“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但在1933年~1934年间只有8亿“兹罗提”了。

在波兰乡村中，农业机器和肥料之应用也是在一年年地减少着。据波兰景气研究所的材料，农业机械的使用数，如以1928年为100，则1929年为76.2，1930年为33.9，1931年为21.8，



1933 年为 10.2。

在西部乌克兰农村经济的情况是愈加恶劣，一般劳动大众的生活也愈加困苦，因为波兰的地主们对于那里的农民是剥削得愈加苛刻了。1934 年间，西部乌克兰的收获量比 1933 年要低 50%。西部乌克兰的乡民出卖自己的农产品的时候，比波兰其他各地的农民，被迫着取得更少的报酬，只因为他们是殖民地国度的西部乌克兰的农民；在波兰地主的心目中，他们都是该倒霉的奴隶和贱民。在 1934 年 4 月间，西部乌克兰的农产品的市价比波兰其他各地小麦低 4.5%，大麦低 10.3%，乳牛和牛奶低 20%，耕马和鸡蛋低 30%。

但是西部乌克兰的农民，在购买工业产品的时候被迫着要支付更高的代价。在伏留尼地方，煤的价格要比波兰各城市贵 40%。化学肥料也贵 40%。虽则所有的产盐区域都在西部乌克兰，但是盐的价格在那里反比波兰其他地方贵。

波兰和西部乌克兰的农民的收入是减少了，但是他们的负担反而增加了。在最近 3 年之间，波兰的土地税一共增加了 35%。在波兰一共有 100 多种税捐名目；这些税收有一大部分是被土地资本家拿去弥补他们在危机中的损失的，其余有一大部分就是拿去维持那些庞大的官僚机关和警察军队的。而这些机关和武装队伍的任务，就是在于永远维持波兰和西部乌克兰的劳动大众的奴隶地位，是在于镇压这些奴隶的反抗，是在于准备反苏联战争（波兰帝国主义是天天在梦想着并吞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呢）。

波兰的反动政府的土地政策，促成了一般农家的债务的增加。据 1933 年的统计，每 1 公顷的田产，平均负债 393 兹罗提。农民之失去土地是波兰全国乡村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种失去



的过程在西部乌克兰是更加显明。在西部乌克兰出卖的田产中间，有63%都是半公顷以下的田块；这都是在波兰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殖民地政策下，破产了的贫农们的田地。

前任波兰财政部长马都舍夫斯基在去年10月7日的《波兰日报》上写道：

“不仅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依照着旧有的贵族的习惯，建立在赋役制劳动上面的，——建立国家机关，我们是有权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我们的工业，我们的文明，以至于我们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赋役制劳动上面的。从前的田里鞭打农奴的皮鞭，和我们现在的税则，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税则也同样的要农民榨出最后一滴血汗来之后，才能使他们的菜汤里有一点盐味。”

事实上，这真是道地的赋役制劳动：据约略的估计，波兰农民，每年总共要供给3 000万工作日的强制劳动。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劳役制的劳动：即农民因为享用牧场、燃料和借款等关系，需要在地主和富农庄上当劳役。在西部乌克兰的许多地方，贫农们每年在最农忙的时候，要帮地主、富农当15天劳役，甚至有些农家在一年内要为地主、富农当50天~60天的劳役。

在这种重重剥削之下的西部乌克兰农民，物质精神生活当然是不堪设想的了。财政部长克维脱谷夫斯基曾经在去年10月26日的《波兰日报》上写道：

“在我们的政治上结合成的国家中，从经济的观点看来，可以分为两个国家……这是以维斯杜拉河为界的。在这条河以西是一个国家，这国家从产业发展、经济结构和消费能力的观点



上看来是与西欧相接近的。但是在这条河以东，还有一个国家，这国家是什么也不消费的。”

在维斯杜拉河以东的这个国家便是西部白俄罗斯和西部乌克兰，即是波兰的地主资本家们所视为自己的属地小波兰。这属地在波兰帝国主义的十余年的统治下，已经弄到“什么也不消费的”地步了。说得明白些，就是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的农民已经完全失去了购买能力，已经不能成为波兰资本家的销货场所，因此连财政部长也不得不着急起来了。

在这种经济衰退的状况下，又在波兰帝国主义的一贯的殖民地愚民政策下，西部乌克兰的文化也在一天复一天地没落下去。在1933年~1934年间，在波兰高级教育机关的学生中，乌克兰人只占4.4%，在奥帝国主义统治时代，在尔伏(Lwow)大学生中，设立有乌克兰部，但是自从被波兰占领以后，就被取消了。据官家报告，西部乌克兰的乌克兰小学，在1918年，有3 662所；在1923年，有3 027所；在1925年，有1 055所；1928年，有774所，到1935年，只剩了458所了。而且在事实上，在这些“乌克兰”小学中，有许多功课是用波兰文教的。在西部乌克兰人民中，有50%是文盲。

我们从前面的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西部乌克兰，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国度。如今我们看一看另一个世界中的乌克兰。

我们在前面讲到西部乌克兰的时候，有时只应用了一般的数字，而没有注明都市和乡村的区别。但是要知道，整个西部乌克兰便是一个大乡村，工业几乎是不存在的，同时在波兰资本家的计划中也永远不想在这小波兰开发什么工业。



但是东部的乌克兰——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却是苏联的一个重要工业区域，是苏联的重工业和开采工业的基础。在这里，要把每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额统统列举出来是太累赘了，而且也没有这必要。我们只举出两个事实来，便足以显示这里的工业发达状况：在1935年，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五金工场所生产的生铁比法、意、波、捷克四国的总产量还多出100万吨左右；所生产的钢比日本全国的生产额要多出150万吨。在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失业工人是没有了，而且经常从邻国（特别是德国、波兰等）招聘许多熟练工人去帮忙。工人大众的生活是天天在改善着。

如今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农村已是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国立农场的农村了，小的零细的私人经营差不多已经完全绝迹。田间工作的大部分已经机械化，因此生产力也已经提高。1935年间，苏维埃乌克兰的谷物总收获有10.17亿普特，每公顷的平均收获量有8.7肯脱尔（Quintal=112磅）。虽则去年的天时很不好，但糖萝卜的每公顷平均收获量达到了135肯脱尔。在畜养业方面也有很快的发展。去年间牛的只数增加了23.9%，小牛的只数增加43.7万只。猪的数目增加了59%，母猪的数目增加了61%。在1936年的计划中，预备把乌克兰的谷类的收获量增加30%，使糖萝卜的收获量增加53%（每1公顷产207肯脱尔）。

在西部乌克兰，农民是在债务和税捐的重重压迫下。但是苏维埃的乌克兰，不仅免除了集体农场的许多税捐负担，而且连集体农场欠政府的债务（或是借的现款，或是赊购的机器农具和肥料等），都被勾销掉了。仅在1934年1年之内，在苏维埃乌克兰境内政府所取消的集体农场的债务便有8500万卢布。



随着物质生活之改善，农民的文化生活也发展了。在苏维埃乌克兰境内，所有学校都是用乌克兰的民族语言文字教授的。在这里没有一个乡村没有学校，如今在大多数的集体农场中，而且已经设立了自己的托儿所和幼稚园。在乡村中，文盲是早已扫除尽了。在以前帝俄统治时代的乌克兰农民，和现今波兰帝国主义所统治下的西部乌克兰的农民，要到地主贵族的别庄和疗养院里去做个当差的都挨不到（地主贵族是不要粗野的种田人服侍的），若说是一个农民要想到这些地方来休养享福，那简直是说都说不上去了（如果真有一个做这样的想头，那一定要被人疑心是疯子），但是如今苏联的乌克兰，所有以前的皇室贵族的行宫别墅，和许多新起的建筑，都成了工农大众的疗养院和休养所。许多集体农场并且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休养所；在这里享福的人就是以前想做当差的还挨不上的“粗人”。

这些“粗人”便是今天的苏维埃乌克兰的主人。工厂、矿山、铁道、土地、农场——总之，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已经不是为资本家、地主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着了。劳动已经不是生活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而做的工作，而是成了生活中所不可缺少的运动，成了一种轻快的娱乐。所以，劳动的生产率也自然就增加起来了。

如今，风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源地便是在乌克兰，斯达汉诺夫本人是乌克兰煤矿中的一个掘煤工人，他使每个掘煤工人的产煤量增加了十数倍。这运动中的另一位英雄便是乌克兰铁道的司机员克里望诺司，他使普通的货车上的机关车，行驶得同客车一个样的快；这运动中再有一位女英雄叫玛利·台姆钦谷，便是乌克兰集体农场上面的一个农妇，她用科学的方法使糖萝卜的产量打破了世界上的一切纪录。前面说的，1936年



乌克兰糖萝卜产量增加 53% 的计划，大半便是以这位女英雄的经验为基础的。

波兰的《刚涅兹库峡甫司基》报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苏维埃种植场上的空前纪录》。这篇文章中有一段写道：

“如果是一个熟练的工人，如铁匠、铜匠或车床匠等，能够把自己的劳动生产力增加两三倍，那还是可以想得明白的事情。因为这些熟练工人是有相当的基础的；他们有经验，有使用机器的技能，有以前在小学校里得到的知识等。但是如今在苏维埃的种植场上，有一个普通的农妇（她恐怕连自己的姓名都不曾会写得好的）居然能够达到这样高的收获量——而且不是偶然达到的，而是有预定的计划的，是预先准备好的，——这简直是使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了，是等于大讲山海经了。”

布尔乔亚的新闻记者没有了解两个世界的基本差别，因此也就不会了解这个新世界的成功的原因，他们只觉得这是山海经一般的事情而已。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会发现这种山海经一般的事实，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了。

在一个没有成见的人看来，这两个世界中的两个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有许多旧时代的乌克兰的统治者，却宁愿拥护殖民地式的西部乌克兰，而死命地攻击苏联的乌克兰。他们在波兰政府的掩护下，组织了乌克兰共和国政府等傀儡机关，作为反苏联的大本营。他们说，莫斯科政府是赤色帝国主义，是殖民地侵略者。乌克兰民族民主党（法西斯党）的首领、现任波兰议会的副议长木特溜曾说过：“赤色俄罗斯的衰落便是波兰的利益。自由的乌克兰、白俄罗斯、



乔治亚等等之独立便是波兰的生命利益。”

原来他们是要为了波兰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使乌克兰、白俄罗斯、乔治亚等独立，换句话说，便是要这些民族都像现今的乌克兰一样，成为波兰的属地，成为小波兰。

读者或者要怀疑这些乌克兰的旧统治者是疯子，是甘心当亡国奴了。其实，甘心当亡国奴或者是有的，但是决不曾发疯。他们对于自己的利害是看得很清楚的。读者要知道，今天的苏维埃乌克兰的繁荣，是劳动大众的繁荣；而不是地主、资本家的繁荣。在这里，他们的财产（工厂和土地）是被没收了，他们因为是剥削者而受到敌视。在这里，如果他们不愿像一个工人和农民一样劳动着，那么他们就得活活饿死，否则，便逃到巴黎、上海、哈尔滨等地当亡命之徒（白俄）。在他们看来，西部乌克兰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王国了，因为这虽则是殖民地，但仍旧能够在波兰帝国主义的领导下，做一个剥削劳动大众的“二把手”。因此，在他们看来，莫斯科政府当然便成为殖民地侵略者，成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了。



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

《中国农村》编辑部最近接到读者许多来信，讨论或质问《中国农村》对于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即所谓乡村改进运动或乡村建设运动）的批评。该刊编者认为这是一般读者都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决定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一篇文章，对这问题做一个全面解释，但是编者自己没有工夫写，他要我来做这工作。我对这问题本来很感兴趣，所以就接受了编者的要求。这篇文章就是我个人认为站在正确的科学的立场对于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应取的态度。这当然不是代表《中国农村》的正式意见，但是我认为《中国农村》编者和一般站在正确的科学的立场上的读者都是同意这种主张的。

我把那些读者给《中国农村》编者的信统统读完之后，觉得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总括为下列几种：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农村》和乡村改良主义运动者对于今日中国农村问题的见解以及对于这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则各不相同，然而大家都是为了改造今日的这个黑暗势力下的破产的农村而努力，即都是为农民大众谋福利而努力，因此双方的宗旨是相同的。双方所走道路虽不同，但正可相扶而行，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6，2（5）。



不必互相倾轧，以削弱农村改造者的力量。况且乡村改良主义者的意见虽不彻底，但比目前的农村终是进一步，站在这观点上，对于乡村改良主义运动更不必去批评它，让它去发展好了。发表这种意见的人大概是同情《中国农村》的主张的人。

第二种意见大概是根本就不赞成《中国农村》的主张的，他们认为一般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尤其是《中国农村》——只是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是空谈家而不是实干家。这种人的代表意见便是：“妈的，他们住在上海，摇摇笔，说风凉话，挖苦人，叫大家笑俺们；不出力，不出汗；拖他们来俺们这里干干看！”

此外还有第三种意见——不，这与其说是意见，毋宁说是要求——许多做过了多年乡村改良主义工作，碰了不少次壁，因《中国农村》和其他刊物之批评，而对于自己向来所走的路发生了怀疑的人们，现今正在彷徨中，在十字路路口观望着，他们向《中国农村》问讯，要后者指示他们方向。有一位读者说：“事实证明了我们——《中国农村》——的意见是正确的，证明了我们的主义是破产了。这对于我们当然是很伤心的，然而这没有什么，走错了路只要马上改正就好了；不幸的是：我们不知道去向。你们说，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然而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你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总不能叫我们一个个抛弃了乡村的工作，跑回家去享福呀！”

最后第四种意见便是规劝《中国农村》作者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时候，不要过于尖刻，不要用讽刺、调侃甚至谩骂的笔调，以免激起被批评者的反感。

首先，我们应该认清，我们不能把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看做是同行嫉妒式的“互相倾轧”，而应该把这种批评看做是一种原



则上的论争，是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的路线的斗争。

在许多乡村改良主义者看来，中国农村的病源是“愚”，“穷”，“弱”，“私”（定县平教会主张）^①，或者是把这四个方块字换个写法；颠倒一下次序，改为：“贫”，“愚”，“弱”，“散”（中华职教社主张），或者说中国农村之崩溃，是由于固有的礼教精华之衰退（邹平乡村建设学院主张）。改良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大概可以分下列几个方面：（1）从教育农民着手；（2）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着手；（3）从组织乡村自治着手。

一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的实际工作从哪一方面着手，但是都有一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当然，天天在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炮弹枪刺下面讨生活的殖民地奴隶——哪怕他是所谓高等华人之流，但只要他不是甘心做走狗的汉奸——决不会麻木到看不出帝国主义侵略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发展的压迫作用；然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总认为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例如改良主义运动的有力的代表者梁漱溟先生说：“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

① 关于“愚穷弱私”的批评，请参阅《中国农村》第2卷第2期介绍和批评栏倪江先生的《农村改进与实际》和最近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关于定县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以“私”这个罪名加之于农民身上未免太刻薄了一些。数千年来农民们以自己的血汗为统治者建筑了他们的锦绣河山的基础，试问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更利他主义的牺牲精神呢！然而如今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农民不肯再多出一个铜板去建立什么学校或医院，以供我们的教授学者作乡村建设的装饰品的缘故，于是这些先生们就给了他们一个“私”的罪，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作者。



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梁先生也知道中国农村经济之破产，然而他说：“民穷财尽虽可忧，而所忧不在民穷财尽，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生息长养不难，日有起功也。”^①

改良主义运动者也不会闭着眼睛不承认军阀内战对于农村的破坏作用的，例如章元善先生曾承认，改良主义运动的“一点小小成绩——代表平教会多年的经营——是经不起大兵们一天的光临的”；改良主义者也曾感觉到地主、高利贷者、土豪、乡绅们对于农民们的苛刻剥削，然而他们都以为只要有一个好政府出现，就会把这些乡村发展的障碍连根除去的，他们是把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责任交给“青天大老爷”了。^②

所以，在改良主义者看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都不是他们的斗争对象；而他们所努力的是：怎样来恢复并巩固这个破坏了的社会秩序——即引入帝国主义侵略；产生半封建剥削，造成今日农村破产的那个社会秩序！因此，改良主义者的惟一的政治“运动”，就是联络“青天大老爷”式的政治军事领袖，使他们的大兵不要在一天之内就吞光了自己多年经营的成绩。而当如今我们的友邦要来直接统治华北的时候，我们的改良主义运动者也在所患“不在外国侵略”的观点下，而准备向我们的堪察加^③撤退了（听说去年华北问题

① 见《乡村建设理论提纲》，文中重点号系本文作者所加。

② 见熊佛西先生在《新中华》上发表的一篇农村剧本《屠户》。

③ 堪察加：苏联最大的半岛，地处亚洲东北部，沙皇政府于1697年~1698年间占领时尚处于氏族社会，岛上土人称堪察加人。18世纪40年代白令和契里可夫率探险队在第二次探索美洲海岸的归途中遇险，曾撤退到此。这里借指后方基地。



紧张时，已有一部分改良主义运动者派员到广西去活动了，大概是先去布置“后方”的吧）。

然而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们说：中国农村的病症不在“贫”，“愚”，“弱”，“私”……等等，而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如果帝国主义侵略不被打倒，封建残余势力不被铲除；那么教育也决不能发达，生产也决不会发展的。

这里是两种显然不同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相互论争，当然不是无原则的互相倾轧，而是两种路线的斗争。我们且不说恢复并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跟否定这社会秩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即以对于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见解而言，这里也存在着两种根本相反的主张。

当然，没有一个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人曾经绝对否认过教育和技术的意义；反之，他们是非常看重技术和教育的意义的。不过他们认为在现存社会秩序下，教育和技术是不能发展的。退一步说，即使农民们识得字，能够读书看报了，也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即使农民们能够相当改良技术，使农民的每亩田能够多产一石谷，多结几十斤棉花了，然而帝国主义的一场倾销，就可以使你的农产物跌去一半价钱，两次兵差一派，就可以吞食了你的全部收入。所以要发展教育和改良技术，就应该从铲除那些阻碍教育发展和技术改良的原因——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着手，这才是真正爱护教育、真正提倡技术和奖励生产的办法。

这里有一个很适当的譬喻，虽则是粗俗些，有伤绅士们的体面。譬如，有一个病入膏肓的梅毒患者，以现代医学知识的观点来说，要救他的性命，只有去请医生对他注射“六〇六”针；然而如今他的一位好意的家族说，现在病人有些伤风，先吃些



阿司匹林，止了伤风再说吧；过了几天又说，现在病人太弱了，怕受不起打针的痛苦，倒不如让他吃些补药，把他身体养好一些再说吧。这样一天一天挨下去就可以把这位病人送上了鬼门关。

如今中国农村，难道不等于这位病入膏肓的梅毒患者？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教育、技术等救命剂，难道就不等于那位好意的家族所给的阿司匹林和补药？我们不否认教育技术，也等于不否认阿司匹林对于医治伤风的效力和补药对于虚弱者的好处，然而梅毒病患者所最迫切的是“六〇六”针；而今日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以阿司匹林和补药去代替“六〇六”针的人，是因“好意”而断送了梅毒病患者的性命；以教育和技术来代替政治解放的人，也可以这样“好意地”阻止了中国农民大众的解放之路。

当然，许多从事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工作人员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抛弃了都市的享乐，而到农村中去做那些艰苦工作；在他们的主观方面，或者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确实是足以拯救中国农村之崩溃的（当然，在改良主义者中间有不少是把乡村工作当作进身之路，当作自己的吃饭的地方，不过这种人更不值得我们批评，我们可把他们丢开不谈）。然而他们的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例如世界闻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托尔斯泰，以帝俄时代的一等富豪的贵族地位，而肯舍弃了他的一切物质享受，到民间去服务，终以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的形状，以 82 岁年龄病死在一个小车站上。对于这样的人，在个人人格道德上，是没有可以被指摘的了；然而他的麻醉人民的、无抵抗主义的新宗教，



仍不能因此而不被先进的革命思想家批评为工人运动中的思想上的蛀虫。而且我们应该认为这种批评是十二分的公正的。

其次，我们就要谈到批评工作的破坏性问题。不差，对于改良主义运动的批评，就它的本身看来是消极的，也可以说是破坏性的，但决不是说风凉话，更不是以挖苦人家作为开心的行为。在某种场合下，破坏工作是必要的，它的价值比了没有根底的建设工作高过万倍。当无数诚挚热烈的乡村工作青年，在各种改良主义的麻醉下，以平民识字课本、改良麦种、改良农具作钓饵去吸引农民，以自治、保甲、民团等等新的桎梏去束缚农民的解放斗争的时候，一篇批评和揭露改良主义运动的文章，其意义必然是在任何改良主义的建设工作之上。因为一篇正确的批评文章，至少可以推动若干乡村工作青年对于他们改良主义运动做一次反省；可以为农村大众指示出一条正确的大路。

当然，我们并不是看轻了一切乡村实际工作，反之，我们是十二分看重这个工作，而且看重参加实际工作的人员。关于这一层，我们留到末了一节还要说到的。但是我们也不赞成看轻“摇笔杆”的工作即理论研究工作。事实上，据我所知道的，如今批评改良主义运动的作者，有许多是从乡村实际工作中“混”过来的人，在以后我们更希望在上海“摇笔杆”的人们，再回到乡村去，常与乡村实际工作发生联系。同时，我们也希望参加实际工作的人，也不要太迷信一切实际工作，应该对于自己的工作时时做些反省。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回答那些彷徨中的乡村工作人员的问题了。他们向批评改良主义运动的人说：“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你们的出路在哪里呢？”



亲爱的读者！请不要慌，出路是有的。任何反面的批评不能在正面提出一个积极的主张，指出一条应走的道路，那么这个批评一定是空无根据的。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的作者们指出：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所以这个分析进一步的结论——即正面的出路——就是：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因素。作者和编者因为不愿意他们的刊物夭折，所以对于怎样去铲除这两种因素的问题，不能向读者再作进一步的更明白的指示；对于这一层每个爱护刊物的读者当然应该谅解的。

许多乡村工作青年问道：改良主义的乡村工作既然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做什么呢？“总不能叫我们一个个抛弃乡村的工作，跑回家去享福呀！”当然不是！你们非但不应该抛弃你们原有的工作，而且应该加紧地去做这工作。

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一切乡村组织的任务是在维持、复兴并巩固旧的社会秩序；即维持、复兴并巩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的经济体系。所以这种组织是反动性质的。反之，觉悟的乡村工作青年如果能够把这种组织，用去做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么这种组织的意义当然就完全不同了，同样，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和提倡技术运动，是麻醉群众的一种工具。反之，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农民多识一个字，就足以多促成他们的一份斗争觉悟；多收一升谷，就足以多增加他们的一份战斗实力；而更重要的是：识字运动和技术指导等工作，是可以帮助先进的乡村工作青年接近广大的农民大众的。站在这意义上，乡村工作才能获得它的前进的意义。我们希望每个前进的乡村工作人员，都能够以全部精力，来做这种先进意义的乡村实际工



作。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批评的态度问题。在文字上，用谩骂的方法去攻击人家，那是最下流而低能的手段，只是在自己缺乏了理由的时候，才会用这种办法。据我所知道的，在批评乡村改良主义的一切文字中——不论在《中国农村》上也好，抑是其他刊物上也好——都不曾发现过这种现象。不过批评的文字有时太尖刻些倒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应从两方面来说：在批评者一方面，为要使自己的批评能够对于对方发生效力，且不使后者发生反感，当然能够尽量避免这种字句最好。但是在被批评者一方面说来，又应该作另一种看法：如果人家的批评是不以事实为根据的，那么你尽可一笑置之好了；如果人家的批评真是碰着了你的“痛脚”，那么你也不必因此动气；反之，你应该下个决心把你的“痛脚”医治好它。这里用得着背我们礼义之邦的古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

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解放运动的两大支流；这个解放运动的完成，也就是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

显然，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是两个性质不相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各有不同的范围和不同的内容。但是同样也很显然的，这两个问题带有不可分离的连带关系。

民族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问题。这个斗争的实质，也就是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经济榨取和政治文化侵略。因此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也是一个农民问题。因此农民大众便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力军。没有这主力军，便不能成为人民大众的运动，不能成为真正的气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就不能解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大众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束缚。在这种场合之下——即在没有农民大众参加的情况下——“民族解放运动”将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资本家，跟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土著资本家，争取对于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剥削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6，2（7）。



权利的冲突。但是在事实上，尤其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这样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存在的可能的。

但是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不仅只是农民大众而已，也不仅是工农劳动大众而已；除了他们以外，参加这个解放运动的还有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小贩，商店老板，以至于民族资本家们，在帝国主义侵略一天复一天地露骨化且进一步而成为武装占领的时候，当亡国灭种的惨祸成为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现实的威胁的时候，甚至连最反动最保守的地主的营垒都发生了动摇，甚至在他们的队伍中（主要在中小地主的营垒中）也产生了觉醒的反抗侵略势力的呼声。在这个包罗各社会阶层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军中，工农劳动大众当然是最坚决最彻底，因此也是最基本的一个队伍，其余的各种分子和社会阶层的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将随着他们在社会金字塔中所处地位的高贵程度而反比例地减弱下去（即是说，他们所处地位愈高，那么反帝的决心也愈小）。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在实行最后的决生死的斗争中，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为要孤立它的主要敌人，为要给后者以致命的打击起见，应该联合一切反帝力量，建立一个全民族的阵线。所以就是对于民族资本家，甚至对于地主们的反帝情绪也不能加以忽视，而应该把他们导入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

而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身受的剥削和压迫不仅限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而已；他们除此以外，更身受着本国的地主、高利贷商人以至土著资本家们的剥削和压迫。换句话说，在民族问题以外，还存在着独立的农民问题，即是农民为解除一切束缚，尤其是本国的统治者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发生了：一方面农民们为要打倒外来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必须同各社会阶层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农民们为要获得自身的彻底的解放，又得同时反对本国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主要是地主），即反对参与这解放运动的其他分子。表面上这似乎是一个大矛盾。

因此，地主、资本家 and 他们的代言人便向农民说：如今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求解决民族问题，在民族的要求以外不应该再有其他的要求，因此，在民族问题之外再提出农民问题来，实际上就是破坏了民族的统一。

不用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人类社会自从发生了一部分人榨取另一部分人的事实以后，榨取者和被榨取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不断地在冲突着。在他们之间民族的统一早就被破坏了；而破坏统一的罪人当然不是被榨取和被压迫的劳动者大众，而是榨取者和压迫者自己，是地主、资本家、商人……

然而，这似乎是说得“太远”了一些——一说到基本的社会问题上去的时候，我们跟这些民族统一的“拥护者”更没有办法获得意见的统一了。因此，我们还是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我们姑且以承认现存社会制度为我们的讨论出发点，我们要问：当民族危机一天加深一天的时候，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本家和地主们是不是曾经为了民族“统一”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牺牲了一些，把自己的贪婪的欲望加以相当的限制呢？事实告诉他们并不曾这样做；他们借口民族危机的加深，而要求劳动大众们多多地为他们牺牲。资本家趁此机会减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他们想把帝国主义侵略所给他们的损失，转嫁与工人们。地主们趁此机会加强他们对农民的非人的榨取，想叫农



民们代他来支付一切税捐负担，想把现有的国家机关的一切负担统统压在农民大众的背脊上。

地主、资本家从没有把自己的“利益”丝毫放松过。不过，因为他们的利益是由榨取工农劳动大众而得来的，所以他们只好以“全民”的招牌来掩护自己的一阶级的利益；而工农大众的要求是维护自己的正当的利益，反对别个社会集团对于他们的榨取，所以他们可以公然提出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来。工农劳动大众的最后目标是在于要求完全废除人与人的剥削，即建立真正统一的全世界的民族。

然而在目前，当民族危机严重到了极度，全国各阶级应该动员所有的力量一致对外的时候，提出农民问题来是不是破坏了民族的统一？是不是减少了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

农民问题的提出，非但不会减弱反帝阵线的实力，而且足以增强它的力量。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农民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主力军。每个对于民族解放斗争有相当诚意的人，都应该为扩大并巩固这主力军而努力，他们应该把这个主力军的战斗力的发挥，看做是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事情。所以每个为民族解放运动努力的人，同时也应该为农民大众的解放而努力。因为如果不让农民大众解除自己身上的苛重的封建桎梏，那么怎样使农民大众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尽量发展他们的战斗力呢。

同样，民族解放运动如果没有得到胜利，那么农民解放也不会单独成功的。这不仅因为农民大众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下最大的牺牲者；而且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是跟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封建残余的反动势力密切结合着的，如果要铲除封建残



余势力，必然同时就要牵涉到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使后者必然要帮助前者来镇压农民的解放运动。尤其在殖民地和武装占领区域，帝国主义往往已经自己直接代替了封建势力的地位（它往往直接就是土地的占领者），所以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解放运动往往直接便成了农民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总而言之，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是要联在一起解决的；谁只想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而反对解决其中的另一个，那只是表示他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一方面是诚意的。

民族资本家们不应当只在增加剥削上来找他们的出路。要知道，延长工作时间和减少工资总是有一个限度的；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没有知足的时候的。昨天还只是倾销而已，今天更进一步而做贩私货的海盗勾当了；昨天刚占了你一个销货市场，今天又要你的原料出产地了。一世纪以来的经济侵略促成了农民大众的破产，减少了他们对于民族工业品的购买力，如今更进一步而用大规模的屠杀政策来毁灭这些购买者了。民族资本家为了挽救自身，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应该把自己的目光放远大一些，应该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铲除经济侵略，收复已失去的国内市场和原料产地；应该帮助农民的解放运动。只有使农民大众获得解放，才能增进他们的购买力，才能扩大民族工业的商品销路；只有解除了他们的一切封建桎梏之后，才能自由发挥他们的反帝力量，才能充实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实力。

就是以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地主而说，只要他们对于自己民族的生存，对于自己国家的独立，还是相当关怀的，那么他们也不应该只顾着自己一阶级的私的不正当的利益，而去束缚着民族解放运动的主力军——农民大众，他们应该在“亡国灭种”和“解放农民”这两条路之中选择自己的出路。为了国



家民族的生存，你们就应该牺牲自己对于农民大众的封建性的榨取权，你们应该在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发展的条件下，找寻你们的正当的生活来源。

然而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不是宗教家的宣教运动，农民大众不应当（也不会）痴望着以说服地主、资本家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他们（农民大众）愿意向社会大声宣告：当民族危机一天深似一天，当抗敌救亡成为全国人民的第一任务的时候，他们提出独立的农民问题来，并不是想跟全民族的利益相对抗，并不是想破坏民族的统一。反之，他们是诚心诚意地想来巩固民族的统一，想来增加全民族的抵抗力；他们只不过是在全民族的共同利益的范围内拥护自己的正当的利益而已。

然而实践重过一切。任何主张和宣传脱离了实践之后，就成了空谈。当今的实践的任务就是怎样把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这两种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很技巧地配合起来。

在配合这工作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团结并且增强一切可能的解放运动的力量给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以最致命的打击。根据这基本的原则，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民族的和农民的）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度里，在不同的区域中，可以采用各种不同的战术。

当民族生存和国家独立发生直接的威胁的时候，整个民族的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者（而且在每个具体的场合下，是某个具体的帝国主义者）和它所雇用的民族内奸。同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高的和最后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拥护民族独立，驱逐帝国主义统治的战争，但是达到这最后阶段以前，可以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如抵货、经济绝交等等。



农民解放运动的主要敌人（除了民族的公敌——帝国主义者——以外）就是国内的封建势力。因为一切封建的势力最深奥最根本的基础是土地私有制；所以废除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反封建的农民解放运动的最高形式，同时在达到这最后阶段之前，也可以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如减租、减税……等。

无疑义地，这两种解放运动（其实，这如上面我们所已经说过的一样，是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整个德漠克拉西解放运动的两个支流）的最高形式，是目前整个阶段的总战略。但是根据国内各区域的经济政治发展的平衡性，尤其是根据参加解放运动的各个社会集团的势力对比，可以实行各种不同的战术来达到这总的战略之完成。

例如在帝国主义直接用武装占领的区域中，民族解放运动早已采取直接的武装斗争，反抗帝国主义军队所建立的傀儡政府。但农民解放运动还只达到了没收帝国主义和内奸的田地，只提出了减租、减税的要求。为了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在这些区域内，应当以最大的势力去扩大并加强反帝反傀儡的斗争。然后随着这民族斗争之展开，随着解放运动的营垒中农民大众的势力和地位的增强，使反封建运动也逐渐导入最高的阶段，使整个解放运动得能更深入地发展下去。当然，随着反封建运动的加深和扩大，使原来参与民族斗争的民族资本家的一部分中、小地主们逐渐脱离了民族阵线而向敌人投降，然而在这时候，解放运动的阵容已经扩大和巩固了，可以不至于因这一部分动摇分子之脱离而发生破坏的影响。

但是，如果在这种区域内，在运动开始的时候，不顾客观的环境，不顾农民大众的主观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马上就提出了反封建运动的最高形态，那么结果只是使一部分在第一



阶段中原来可以同人民大众共同合作的反帝力量很早便跑入了敌人的营垒，使解放运动的民族阵线在尚未扩大到巩固起来的时候，便遭到敌人的严重打击。

另一方面，在离开帝国主义的武装占领区域和通商大埠较远的某些区域中，民族解放运动还没有发展到直接武装斗争的阶段；但是农民解放运动往往已经达到了反封建斗争的最高阶段。在这里，当民族解放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小地主或民族资本家出身的人参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可能性自然减少些，但民族解放的阵线也更单纯些，同时从封建势力下解放起来的农民大众成为未来的民族战争中的最坚强的部队之一。在这些地方，基本的任务仍旧是要尽量集中一切不依靠封建剥削为生存基础的、可能的解放力量，准备当前的抗敌救亡的民族战争。

此外，在更有一些区域中，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民解放运动都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形式；在那里，就应该依照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把两种运动的低级形态（抵货、减租等）很技巧地配合着，推向广的方面和深的方面发展去，使达到最后的解放。这里应该注意的仍旧是：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能的解放力量，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但是不要因为姑息或害怕上层分子的动摇，而压制了解放运动的基本队伍——劳动大众——的发展。

一切解放运动都是残酷的血的斗争，同时也是一种高深的艺术。为了完成这解放运动的任务，不仅需要卓越的毅力和牺牲的精神，而且需要绝妙的艺术手腕，使能适应着现实的具体环境，技巧地运用各种策略，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乡村运动大联合的基本认识*

张宗麟先生在8月号《中国农村》上，提出了各派乡村工作者的联合战线问题。这是值得全国乡村运动者赞助的。

“联合战线”在今日已经成了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口号。但是在乡村运动方面，这样具体地提出的，似乎还是第一次。所以张先生这篇论文对中国乡村运动的前途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关于乡村运动中建立联合战线的客观基础，已经在张先生的论文和编者的附记中讲得很详细。概括地说就是：不管各派乡村运动者的主张如何不同，但是他们都不能否认“救国”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大家的实际工作又都把乡村选作自己的对象。当此民族生存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就应该在“救国”的共同目标下，在乡村工作的共同基础上密切联合起来，以求达到这共同的目标。

本文作者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那篇论文之中^①也曾经从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指出了乡村中各级人民建立联合战线的基础，同时又具体地指出了乡村中建立联合战线的办法，具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6，2（9）。

① 《中国农村》，1936，2（7）。



体地指出了在经济政治的发展不相平衡的各个区域中，应该怎样在联合战线的共同口号下，把民族运动跟农民运动很技巧地配合起来，以达到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的最终目的。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愿意从另一方面出发，即是从各派乡村运动者的对立出发，来说明农村运动中的联合战线。

如今有许多参加救亡运动的人，因为害怕联合战线的破裂，所以就讳言社会分化。其实这是错误的。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是事实。我们讳言这事实，并不能消灭这事实，而只是表示自己对联合战线缺乏坦白的诚意，其结果并不能够促进联合战线的巩固。我们应当从社会分化中去求社会团结，从对立中去求统一。

在乡村中，有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集团。如果请一位地主和一位农民（尤其是佃农）来解决租佃纠纷问题，那么他们两个提出的解决办法一定是不同的。就以农民本身而言，也不是统一的。这里面包括有所谓乡下财主的富农；有濒于破产的农民，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中农；此外，更有专靠出卖气力来维持生活的雇农。我们如果请一位站在雇主地位的富农和受人雇佣的雇农来解决工资的增减问题，那么他们的态度也一定是不相同的。

今日乡村运动中各种不同的派别，固然有不少是门户派别主见造成的，但主要的是以上面那些不同的社会阶层为背景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宗派”分别。

乡村运动中的派别虽多，但是可以把它归纳为两大营垒：一个是以地主和富农为背景的现状改良派；另一个是以大多数劳动农民为背景的现状“改造”派。

同时，也恰如地主和富农是隶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中



的，而地主内部也有比较保守的和比较自由主义的种种；所以同属于现状改良派的乡村运动者，对于改良现状的办法也会有各种很不同的主张（例如有的主张用恢复中国旧有的封建道德来维持濒于崩溃的农村社会；有的主张用灌输欧美的学术思想来改良这破烂的局面）。

然而我们要问，在这些利害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乡村运动者之间，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来作为建立联合战线的基础呢？当然是能够的。这个共同的立场就是他们都不愿做亡国奴。这种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并不是从他们主观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出发的，而是有客观的经济利益做基础的。

这里我们先从地主说起。在亡国之后，地主们的田产也有被帝国主义者吞并的危险。尤其因为在地主阶级中，以人数来说，中小地主要占一大半，他们的生活没有大地主那样稳固。他们或者是兼营工商业的，或者是当公务人员的，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的衰落和国家的灭亡，给予他们的打击是很大的。因此站在地主阶级本身的利益上，他们是应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是会参加救亡御侮的民族联合战线的。

其次说到农民。农民本身虽然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集团，但全体农民的大部分痛苦和贫乏之解除，必须在抗拒外力后，方有结果。农民中的富农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比较优越些，但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经济的衰落，使他们的农业经营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新式农场。所以他们的前途是跟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民族独立不可分离的。至于其余大多数的劳动者农民，更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真正牺牲者。在国家灭亡、民族丧失独立的场合之下，他们将以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血汗，去偿付全民



族的损失。因此，他们是乡村中抗敌救国的最彻底的分子，是联合阵线中的基本队伍。

在目前，当帝国主义侵略一天复一天地露骨化，并且进一步而成为武装占领的时候，当亡国灭种的惨祸成了现实的威胁的时候，抗敌救亡已经成了全民族的中心任务。因此乡村中各级人民也就应当在“抗敌救亡第一”的口号下共同联合起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大军，去同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决斗。农民们只有在救亡运动中去找寻自己的出路，去坚强自己的组织，提高自己的地位。

乡村中各级人民的联合，并不是取消了各级人民的独立立场。在地主和农民之间或富农和雇农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差别没有消灭之前，要他们对于租佃纠纷问题，或工资增减问题，采取完全相同的立场，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里有人或者要怀疑到独立立场的保持和联合战线是否相矛盾的问题。譬如说，农民既然保持着农民解放的独立要求，那么他们对于民族解放中的联合问题是不是诚意的呢？他们对于联合问题是不是抱有利用的观念呢？又如乡村无产者（雇农）除了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之外，更保持着劳工解放的独立要求，那么他们对民族解放以至农民解放的联合问题是不是诚意呢？是不是更抱着存心利用的观念来参与这联合的呢？

本文作者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一文中已经详细地说明了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解放是不冲突的；而且农民生活的改善，是足以增强民族解放实力的。

在这里更可以打一个譬喻来说，民族解放、农民解放和劳工解放好比是一个梯子的三个阶段：民族解放是它的最低一级，农民解放是它的第二级，而劳工解放是它的最高一级。不论这



三级阶段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事实上这三阶段往往是交叉并进的）。我们决不能机械地了解，以为一定要走完了第一阶段才能开始走第二阶段，走完了第二阶段才能开始走第三阶段等等。但要跑上第二级去，当然更要彻底地跑完第一级；要跑上第三级去，当然更要彻底地跑完第一、第二两级。换句话说，要达到农民解放，必然要彻底地完成民族解放；要达到劳工解放，必然要彻底地完成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是劳工解放要经过的阶段，而决不能说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是劳工解放者的利用手段。

因此以劳工解放和农民解放为最终目的的乡村工作团体和乡村工作者，真不必把自己的最终目的遮掩起来，但同时也决不会妨碍到同那些只主张民族解放的人在现阶段上密切联合起来。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不是做生意人的勾结，而是需要每个参加者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共生死患难的作战同盟，在这里虚伪和客气是不需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各个乡村运动的团体和个人，尽可（而且应该）坦白地承认并且坚持自己对农村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观察和不同的主张；但是只要认清了抗敌救亡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而抗敌救亡的斗争是否有胜利的把握，是在于能否组织并动员 3 亿的农民大众来参与这斗争，那么就应该采取联合战线的策略，共同向当前最凶恶的敌人进攻。

乡村中的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应当以乡村中各级人民的现实的利害关系为基础，而不能以观念主义的“互相宽容”为基础，每个人和团体在社会上不能_有超然的地位，而应当是属于某个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在表面上站在超然的地位起来说话的，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独自立场掩蔽了起来而已。这种态度



反而足以增加相互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所以参与联合战线的各个个人和团体，应该鲜明地标榜起自己的独自的立场（即对整个社会问题的独自见解），但同时又应该了解在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中，大家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作战，应该亲密地携手共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参加联合战线的各个个人和团体不至于“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不至于甲怕被乙利用，乙怕被甲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使联合战线在现实的基础上巩固起来。

抗敌救亡是全国各级人民的共同任务，因此以抗敌救亡为目的的联合战线应该是全民的。但是我们对于“全民”这两个字，不能了解得太死板、太机械了。对于那些被敌人所雇用的汉奸们，我们是不会去请他们来加入的，而那些一贯地向敌人屈服投降的不抵抗者，是不会来参加抗敌救亡的联合战线的。但是这并不损害到“全民”二字的真实性，因为受敌收买或向敌投降的人，在事实上早已自己取消了公民的资格。

联合战线既然是抗敌救亡的作战同盟，那么加入这联合战线的惟一的条件，应该是参加抗敌救亡的实际斗争。社会上一切可能的抗敌救亡的力量，当然都应该团结到这战线中来。

但是参与这战线的各个社会阶层，对于抗敌救亡的决心程度，以及它们的力量的大小是各不相同的。不用说，3亿的农民大众是乡村中势力最雄厚的抗敌救亡的大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他们对于抗敌救亡的斗争是最坚决的。然而在现社会中，农民们在经济上，在社会政治上，都是最被压迫的。苛重的负担使他们终年在牛马般的劳苦生活中过日子，乡村中的黑暗势力的统治，剥夺了他们的最低限度的政治权——团结和说话的自由。真如拖着锁链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所组织的军队不能成为战斗力强大的军队一样（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奴隶和俘虏常被



锁在战舰中作划桨、烧火等工作)，我们的重重压迫下的农民，如果不把他们从经济的和政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也不能完全发挥他们的抗敌救亡的伟大力量。因此从事乡村运动的团体如果已经把抗敌救亡的工作当做是当前的主要任务了，那么也就应该把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的工作，看做是整个抗敌救亡工作的一部分。

不用说，不仅是农民的彻底的解放，就是他们的经济政治生活的局部的改善，也都会同乡村统治者——地主们——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如果地主对于抗敌救亡的斗争是具有十二分的决心和真意的，那么他为了培养抗敌救亡的这个主力军，就应该相当让步。但是地主不是个个这样深明大义的。在这种场合之下，有些地主就会对于整个抗敌救亡的工作发生了动摇，开始退缩，以至于完全跑入了敌人的营垒（汉奸队伍中的领袖十之八九是地主买办出身的人物）。

到这时候，每个从事乡村运动的个人和团体就应该决定他们的去从：跟着地主跑呢？还是跟着农民跑呢？如果对于抗敌救亡的工作是下了真正的决心的，那么他就应该毫不迟疑地跟着乡村中的这个主要的抗敌救亡的大军——农民——跑，而不应该因为姑息少数的动摇分子而牺牲了主要的实力。

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应该团结并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来同我们的共同的敌人奋斗，以争取我们的生存权。一切从事乡村运动的个人和团体向来是以“复兴民族”相标榜的，那么如今就是表白自己的诚意的最好机会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生活教育社和妇女生活社 3 个团体已经发起了乡村运动者的联合战线运动，凡是对于国家民族关怀的人们都应该来响应这号召。关于联合的具体的办法，当



然可以由（并且应该由）各个乡村团体来共同讨论；但是对于这运动的怠工和不理睬，却是对于民族和国家的不可赦的罪过。



“资本主义万岁”和“打倒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机构的 性质和当前的任务

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成为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这是在很久以前，在卢梭著《民约论》和启蒙家编百科全书的时候，即是说差不多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18 世纪中叶）。

然而这没有好久。资本主义生来就是畸形的，它从娘胎里就带来了不少残疾。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这些残疾也一天复一天地恶化起来。在 19 世纪初期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资本主义制度就被描写成了罪恶的渊薮。

到如今，在大多数国家中，已经有好几代的人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的压迫下挣扎过。资本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的人民所咒骂着；这制度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到如今哪怕是资本主义的最忠实的辩护人也不会有勇气敢公然叫一声“资本主义万岁”！德国的法西斯党人为要支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惜牺牲无数社会先进分子的生命，几乎剥夺了一切反资本主义者的呼吸的自由；然而他们仍旧要用“打倒资本主义”的假面具掩饰他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6，2（11）。



们的“资本主义万岁”的本心，他们自称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这些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它应当从历史的舞台上被扫除出去。

这是现时代整个世界潮流告诉我们的人类社会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我们中国，“布尔乔亚的思想代表者”或“小布尔乔亚”等等头衔，虽然也已经成了摩登的骂人字眼，然而在事实上，资本主义自身还是一个可怜的被束缚着的囚人。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便是这囚人身上的桎梏。

现代的机器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干。自从帝国主义用大炮攻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门户以后，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厂便在中国建立起来。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端，是它的胚芽；而且从那时候起，这胚芽是相当长大了。谁个否认了这一点，那就是否认了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这一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急剧的变动。但是说这胚芽已经长成了一棵资本主义的大树，那也是太夸大了一些。

全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财政、金融、水陆交通等）是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帝国主义者可以左右中国的经济发展。首先说工业。殖民地民族工业的发达是跟帝国主义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的，因此后者就利用种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力量来阻止民族工业发展。中国的关税在表面上是独立的，但是在事实上，还处处受帝国主义者的牵制，而不能成为幼稚的中国民族工业抵御外资竞争的屏障。例如，日本的纺织资本家虽则要从中国运原料去，但是他们仍旧能够把用这原料所制造的生产品运到中国来倾销；使中国厂家因为花（棉花）贵纱贱，无法维持而把自己的工厂一个一个出盘给日本商人来做。

如今在中国各大都市中（尤其是沿海的）所存在的许多大



工厂之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外国资本的。

从生产的种类而言，这些工厂大多是属于轻工业方面的。在重工业方面，只有一部分不能离开产地而存在的企业，如煤矿和铁矿等，而且这一类生产几乎全部握在外国资本手里。至于较高级的生产，如制钢和机器制造等在中国几乎完全不发达。原因就是在于帝国主义者不愿意半殖民地的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化的基础——重工业；并且使后者永远成为替宗主国工业供给原料和粮食的落后的农业国度（即所谓“工业××和农业中国”的政策）。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主要前提是国内市场问题。在中国，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要讲到国内市场问题就不能不谈到农民经济。可是这里的情形更是糟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还没有在这里确立自己的政权。乡村中的主要的统治者不是资本家，而是代表封建残余势力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的剥削还不曾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上面，而是建立在半封建的超经济的关系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推动力是利润，可是在中国的乡村中，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贷者的利息不仅吞食了这利润，而且侵占到了农民的生活资料（即是在常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被称作工资的那部分生产物）。这样就根本消灭了产生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地盘。

上述这种半封建的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慢性的破产和崩溃，使农民对都市工业生产品的购买力减少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其次就要说到银行。银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中国，银行不用说是很多。然而银行界中势力最大的却是二三家外国银行。这些外国银行也就是帝国主义者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总



机关。

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银行本来是聚集社会上的闲放资本以供给工商企业（尤其是工业），并促进后者之发展的一种机关。自从工业资本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之后，银行由于自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之增强，从工业的辅助者而成了工业的统治者；银行资本跟工业资本之混合便形成了财政资本（或称金融资本）。但不论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的银行也好，抑是财政资本时代的银行也好；它的基础总是建立在生产事业——工业——上的。

可是我们中国的银行却就大为不然。由于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和因此而造成的高利贷利率之存在，使银行资本的主要业务从生产事业而转入了地产买卖和公债投机等非生产事业方面去了（其实真确些说，是还没有从高利贷资本的非生产的活动范围而走入生产范围中去）。

中国的银行非但不能援助并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成了民族工业的高利贷剥削者，成了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脆弱的民族工业往往成了银行资本的牺牲者。许多中国厂家往往因债权人的中国银行界的压迫，而把自己的工厂盘给了帝国主义者（如最近天津华新纺织厂因中国银行界不能给与救济而以120万元的代价卖给了日本的纺织托拉斯钟纺社。出卖契约已于7月9日签订）。在这种场合之下，中国的银行资本无形就成了帝国主义者所雇用的摧残中国民族工业的刽子手。

更因为外商银行在金融市场上拥有最大的实力，中国本国的银行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仰求于外国银行，甚至直接向后者通融款项。同时，中国的银行在政府或私人向外国举债的时候，往往以担保者的地位自居。那么，在此种场合之下，中国的银行



又是尽了买办资本的职能。

此外，中国各银行的资本来源也不是工商业中的闲放资本，而是军阀、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以超经济的手段剥削来的民脂民膏。

所以，中国虽然也同资本主义各国一样，具备了自己的银行——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但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不过是变相的高利贷者。同时，中国的财政资本也不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結合，而是军阀、官僚、买办、高利贷资本的大团结——这大团结的后台老板便是帝国主义者。

最后，顺便讲一讲中国的交通。现代的交通机关——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也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它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在中国，这些交通工具也早被帝国主义者输送了进来。在前几年，铁道和公路的交通已有相当的发展。这并且成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论者的兴奋剂，成了第二国际领袖樊迪文^①在欧洲招摇撞骗的工具，成了他宣传殖民地经济非殖民地化的理论根据。但“九·一八”的大炮戳穿了这谣言的真相：前几年东北所建筑的几条铁道，如今已经成了日本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大好基础。

本来，交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是要在民族工业自身能发展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如果工业本身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压迫之下奄奄待毙的时候，交通的单独的发展只是成了帝国主义者倾销货物和吸收内地人民的血汗的利器而已。

^① 樊迪文：即王德威尔得（Emile Vandeveldé，1866～1938），比利时右派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屡次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历任司法、外交、卫生等部部长，曾参与缔结《凡尔赛条约》和《洛迦诺公约》。



譬如，近年来各省公路建设很是发达。但是试问这些公路，除了军事上的便利以外，对于内地人民有何好处呢？新筑的公路是只准老爷们的汽车行走，至于农民们的牛车是因为要破坏路基的关系是不准行走的；农民为要绕过公路就不得不走远路，因此交通利器反而成了交通的阻碍了。但这些公路都是农民们的金钱血汗筑成的呀。

据苏、浙、皖、京、沪五省（直辖市）交通委员会调查，五省市公路所用汽车、汽油、车胎、机件等消耗每年达5 000万元的数目^①；试问经过这些公路而销到内地去的其他洋货还有多少呢？不用说，公路在目前的惟一任务便是洋货的推销员而已。

此外，还应该讲到的就是全国的交通机关大半在外资控制之下。航空公司不用说是以外资为主体的。内地和沿海的航业，主要是操纵在英商的怡和、太古和日商的日清等外国轮船公司手里。铁道（除东北外）在名义上虽然大半为中国政府所有，但因对外国公司的债务关系，帝国主义者对铁道的经营与管理仍旧有很大的影响。这些在外资直接经营或间接影响下的交通机关，对于外国货的运销，当然给与种种便利，但中国厂家却就倒霉了。

试问这样的交通机关，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能有多少推进呢？

综合上面所说的各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因素，在中国都已经存在着它的胚芽，但是这些胚芽的发育是不健全的，所以使它们没有成长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阻止这发育的主要原因便是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国内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

^① 见《申报》、《申时社》通讯，1935年10月24日。



在今日，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了罪恶的渊藪的今日，再叫喊着“资本主义万岁”的口号，那也的确是反动得太露骨了一些。然而在今日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如果高叫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那么说客气些是太“性急”了一点，说得老实些，是放松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最凶恶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

不用说，反帝反封建工作的完成，在客观上只不过是肃清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的阻碍，所以这工作的性质也就是布尔乔亚泛德谟克拉西的性质；但是这同“资本主义万岁”决不相同。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以反资本主义为其直接的发展前途的；换言之，是为了使反资本主义运动能在更广大更坚强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但是如果在目前提出“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那么在事实上就是忽视了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工作，也就是事实上取消了前面的伟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不肃清，那么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也决不能广大地展开的。

近年来，出版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机构的性质问题，曾掀起了好几次论战。可是一般人似乎对于这论争中两种不同的见解所发生的不同的实践的结论，还极少注意。很多人似乎没有了解：如果是承认今日中国的社会经济机构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机构，那么从这分析中所得出的实践结论，必然就要否认反帝反封建工作（布尔乔亚泛德谟克拉西性的工作）是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当前，这种结论的害处当然是更明显了。因此，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社会经济机构时，能够同时对于上述的实践的结论加以一番考虑，那对于问题之解决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

读了最近钱俊瑞先生在《现世界》杂志（2卷1期）和《自修大学》上（1卷3期）发表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和《我们要建设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篇论文，以及他所著的《中国国防经济建设》那本小册子之后，我觉得钱先生是提出了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他指出了中国在抗敌战争过程中以及抗敌战争胜利以后在一定时期内应该采取的、而且可能采取的经济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形态。然而我对于钱先生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前途的估计，以及对于他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的本身却有不敢赞同的地方。

如今，先来说国民经济建设问题。

如同钱先生所说的一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已经高唱了好几年了，如果我没有弄错，那么这运动大概是同“国难”这名词同时在《新开》杂志上出现的吧。

当然，在过去，提出这问题的人是跟钱先生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国民经济建设的内容和出发点也是跟钱先生的不相同的，真如同钱先生所说的一样，这些“国民经济建设”或者是“适应于中、日经济提携的国民经济建设”，或者是“适应

* 本文原载《自修大学》，第1卷，第1辑，第4号，1937年3月6日。



于英、美对华政策和国联技术合作的国民经济建设”，这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要人民相信：民族的出路除了抗战以外，还有别的更太平的出路存在呢！

钱先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是以抗战为第一前提的。然而这方案的一个漏洞也就在这里。

钱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作为我国抗敌战争的一种准备工作而提出的，所以认为这方案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抗敌^①；这方案的实施环境之一就是：“我国国民抗敌救国之心日切，统一政治机构之初步条件粗粗具备，全国对敌抗战可能爆发。”这方案的实施期定为6年，即1937年~1942年^②。

钱先生的方案称为“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按照这方案所包括的方面和内容来说，也够得上这样的称呼；因为它包括到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如重轻工业、对内对外贸易、农业、金融、交通运输等等。因此，我不仅要发生疑问：这样巨大的国民经济建设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未被推翻、民族解放未竟成功、“统一政治机构之初步条件”仅仅“粗粗具备”和“全国对敌抗战”仅仅“可能爆发”的环境之下，即能够在今日的中国——实施的吗？

钱先生说：“中国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决不是机械地采取战争的方式。”然而钱先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中的重工业发展计划，是以东北和华北的煤铁矿为基础的，所以主张收复失地，无条件地没收被敌人所占据去的这些资源；而在轻工业方面，则主张“停止或限制日本在华工厂之工作……”那么我们不经过

① 钱俊瑞：《中国国防经济建设》，45页。

② 《现世界》，2（1）。



抗敌战争的阶段，而且不在这战争中取得胜利，难道就可以实现钱先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吗？我敢相信，对于这个问题，谁也不会给一个肯定的答复（连钱先生在内）。所以钱先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的实施，应该看做是抗战胜利、敌人被我们驱逐出境、我们自己获得有真正的民族解放以后的事情了。

老实说，在目前的情形下，非但收还敌人已经占领去的资源，限制敌人在中国开设的工厂没有可能；而且就是我们苟延残喘，想同敌人划河为界，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半壁江山上建设其国民经济也不会得到我们的“友邦”的谅解的；否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早就发扬光大了，我们也早就不做半殖民地的奴隶了。关于这些基本的原理，钱先生当然知道的，而且他在上面所引的那本小册子中自己就曾经讲到的，然而钱先生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怎么又会越过了这些原理呢？

同时，我也并不是“因为要排斥‘长期准备’的理论，有意无意之间就以为我们的对敌抗战，真正可以不必准备”^①的“那些朋友”之一。

不，我决不是这样的朋友，赛球尚且要经过几多次的练习、多少的准备；何况是战争，更何况是同一个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技术上（连军事技术在内）比我们强过几倍的帝国主义国家战争。然而，准备有几等几样的准备。在任何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被压迫者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技术上总是比它的敌人软弱，但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所以能够时常取得胜利，主

^① 钱俊瑞：《中国国防经济建设》，11页。



要的原因不是在物的因素中，而是在人的因素，即社会的因素中，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抗敌战争的准备，主要的也应该向这一方面着想。说明白一些，目前我们的抗敌准备工作还是在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和训练民众。同时我们更希望有一个真正统一的、强有力的、以人民大众为基础政府来积极领导未来的抗战和当前的抗战准备运动——至少它应该给这准备运动以绝大的自由。

其次，我也并不否认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准备工作的意义。相反地，我对这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准备工作看得比前一种准备工作更重要，尤其不应该把这一种准备工作来代替了前一种准备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不能够把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准备工作达到同敌人相等的水准作为我们决心抗战的前提。因为如上所说的一样，在未曾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之前，我们在这一方面是永远赶不上我们的敌人的。我们如果要这样来做我们的准备工作，那么就同我们的“惟武器论者”和“惟经济论者”一样，准备了一辈子也等不到可以抗战的一天了。

在未来的抗敌战争中，胜利无论如何是属于我们的。这不仅因为真理和正义在我们这一边的缘故，而且因为我们在这战争中，全国各阶层是团结一致的，并且战争越是长久，我们的团结越是坚固。而在这战争中的敌人，却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民族，而是内部矛盾非常尖锐的一个民族，并且战争越是持久，这矛盾也愈是尖锐。敌人在国际上，除一二个法西斯国家外找不到同盟者。但是在我们一方面，可以保证得到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国度的同情，可以保证得到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积极援助。最后，我们同我们的敌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



的国力的相差也没有阿比西尼亚和意国^①那样厉害。我们要从事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并不是为要解决在未来战争中能否有取得胜利把握的问题；而是希望能够以较少的牺牲取得这胜利的问题（我们在这未来的抗战中的牺牲，毫无疑问要比敌人大过不知多少倍）。

所以，目前我们，至多只能有一种动员全国物资充实军需、改组全国经济组织使之适应战时需要、改善人民大众的经济境况以便把他们吸引入抗敌战争中来，增强他们的战斗力，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济上的备战工作，而不是钱先生所提出的，那种在抗战未获胜利之前无实现可能的、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

我们试具体一些来谈这个问题，钱先生估计自己所提出的方案是6年以内完成，需要资金50亿元。我们假定这50亿元资本已经足够完成钱先生的这个巨大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而且这50亿元资本又能够如愿地筹得。但是我们还会再有几年的功夫（即使以6年说吧，那是最短促的了），来供给我们从从容容地从煤铁采掘、炼钢、机器制造、军火制造……这样从头到尾地建设下去吗？在目前比较可能的，至多只是能够把旧有的兵工厂加以整顿和扩充，或者在较易防守的地点添设一二所而已。这是我们在重工业方面所能做到的。

在轻工业方面，钱先生的方案中所提出的对于民族工业的保护和对于日商企业之限制等政策，的确是在备战时期内就可以做到的，然而这又说不上是什么“国民经济建设”，只还是一

① 阿比西尼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埃塞俄比亚的一种称呼；意国：当时对意大利的简称。



种抗战的准备而已。

在农业方面，改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当然是充实战时粮食和吸引农民参与抗敌战争的必要前提。但钱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达到这目的的主要途径是以公债收买土地的政策。关于这种政策，提出来讨论的已不止一次。我在这里愿意指出两点：（1）在这政策实行的初几年（即应该增加生产力和发动农民的最重要的准备抗战时期）农民生活不会得到何种改善，而地主对于公债则抱不信任的态度；（2）所以如果政府已经有决心实行以公债收买土地的政策，农民的力量也相当发展，可以推动政府来执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就是实行更进一步的土地改革政策，也不至再有何种障碍了。如果力量还不足以完成这样的改革，那么还是减租、举办农村放款、废除高利贷等改革政策来得切实而可靠一些。

此外如金融的管理、对外对内贸易的统治、交通运输机器的修理和兴筑（只是以国防抗战为目的的，还谈不上以发展全国经济为目的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目前为巩固国防和适应抗战战争的一种必要准备工作，但说不上是“国民经济建设”。

钱先生为要反对那些企图以长期准备来把对敌抗战无期延宕下去的“惟武器论者”和“惟经济论者”，为要反对他们的同敌人讲“经济提携”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所以提出了以国防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但是在事实上陷入于类似的错误了，因为钱先生的方案在无形中告诉人家说：在民族解放运动未胜利之前，国民经济建设还是可以进行的。事实上，钱先生的这方案同钱先生所反对的那些“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可以起着同样的粉饰太平的作用。

所以，我向钱先生提议，把这方案中一部分在抗敌战争未



取得胜利之前或未发动之前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删去，同时也不要把它称为“国民经济建设方案”，而换一个其他比较妥当的称呼（当然，从上文可以看出这不是简单的争名位的问题）。

此外，还要谈一谈钱先生所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因为篇幅关系，我在这里只能很简略地提出。

钱先生很认真地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比无政府状态的、小规模的商品生产是一种进步。伊里奇在革命后的俄国曾经竭力主张推行，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乃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的准备”。所以，对于今日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更有权力把这种经济形态介绍出来。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在我们同敌人作战的时候和准备抗战的时候尽极大的作用，帮助我们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抗敌战争胜利之后，可以成为我们建设国民经济的主要形态之一，或者甚至于是最主要的一种形态（在最初期）。

但是钱先生对于中国在抗敌战争胜利以后的经济发展前途的估计是错误的。钱先生说：“在中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进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水准之前，我们绝对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照钱先生的这句话的字面的意义讲，获得民族解放后的独立自由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仍旧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而且这发展是相当长期的，即是在“中国的生产力还没有进步到近代资本主义水准之前”，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将一直继续下去。

钱先生这估计是不正确的、机械的看法。严格地说，就是革命前的俄罗斯——尤其是它的殖民地——的生产力也没有进步到近代资本主义水准。然而革命后的俄国的经济却以另一个



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向前发展了。

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准不用说更比当日的俄罗斯低下。但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胜利的那一天,恐怕不仅地球1/6面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就是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度的资本主义秩序也在倒塌了。处在这样环境下获得民族解放的自由独立的中华民族,还是按部就班地跨过资本主义的整个阶梯,那也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社会科学大师告诉我们:在先进国的胜利的先进社会层的援助之下,落后的殖民地国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途径的。



乡村工作人员应走的道路*

只要没有被某一社会阶层的主观利害关系所蒙蔽，不戴了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那就决不会看不到中国农村经济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破产和衰落的原因是在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榨取。有了这个基本的概念，也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和铲除国内的封建残余势力作为解决目前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要关键；而在某一帝国主义者想独个儿并吞我国、民族危机最迫切的今日，也不难知道我们要把驱逐这某一帝国主义作为当今惟一的最迫切的任务。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以后，必然就会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良主义的乡村改进工作，看做是有意无意地阻挠农民自觉，妨碍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一种障碍。我们在过去，所以要不客气地、无情地批评种种改良主义的乡村改进工作，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关于这一点，本文作者在《中国农村》第2卷第5期所发表的《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那篇短文中已说得明明白白了。

然而批评改良主义的乡村工作，并不是鄙视乡村教育机关、合作社、改良农场和其他各种所谓乡村改进机关中的实际工作本身；更不是要乡村工作人员们脱离了这些机关而来组织彻底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7，3（3）。



的反帝反封建的团体（或救亡团体）。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那篇短文中，虽然已经约略说过，但是还欠详细和具体；在这里，笔者愿意较详细地较具体地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纯洁热情的青年，抱着“救国救民”的大志，跑到农村中去做种种艰苦的乡村改进工作，当他的信仰没有被动摇以前，他们是勇往直前地向前奋斗的；但是，或者由于实际工作中“碰壁”以后反省的结果，或者由于人家的批评和理论研究的结果，猛然地觉悟到他们的事业不足以“救国救民”，而且是有阻挠人民自觉，妨碍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作用的，于是他们懊丧了，灰心了。他们之中，有的人是“改行了”，即是完全离开了这种“乡村改进工作”而去做别的职业了；有的人就索性把这种工作当做是吃饭赚钱的职业，领薪水，办公事，把一切“改进工作”马马虎虎敷衍过去，能够骗过乡村改进运动的“专家”、“领袖”们就算了事（这样的人恐怕是占大多数）；最后，有的人便跳出了这种“乡村改进工作”的圈子，索性做彻彻底底的救国事业去了。

救国事业当然是重要的，然而目前的环境是不是允许彻头彻尾的救国事业存在呢？同时，离开了原来的机关（学校、合作社、农业改良场、乡村自治组织、各种训练所和其他乡村改进团体）是不是再有同大众接近的机会呢？或者即使仍旧有这种机会，然而能不能有原来的那样好呢？只要对于乡村实际情况稍为熟悉的人，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我们不是“带着白手套”的“洁癖者”。穿着洁白的外衣的人并不就是真正“洁白的”人；真正“洁白的”人是处在污泥中也不会被浸染的。



教农民识几个字，散发些改良谷种，介绍一些新式的农具，办一个合作社，以及诸如此类的所谓“乡村改进工作”，它的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重要的要看乡村工作者自己对于这些工作的估量如何，以及他们是怎样来做这些工作。“鸦片落在瘾客手里是毒，落在医生手里是药。武器落在法西斯手里是杀人，落在前卫手里是救人……”^①改良主义者把上述这些“乡村改进工作”看作是“救国救民”的惟一大计，想把成千成万的农民拉到识字班、改良农场、合作社等等组织中，叫他们专心去识字，改良农业技术，办理合作等等，要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的痛苦来源，永远离开了他们的争取解放的道路，甚至以自治保甲等新的桎梏去束缚他们——在这样的宗旨下进行的乡村改进工作，无疑地是阻挠农民们的自觉的，是妨碍农民们的解放的。但是如果把这些工作看做是整个农民解放事业的一环，看做是整个救国事业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工作的意义就得要完全从新估计了。

同样是一个农民识字班，如果所用的教本是汉奸“政府”审定的、宣传我们的“友邦”的“王道主义”的教科书，那么，这识字班无形中便成了“友邦”军队的特务机关的喉舌了。反之，如果这识字班所用的教本是觉悟的爱国分子自己编的讲义，例如内中包括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简括的历史地理知识（当然是站在民族意识的立场上写的），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经过情形和现状，农民们的痛苦来源和解放的道路等等，那么这个识字班无形中便成了极有意义的爱国事业了。甚至就是同样应用汉奸“政府”所审定的教科书（如在伪国和冀东），逐字逐句地照着

^① 郭沫若：《国防、污地、炼狱》，《文学界》，1（2）。



书本讲和离开了书本照实际的情形讲，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

譬如又就改良技术和组织合作社来说，如果把这种工作看作是挽救农村经济破产的惟一的——或是主要的——良策，想把这种工作来代替铲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的运动，那么就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这种事业便变成为阻挠农民自觉，妨碍农民解放的事业了。因为在农村经济一天复一天地衰落下去，大多数的农民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候，当人力比机械，甚至比畜力都要便宜若干倍的时候，新的技术是无从发展的（它至多只能在地主、富农的经营中被应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合作社只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附庸；在殖民地国度，合作社往往成了推销洋货、为帝国主义收买原料的机关，而许多信用合作社便往往成了地主、富农、高利贷者利用人家的（合作社的）资本去盘剥贫农的一种新形式。而且纵使“从事乡村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每亩农作物的田地增加半担以上的收获，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了。如果一旦洋米倾销，或麦棉大量进口，每担作物可以跌到原有价格的半数”。这是我们时常背诵的基本真理，可惜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曾理解。

但是如果技术改良运动者和合作社运动者不把这种事业本身看作挽救农民经济的惟一良策，不想利用这运动来模糊农民的观念或使他们永远脱离解放的道路；反之，如果把这种事业看做是整个农民解放事业的一个环节，一种手段，那么这种技术改良运动和合作运动的意义便大不相同了。

使每亩田增加半担以上的收获（注意！在农村问题未彻底解决之前，这不是可以普遍办得到的事情），固然还挽救不了整个农村经济的破产，更解决不了今日中国的民族社会危机；在



整个社会秩序未有变动之前，任何形式的合作社都不能根本铲除人榨取人的不合理的经济机构；然而，为农民增加半担（哪怕只有半斗，以至于半升）收获，减少一层中间人的剥削，对于农民终究是有好处的。许多幼稚的人们对于大众的经济改善，往往发生一种错误的见解。他们以为农民所以要求解放，正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受压迫、太穷苦的缘故；一旦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他们便不想求解放了。由此就得出一个结论：要使农民得到解放，就要反对农民生活的任何改善。这种“越坏越好”（越坏是指民众的经济生活，越好是指解放运动的开展）的“理论”不仅在我们中国存在，而且在国际劳工运动中也曾经发生过的，然而这种“理论”不用说是错误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把经济情况和解放运动的关系看得太机械了（照这样机械的推论，那么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的力量应该比宗主国强大）；这种错误的根源也在于没有理解到劳动大众的解放运动的动力发源地是在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那种社会经济机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在这机构未曾被铲除之先，解放运动的动力永远不会枯竭的。在这种社会机构下，劳动大众的生活的局部改善（尤其是奋斗中得来的改善）非但不足以挫折他们的勇气，而且足以提高他们的战斗力的。所以，我们非但不能在原则上一般地反对农民的生活改善，而且是应该为争取这种改善而奋斗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把农业技术改良运动和合作运动剥去了改良主义的外衣（阻挠农民自觉，妨碍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毒素），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作为深入农民大众，破除他们的迷信和使他们认识自己的团结力的一种手段。

农民是劳动大众中知识最落后、最闭塞、最迷信的一部分。



他们处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土著的和外来的重重压迫之下，他们往往对于自己的前途失望，把自己的命运任凭“神明”去摆布。他们的这种听天由命的迷信的成见，是妨碍他们觉悟的最大的障碍。所以破除农民的成见是启发农民解放运动的第一步重大工作。然而，你要是同他们的迷信的成见去作正面冲突，你是准定会吃力不讨好，以至于受他们的敌视的。在这里，技术改良工作倒是很好的一个帮手。乡村工作人员可以从简单的技术改良中证明人力是可以抵抗“天意”（即水、旱、虫害等“天”灾）的，证明在大自然间，人类的劳动力（智力和体力）是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力。这样，便无形之中把农民的听天由命的迷信观念打破了一大半了。当然，在现社会制度下，尤其在农村破产的现状下，大规模的技术改良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正可以乘此机会，向农民说明新的机器新的技术不能在中国农村中普遍应用的原因，指出阻止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障碍（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剥削所造成的农村破产），这样不是很自然地同农民指出了他们真正的解放道路吗？

譬如，再以合作社来讲吧。现在各色各样的人物和团体都在提倡合作运动。洋商想把合作社作为替自己推销洋货、收买原料的工具；土著民族资本家或许也想利用合作社来同洋商抵抗；金融资本家想把都市中的游资通过合作社投放到农村中去；地主、商人和富农想利用合作社来操纵农产品；高利贷者更想借着合作社的招牌，向政府和各种公私团体骗取现款以从事他们的重利盘剥的勾当。从事合作社运动的觉悟的乡村工作人员，当然应该努力使自己所组织的合作社不被这些人们去利用，而为农民大众服务，使农民经过了消费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而在购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以及出售生产品的时候，尽量减少中间



人的剥削，打破地主、商人和富农的操纵；经过了信用合作社取得廉价的收款；经过了生产合作社，收取合力经营以提高生产力的利益。而合作社运动的主要意义还不在于这些经济的利益上（我们已经说过，在整个社会经济机构未有变更以前这种经济机构是极有限的），主要的是可以经过了合作社来组织农民，来教育农民，使他们理解团结力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对于他们自身解放的意义。

譬如又以办理乡村自治和公民训练而说，这种事业往往就是直接维持乡村旧有秩序的工作，是加在农民大众身上的一种新桎梏；然而只要主办的人是觉悟的乡村工作人员，一样可以利用它作为教育农民和团结农民的一种机会。尤其是在这国难当前做公民训练工作，正可以利用机会把抗敌图存的政治军事知识灌输给一般的农民大众。

所以，我们非但不反对上面所列举的各种“乡村改进事业”，而且是不应当反对这些事业的；我们所反对的不是“农村改进事业”的本身，而是把这种事业当作“救国救民”的惟一大道，想利用这事业来蒙蔽（自觉的不自觉的）农民，阻止他们走上彻底的解放道路的改良主义。所以，对于原来在乡村改进机关中服务的、觉悟过来的乡村工作人员，我们非但不劝他们脱离原来的服务机关，而且劝他们留在这些机关中，以更大的劳力，更坚强的信心，去从事这些机关的工作。我们所希望的就是他们应该尽量减除这些事业的毒素，把新的内容来充实这些事业，应该把这种事业看作是接近农民、团结农民、教育农民以达到最后目的——农民彻底解放——的一种手段。

总之，事情在于人做。会做事的人，只要把握住了总的方向，处在任何环境下，在任何形式下，都能够完成他的事业，达



到他的最后目标。一个觉悟的乡村工作人员，他只要认清了农民解放的真正的道路，就是在改良主义的（甚至比改良主义更不如的）机关中，可以做很有意义的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的工作。改良主义的工作形式决不是束缚住他的工作能力，他可以用先进的工作内容来充实这种形式。反之，不会做事情的人，往往只会在形式上做功夫；在表面上，什么会什么团体闹得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突然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树立了无数敌人，结果自己的脚还没有立定，就给人家连根铲除了。

尤其在目前的局势之下，我们的民族敌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我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敌人——正在企图亡我们的国家，灭我们的种族；决生死的肉搏就在当前，我们正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团结所有的力量（不论这力量是大是小、是暂时的或是永久的）来粉碎敌人的侵略计划。而回顾国内的环境还不允许在彻底的抗敌的立场上，如大家所愿望的那样自由团结起来，做抗敌救亡的事业。我们既然不能照最理想的做去，就只好照目前所可能的做了。陈洪进先生在《中国农村》第3卷第1期上的《国难期中的乡村团体组织》一文中主张透过现存的各种乡村团体——甚至是宗教的、宗法的团体——来做抗敌救亡的团结教育工作。陈先生的这种主张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现存的各种合法的乡村团体中，乡村改进机关当然是最先进的一种。不管对于整个民族解放和农民解放的见解是如何，在敌人想把它连皮带骨地吞进去的时候，就是最保守的改良主义团体对于敌人的侵略计划，也不得不想法来“临时应付”一下了。敌人的进一步的侵略促成了我们内部的团结，虽然似乎是觉悟得晚了一些，但是还来得及。我们希望在乡村改进机关中



服务的同胞们，趁此机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多做一些抗敌救亡的准备工作。在农民中培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意识，养成团结的习惯和能力。



财政资本的统治——帝国主义*^①

现今一般读读新闻杂志的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现今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财政资本统治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什么呢？或者说，帝国主义这个时代跟过去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尤其是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就不是每个人都能解答的，至于能够正确地完善地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更是不多了。

要理解帝国主义的特征先应该知道：“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换句话说，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跟资本主义相对峙着并存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和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是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更尖锐的形态。所以，要想彻底理解帝国主义，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要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7，3（4）。

① 大家知道对于帝国主义问题，伊里奇有一本权威的著作。这本书写得并不十分深奥，分量也不多。所以对于愿意进一步研究本问题的读者，仍旧愿以这本书相介绍。

伊里奇原著是在1916年写的。所用材料大半系1913年以前的。最近在瓦兰加等教授更以大战后以迄最近的材料补充伊里奇原著另刊增订本。这增订本已由吴清友先生等译就，最近即可出版。该书托新知书店发行。本文所用材料均自增订本转引来的——作者。



想彻底研究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先必须研究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前期资本主义社会解剖中所研究的东西）。

然则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发生了哪许多从前没有的特征呢？这种特征主要的有以下五点：

1. 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和垄断（或称独占）的形成。这垄断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生活中起有重大作用，它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竞争。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市场上是被自由竞争的法则所支配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上就是大企业自由地并吞了小企业（由于竞争中大企业的胜利和小企业的失败）。自由竞争的最后的最后的结果，便是几个最大的企业并吞了或统治了同一产业部门中的大多数企业，这样便形成了垄断。在少数几个最大的企业之间，比较容易订立协定，也容易团结起来。它们之间的协定和团结便是形成了现代各种垄断团体——“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等。这种垄断团体或者是一种暂时的协定（关于购买原料划分市场，规定价格等），而加入协定的各企业仍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或者是各企业合并组织成的一个大企业。这种垄断企业所包括的范围可以仅限于同一的生产部门，也可以包括相互间有密切联系的各个经济部门——如钢铁业同煤矿业、铁道运输业等等。然而我们如果不谈到帝国主义时代银行的新作用，那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些垄断企业的规模和气魄，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说到帝国主义的第二特征，就是银行资本的新作用。

2. 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财政资本和财政寡头政治的形成。银行的原来的职务是在于充当银钱支付的中间人，集中社会上闲放的资本，把它变为活动的资本；用商场上惯用



的术语来表示便是所谓“调节金融”。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银行却从普通的中间人地位，一跃而变为支配工商业资本的势力强大的主人（而且是非常专横的主人）了。促成这种演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银行跟工商企业的往来的繁密，使银行能够洞察各该工商企业的内幕和它们的经济情况，遇到机会来的时候（例如工商业需要银行接济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去操纵或者并吞这些工商企业。促成这种演变的另一个原因是银行资本的集中和扩大。银行成了社会上一切闲放资本（工商企业中暂时不用的资本和各级人民的积蓄）的汇合处（以存款或其他的形式）。但是促成银行的集中和财政寡头政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股份公司制度和“参预”制度。大资本家利用股份公司制度汇集了许多小资本在一个企业之中，但是因为大多数小股东对于公司行政不会去过问，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也不会去出席股东大会，所以普通大资本家只要有了某一公司的四、五成的股票（甚至更少一些）便可以操纵这个公司的全体资本了。同时，可以利用发行公司债券等方式，使这个大资本家所操纵的资本超过了该公司总资本额以上。而这个公司本身更可以用“参预”的方法去操纵另一公司。例如，一个握有 400 万元资金的大资本家操纵了 1 000 万元资本的一家银行，而这银行本身又以发行股票的方法去“参预”——即操纵了——另一家银行或工商企业，这前一个银行称为“母亲公司”，而被“参预”的那个银行或工商企业便称为“女儿公司”。“女儿公司”的资本往往可以大过于“母亲公司”，而且“女儿公司”本身更可以去设立自己的“女儿公司”即第一个公司的“孙女公司”等等。

这样，银行资本便跟工业资本结合了起来，形成了所谓财政资本，或金融资本。少数巨大的财政资本家利用了股份公司



制和“参预”等等方法操纵了更巨大的资本。例如美国的大资本家摩根自己拥有 200 亿美金的资本，但是他所直接间接地操纵的资本有 740 亿美金，占美国全体股份公司资本的 26%。日本的三井、三菱等几个财阀也操纵了日本全国绝大多数的公司资本。每个这样的财政资本集团往往包括到了社会上各个生产部门——如银行，轻、重工业，商店，铁道，船舶，航空，矿山，农场（主要系原料种植场）。这种财政资本集团就称为“康采恩”（Concern）。

财政资本的势力深入于国民经济的各部门，操纵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成了政治上的实际支配者，成了各该国政府的幕后的操纵者，形成了所谓财政寡头政治。

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竞争已经被财政资本集团的垄断所代替。但这垄断并没有消灭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生产也并没有因为财政资本集团之存在而变为有组织的和有计划的生产。第一，一般的趋势虽然是表示出垄断企业之并吞独立企业，但是并不能完全消灭所有的独立企业；即是说垄断企业 and 非垄断企业之间还是存在有竞争。第二，垄断企业相互之间也还存在有竞争。不过这种竞争是更尖锐、更激烈了，因此这种竞争对于国民经济的破坏力也更大了。而且垄断企业对非垄断企业的竞争也往往采取了暴力的强制的手段，例如：（1）断绝原料来路；（2）断绝劳动力来路（对工人或工会订立合同，勿使工人往非垄断集团的企业去工作）；（3）断绝运输机关；（4）断绝销路；（5）与购买者订立合同专向垄断企业购货；（6）抛价出售（倾销）；（7）断绝信用；（8）同盟绝交。

3. 资本输出的意义增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宗主国榨取殖民地的方式主要是商品输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关系主要



是卖主同买主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先进国（宗主国）中发生了资本过剩的现象，资本家在本国找不到投资场所，便不得不到国外去寻求，于是首先便找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于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除了做宗主国的工业产品的顾主以外，更成了宗主国的债奴。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投资一天复一天地增加起来，双方之间的债务关系也一天复一天地繁密起来。而商务关系的发展同债务关系的发展，意义并不相同。仅就商务关系而说，宗主国在每次把商品销售脱手，把商品变成了现款以后，资本家的目的就已经达到；殖民地丧失（如殖民地之独立或为其他帝国主义所侵夺等）对于他们主要的只是丧失了未来的销售市场而已。但是站在投资立场上说，那么殖民地的丧失不仅是失去了未来的投资市场，而且要危害到已经投入的（即宗主国所输出的）资本。所以，资本输出越发展，宗主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关心”也愈密切，愈不愿意殖民地独立或被别的帝国主义所侵占去。所以，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度之间的债务关系的扩展，是跟前者对后者的束缚关系的扩展成正比例的。

当然，所谓先进国中剩余资本之发生，本身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病态现象。所谓投资场所缺乏是相对的，是由于以下两种原因造成的：（1）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受土地私有制的限制，使资本不能自由投入农业，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一部分；（2）人民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购买力之受限制，使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受限制，也就是使投资场所受到了限制。此外，宗主国资本之流入殖民地也是由于贪图殖民地投资的高额利润。

4. 国际间的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之形成。资本主义的垄断组



织不仅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境以内，而且越过了这个国境而成为国际间的组织了。电气业中的“General Electric Co”（美国）和“A. E. G”（德国），煤油业中的“Standard oil”美孚“Royal Dutch Shell”（亚细亚）和“Anglo-persian Burma oil”，钢铁业中的“International Railmakers Association”便是这种国际垄断组织中的最著名的。这些组织相互间瓜分了世界的资源和市场。好些人把这种国际垄断组织看作是资本的国际化；看作是各民族间和各国间和平的预兆。其实这是一种幻想，一种带有毒素的幻想。

5. 世界瓜分之终结和殖民地重分配。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分割完了：地球上除了几个帝国主义的宗主国以外（十月革命以后，更除去地球 1/6 面积的苏联），其余的弱小国家或者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国家。所谓半殖民地国家在表面上是独立自主的，而实际上也已经被各帝国主义国家划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了；帝国主义者所以没有把这些弱小国度正式升任为自己的殖民地，一半是由于半殖民地国度中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抵抗力，一半是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还在相持不下，不能决定谁个可以独个并吞这些半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要想扩张殖民地领土，势必至于或者是把老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抢过来；或者是把相持不下的半殖民地用武力占领过来。换句话说，地球已经被瓜分完了，而地球又只有一个；因此迟了一脚登台的帝国主义国家想取得殖民地，只好用再分割的办法了。不用说，殖民地的再分割必然要使得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跟老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1914 年德国因为向英、法二帝国主义者提出了重分殖民地的要求，于是引起了 1914 年至



1918年的一场大战。如今，德、日（还有意大利）又提出了重分殖民地的要求，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又迫在眼前了。可怜的是成为半殖民地之一的中国，在这次竟成了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宰割对象。

以上已经把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说过了，如今简略地再来谈一谈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化之扩大。寄生性和腐化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点，可是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是空前地扩大而且表面化了。

由于财政资本和股份公司制度的发展，使大多数资本家同生产事业完全脱离了。如果在以前资本家还可以用生产组织者或生产领导者等名义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可是在如今，他们这种借口完全没有了。以股份公司制度组织成的现代的各种大企业，其组织和领导的职务可以完全交托给各种技术专家去担负；而称为股东或债券持有者的资本家们可以安心坐在遥远的别墅里领取股息或利息，以过他们的奢侈的淫荡生活，这便是所谓食利生活者，或剪息票生活者。同时，成为资本输出者的帝国主义国家也逐渐减轻自然的生产的职能，而把这职能移交给资本输入国去，整个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寄生主义的食利国了。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榨取来的丰厚的利润提了一小部分出来，用以收买本国的一部分工人上层分子，这便是所谓贵族工人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来源。

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腐化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把它们“点一下名”：（1）不能利用社会的基本生产力——劳动力，如失业工人人数之增加，慢性的失业，在业人数增加之迟缓甚至低落，隐藏的失业——乡村人口过剩；（2）劳动力之直接或间接的毁灭，如战争中的死亡



（仅第一次大战就死伤 1 000 万人），劳动者疾病的死亡率之增加和出生率之减少；（3）非生产性劳动之增加，如官吏、军队、警察人数增加，商业人员和仆役人数之增加等；（4）生产量增加之迟缓；（5）技术进步之阻碍，如因垄断资本家不愿采取新发明的技术以致引起生产过剩和产品跌价，生产规模之狭小使若干新机械（适宜大量生产的）之使用成为无益；（6）慢性地有一大部分生产机械未被利用，大多数工业部门中，工厂只开一班日工，而且就是在这一班中，整个生产机关也只被利用了 45%~89%（而且是根据 1929 年经济景气最高年份）；（7）故意拆毁许多固定资本；（8）销毁存积商品，如美国把麦子生火炉，把牛奶倾在沟里，法国把鲜鱼抛在海中放生，阿根廷把老羊就在牧场上屠杀（因为肉价抵不过运费），以便腾出地位给小羊，巴西在 1933 年烧毁 2 200 袋咖啡，而且曾经预备把 1934 年丰收的 3 000 袋再烧去 2 000 袋，这些咖啡大概足够全世界数年消费；（9）商品流通费用增加，如美国每年用去的广告费有 12.5 亿美金，所用报纸有 85% 用在广告上；在 4 500 元美金的汽车卖价中商业上的费用占 2 000 元；（10）军费和警察机关的预算之扩大，对于这一项是大家所熟知的事实，不用多说了。

请读者不要怀疑这是“谣言”；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权威的学者所做的统计，是各国的绅士们的报纸上记载的消息，每一事实、每一数字都有确实出处。同时也请读者不要怀疑你自己是处在疯人世界中，这是生理上十二分健康的人们所组成的现社会中发生的事实，这社会便是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或财政资本时代。

总之，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已经不能允许生产力再有显著的发展了，而且它是时时刻刻在预备破坏原有的生产力。



要使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力能够向前发展，必须换上一个更高级的社会经济机构。在这意义上说，帝国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旧的社会经济机构的没落的原因（见前述各矛盾）和建立新的社会经济机构的条件（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也具备了。然而旧的仍然不会自趋没落，新的也不会自己跑上台来；这里还需要掘坟墓的送葬人，还需要催生的产婆。

以上是对于帝国主义的一个极简单的理论上的叙述，要彻底理解这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至于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各种方式——例如文化侵略、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和军事侵略等历史，这可以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完全看出，因不在本文的范围内，故从略。至于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财政资本不能以民主的议会制度来统治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公然的独裁政治，是资本主义的回光返照。因为这也已经越出我们的研究范围牵涉到政治问题方面去了，所以也未曾加以详细说明。



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

一、历史的叙述

自从国难发生以后，全国各界人民都热望政府召集真正的代表民意的机关，由人民代表共同来讨论并解决国家大事；在政府方面也早已有“延揽英才使其参政”^①以及“团结人心集中力量……提早召集国民大会，俾民意有所宣达”^②等声明。自民国 20 年 11 月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设立国民会议以后，民国 21 年 4 月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在这次会议的政治改革草案中有下面两条决议：（1）切实办理地方自治，如期结束训政；（2）宪政未实施前，提前设民意机关，定名为国民代表会，限期在民国 21 年 10 月 10 日以前成立。后来这问题又提交同年 12 月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又决定先在民国 22 年以内召集国民参政会，在民国 24 年 3 月召集国民大会。到民国 22 年 3 月 30 日，第六十四届中央常务会议决定在 7 月 1 日召集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民大会

* 本文原载《自修大学》，第 1 卷，第 1 辑，第 9 号，1937 年 5 月 25 日。

① 见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中华民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② 见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中华民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



提前召集的问题。可是后来这个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曾能够召集成功；7月1日中常会议决临时代表大会改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果国民参政会的召集是因为国民大会已经预备提前召集而决定停止举行了；而国民大会也因于五全代会屡次展期而未曾召集成功。到24年年底五全代会是开幕了，而且郑重决议在25年以内召集国民大会。可是到了期限，又因为各地代表未能选出，不得已决定把国民大会再次延期。今年2月间举行的三中全会决定国民大会在同年11月12日举行。于是屡次展期的国民大会又决定了召集的日期。前月22日的中常会又通过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的修正案。这是最近政府决定召集国民大会的经过情形。

但是创设民意机关，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民治国家并不是国难发生以后人民新提出的要求。远在满清未被推翻之前，就成了革命大众的中心要求之一，也就是孙中山先生40余年致力于国民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

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是在于他的一生从未忽视过民众的最迫切的要求。他永远是站在民众一起的，所以民众也永远追随着他的。在满清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时候，人民的最迫切的要求就是推翻这统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的权利，使中华民国成为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民主共和国；所以创设民意机关和制定宪法成了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阶段——辛亥革命、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北伐和北上召集国民会议运动等——中的具体的行动纲领。因此我们在目前检讨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的时候，中山先生对于这两个问题所发表过的言论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宝贵的遗训。



二、孙中山先生关于国民会议的遗训

民国13年孙中山先生北上号召国民会议，路过上海的时候，曾经在莫利爱路自己的住宅中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关于国民会议的演讲。中间有一段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副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才是假民国。”同样，民国13年对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中又说：“我现在相信建设民国，不是完全从上面可以做得到的，以后建设民国，还是要从下面做起来。”在北上宣言中，重视民众力量的主张更加明显。他说：“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也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

孙中山先生认为脱离了民众而与民众为敌的军阀统治，虽有武力为依靠，有帝国主义之援助，但是终不免于“一败涂地而后已”。袁世凯和吴佩孚的统治，在方法上虽有巧妙不同，帝国主义所给与的援助也有大小之别，其结果终不免失败，所不



同的仅是 3、4 年和 7 年的差别而已；然则 7 年的时期在历史上是如何短暂的一个时期呀。

因此中山先生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群众之罪恶”。^①

当时，中山先生对这国民会议的希望颇大。他在绕道北上，路过日本的时候，在上海丸中对长崎中国学生会又发表了一篇《学生当赞成国民会议》的演说。中山先生说：“我这次的行动，就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指解决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侵略）去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便可和平统一。国民会议开不成，中国便要大乱不已。所以中国前途一线希望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得成。要国民会议开得成，根本上还是要全体国民一致去力争。”

中山先生如此重视国民会议，既然把中华民国的前途完全系在国民会议上面，他对于国民会议召集法和选举法当然也有明确的适合人民规定的规定。首先，中山先生所召集的不是过去军阀用贿选办法举出，用武力来支配的国会。中山先生在上面所说的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讲中曾经说：“从前国会之所以没用处，是由于根本上选举议员的方法太草率……从前国会因为议员的本体不好，复受外界武力的压迫，所以在当时总是不能行使职权……前年曹、吴也赞成护法，召集议员到北京开会，但

^① 孙中山：《北上宣言》。



是那些议员总是不顾民利，只顾私利；到北京后不做别事，只要有钱，便去卖身，造成曹锟的贿选。现在全国国民对于那般议员完全失望。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白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正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

中山先生在当时曾经竭力反对段祺瑞用政府指定的善后会议和国民代表会议来代替中山先生和全国人民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为肝病所困，病倒在天津客寓中，可是听到了段祺瑞的这个阴谋以后，便扶病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段祺瑞，信中有一段说：“善后会议于诞生国民代表会议之外，尚兼及于财政军事之整理，其权限自较预备会议（中山先生主张在国民会议之前，先召集一个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这两个会议的组织法相同，不过国民会议的代表由各团体团员直接选举，人数较预备会议少。其目的在于使民意机关早日成立，以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国事。）为宽，而构成分子，则预备会议所列人民团体无一得与。夫14年来，会议之开屡矣，其最大者，有6年之督军会议，8年之南北会议，而皆无良果。揆其原因，实由于会议构成分子皆为政府所指派，而国民对于会议无顾问之权。既不能选举代表参列议席，甚至求会议公开而不可得。但是会议与人民漠无关系，人民不得不仍守其漠视国事之故习；而人民利害绝不能于会议中求其表现。”

人民选举国民会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各地人口比例选举。但是当时中山先生因为“真正户口册总没有调查清楚，如果用的确人数做基础，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事”，所以主张由已成立的社会团体的代表来组织国民会议。中山先生认为这样的社会团体有九种：（1）现代实业团体；（2）商会；（3）教育会；



(4) 大学；(5) 各省学生联合会；(6) 工会；(7) 农会；(8) 共同反对曹、吴各军；(9) 政党。各团体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中山先生所举出的九种团体是已经有了的大团体，他对于这九种团体以外的团体也并不一定要拒绝于国民会议之外，如果其余的团体内容组织都很完全，而且有会员大众做基础，那么仍旧可以要求参加国民会议。在上述九种团体中，中山先生对学生团体是很重视的，他在对日本留学生的演讲中，曾经要学生积极起来参与组织、宣传等工作。

中山先生认为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还有两件很重要的准备工作：这第一便是“在会议以前，所有各省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① 因为只有人民在取得真正的政治上的自由之后，才能够得到真正民意的反映，使各阶层人民都能积极来参与国民会议选举，成为这会议的基础。第二就是“为要使民众赞成国民会议，首先便要民众明白国民会议的性质和国民会议的力量”，所以除了要全体党员及各团体人员在民众中扩大铲除军阀政客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的宣传以外，更要求新闻记者“在新闻界……竭力鼓吹这会议”。^② 因为报纸上的公开讨论，是反映民意引起一般人民注意的最好工具。

最后便应该说到中山先生对于国民会议任务的解释。我在本文开首说过，制定宪法建立真正的民治国家是数十年来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任务之一，也是中山先生一生致力革命事业的主要目的之一。然而中山先生并不是崇拜任何宪法而不闻其内

① 孙中山：《北上宣言》。

② 见前引中山先生对新闻记者讲演。



容的人。在中山先生亲自署名发表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上，对于立宪派的政治主张曾经有过以下的一段批评：

“此派（立宪派）之拟议，以为今日中国之大患在于无法；苟能藉宪法以谋统一，则分崩离析之局庶可收拾，曾不思宪法之所以能有效力，全恃民众之拥护。假使只有白纸黑字之宪法，决不能保证民权，俾不受军阀之摧残。元年以来，尝有约法矣；然专制余孽，军阀官僚，僭窃擅权，无恶不作。此辈一日不去，宪法即一日不生效力，无异废纸，何补民权。迨者曹锟以非法行贿，尸位北京，亦尝藉所谓宪法以为文饰之具矣；而其所为，乃与宪法若风马牛不相及。故知推行宪法之先决问题，首在民众之能拥护宪法与否。舍本逐末，无有是处。不特此也，民众果无组织，虽有宪法，即民众自身亦不能运用之；纵无军阀之摧残，其为具文自若也。故立宪派只知要求宪法，而绝不顾及将何以拥护宪法，何以运用宪法；即可知其无组织，无方法，无勇气，以真为宪法而奋斗。宪法成立，惟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颠覆之后耳。”

所以，在列强及军阀之势力未颠覆之前，中山先生对于国民会议所课的任务却不是制定宪法，而是解决当时人民所渴望解决的两个问题。中山先生在对于留日学生的演讲中说：“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一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

以上是中山先生对于国民会议所发表的意见中最重要的几点。我们今日要检讨政府所公布的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以及宪法草案，在法在理都应该以中山先生的遗训做出发点才对。



三、人民的希望

自从宪法草案和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公布以后，虽则在报纸和杂志上未曾发动什么广泛的讨论，但是各方面发表的意见仍是不少。综合大多数人的意见，无非是希望政府要依照“延揽英才使其参政”和“团结人心集中力量”的精神，遵守中山先生的“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的遗训，来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国宪法。

4月22日中常会对于去年所通过的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做了几点修正。最重要的是：原来规定国民大会的当然代表只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如今则规定候补执行、监察委员也列为当然代表。所以国民大会的当然代表已经由170人而增加到了260人了。除了当然代表以外，更在原来规定的依区域选举、职业选举和特种选举等选出的1200名代表以外，又加上了国民政府指定的240名代表。所以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之中，当然代表和政府指定的代表是占去了500个名额。不过原来选举法中所规定的对区域选举和职业选举的圈定办法已被取消。可是现在大多数地方的区域选举和职业选举的初选已经办理完毕。这些选举是在当地行政机关和党部的指导之下进行的，这对于当选代表成分自然有绝大影响。

所以为了国民大会真能达到宣达民意的任务，很多人希望“政府对人民的政治信仰不加限制”，^①希望“学生团体应有代表权，公民宣誓应即废除，竞选时任何国民皆得用个人或政治团

^① 《立报》，1937年4月16日。



体名义，自由发表其主张”。^①从前中山先生主张在户口册未办理好之前，由九种社会团体代表来组成国民大会。我们如今虽然不一定要反对地区选举的办法，但至少希望在地区选举之处，多加一些团体代表名额。在中山先生所举九种团体中对军队有“共同反对曹、吴各军”的限制，如今这种限制当然已不存在，除附逆的汉奸军队以外，都应该有选举权。至于此次选举法中，未曾有中山先生所非常重视的学生团体名额，是非常可惜的，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学生是中国人民中最有觉悟最关心国事的分子之一。

如果现在不能再来修改选举法，重新举行选举，那么至少希望政府能够在240名指定代表和155名特种选举的圈定名额中，多让政府圈子外的人材来参加，同时希望政府能够保证人民对于已当选的初选人有自由的检举权。如果他们平日的行动有违反人民利益的地方，或者在选举时有舞弊的情节，要奖励人民自由告发。如果所告发的是事实，那么被告发者应剥夺其代表权，并且交司法机关严办。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实行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在“会议以前，所有各省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宣传讨论之自由。”

至于说到国民大会的任务，那么由于现在的环境同中山先生北上时不相同，如果国民大会果能给人民以真正民主的宪法，人民当然欢迎之至。但是当时中山先生对于国民会议所提出的两个主要任务（即解决民生问题，打破列强的侵略）仍旧应该是未来的国民大会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过，如今以全力抵

^① 《北平晨报》，1937年4月8日。



抗某一帝国主义的任务暂时已经代替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口号；同时解决民生问题也应该看作是改善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活，以提高民族抗战能力的问题而提出来讨论。换句话说，民族抗战问题应该是成为未来的国民大会所应讨论的主要问题。若是丢开这问题不谈，那么未来的国民大会即使制定了一个完全合于民意的宪法，是不够满足人民的希望的。

此外，各方面对宪法本身的批评，如《自由评论》、《大公报》、梁实秋、程经远、广州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等，不主张把“三民主义”字样冠在中华共和国之上，如罗隆基、王赣愚先生等认为大总统权限不应如此大，《时事新报》认为宪法上对人民最低限度民主自由未有明确规定，《国闻周报》认为国民大会会期规定每三年一次未免太长等等，^①都希望政府当局加以详细考虑，尤其关于大总统权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① 《对于国民大会舆论的集锦》，载《新学识》，1（7）。



如何“维护民族工业”*

6月19日上海市商会举行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市商会主席王晓籁先生在大会开会词中对于一年来国内工商业发展情形及其前途有一个概括的叙述。他在阻碍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对于敌人的经济侵略和关税的不能完全自主这两点相当重视。例如在他的演词中有一段说：“……又况走私风气，日益蔓延。华北之纺织业，外商已有喧宾夺主之势；而其他之轻工业，亦正在逐渐为（外商）大规模之经营所一手垄断。凡此情形，国内市场已有日缩日小之虞。吾国关税，本来还够不上并世各国之所谓保护程度；但近来则并此基础，亦日在动摇之中，始而大规模走私，继且公然要求减税，正恐粗具规模之国货工厂，将有被迫至不能自存之势……”

在市党部代表的训词中也说：“……目前走私的风气，仍是继续不绝。我国工商业随时随地有受其打击之虞，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一种隐忧……”

这种见解自然是完全正确的。中国民族工业之所以不发达，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旧列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自然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在近年以来，敌人所发动的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1937，3（7）。



走私运动，竟可以说是除了武装占领而外，敌人亡我国家民族的主要武器。所以在今天如果要谈到发展民族工业，那么首先就得粉碎敌人的这个恶毒政策。不料就在这次市商会代表大会所发表的《维护民族工业宣言》中，却把这个民族敌人忘记了，而且把枪口换了一个方向。在这宣言中有一段说：“……近期以来，工潮起伏。见诸各报之记载，各业之声诉者，已使甫经萌芽之工业，深感不安之影响。而其余波复延及无锡、长沙各处，窥其普遍之动向，似有摧毁民族工业之可能……”

所以在这宣言中，“摧毁民族工业”的已经不是民族敌人而是国内的工潮，即劳工阶级了。

当然，在这国家民族生存陷于十分危急的时候，全国各阶级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如何同心协力抵抗外来的民族强敌。劳动者固然不应该在这时机来“摧毁民族工业”；但是在资本家方面，也应该在协力对外的共同基础上，稍稍顾到劳动者的生活。

一年以来，随着工商业景气的稍稍恢复，工潮的确也比往年增加了。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工潮的经过情形稍稍注意一下，我们不难看到：劳动者大体上从没有提过资本家所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大多数罢工工人所提出的要求，而且还说不上是改善待遇，而只是维持他们向来的饥饿的生活水准而已。

因为自从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以后，国内工商业大受影响，各工商企业主便乘机减低职员雇工的薪金工资，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劳动者在当时因为市商的不景气，更受着失业的威胁不得不忍痛接受。

然而去年一年以来不是“以长江各省农产之丰收，法币之稳定，筹码之充足，因此使消费者之购买力增加，而货价亦逐渐上腾，致若干部分商业，颇呈剥极而复之象，值得吾人称庆



……”了吗？^①然而劳动者的工资却未增加，工作也未减轻。而且因于“筹码之充足”和景气的恢复，生活程度却增高了。据国定税则委员会的统计：“上海生活费总指数，如以民国15年为标准，作为100%，中间曾经随上海市面衰颓，指数跌至100%以下，惟比及去年5月，则已回升至111.1%，今年4月，再升至117.4%，而上月份之指数，则涨至118.7%，实为自民国20年份以来之最高纪录。”

所以在今年4月间，如果在劳工方面提出了增加两成工资的要求，实际上也不过是恢复经济危机前原有的饥饿生活而已。而我们的工商家却就要以“摧毁民族工业”的大罪加诸于劳动者身上，这不仅是颠倒是非，而且是放松了民族工商业的真正敌人。

末了，我们仅以6月20日《立报》社评中的一段话，告我们的工商界领袖：“……中国民族工业的敌人是‘外货倾销，走私汹涌’，一切爱护民族工业的人们应该合力制止走私，建立关税壁垒。如其仅仅着眼于劳动力的低廉，则徒然为外厂造机会，对民族工业并没有什么利益的。”

① 见上述商会会长开会词。



最后胜利的把握在哪里？*

自从上海战事发生以后，全国性的抗战局势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中日大战一旦正式开始之后，就“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报告）。所谓“牺牲到底”当然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命运跟敌人作孤注一掷的赌博。我们是有了“最后胜利”的把握才抱牺牲到底的决心的。

然则我们的把握在哪里呢？我们凭什么来取得这胜利呢？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物的因素，即国家的财力和军备的发展程度；第二是人的因素，即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对战争的态度。在这两个因素中，人的因素起有决定的作用。在一般的战争中如此，在以弱国抵抗强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如此。这不仅因为物的因素是人所创造的，而且因为物的因素是要人来使用的。没有作战决心与觉悟的士兵（不知道为什么而牺牲），那么有了新式的武器也是为别人预备的，而这种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1号，1937年9月20日。



军队也只好做敌人的“运输队”（以自己的武器运给敌方——被缴械）。而许多人对于抗战前途所以悲观，也就是因为太重视了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以至无视了——人的因素。

我们的飞机大炮或许没有敌人的多，我们的钢铁生产或许不能同敌人相比；然而我们有一致希望抗敌作战的4.5亿人民；而日本国内6600万人民是一致厌恶战争的（不用说，2800万的殖民地人民更加厌恶战争了）。我们的战士抱着为民族生存而牺牲的决心上前线去作战；而敌人士兵的胸怀中所裹着的却是符咒、千人针之类的东西；“文明国”的军队要依靠封神榜式的“法宝”来维持军心，就已经预先注定了敌人的必然灭亡的前途。我们在物质因素上的弱点只有用人的因素的优点来抵补。我们所能够凭借着以制胜敌人的主要点也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就在民众的力量上（当然，这并不是轻视物质的因素）。

然而民众的力量好像是天然的富藏。天然的富藏一定要待人工加以开发之后方能被人享用；民众的力量一定要加以组织训练之后才能表现出来。而且没有训练的无组织的民众容易发生惊慌，引起纷扰，在战时有这种情形可以妨碍军队动作，扰乱后方治安，成为抗战期间的一种反方面的力量。只有热情的民众加以训练和组织之后，才能成为永远不会枯竭的抗敌力量的源泉，成为前线军队一种后援。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对于民众的一般的训练组织工作，做得还是太少。

在我国4.5亿人民之中，农民至少要占3.5亿。而对这3.5亿农民的训练组织工作是做得更少了。所以在目前，农民大众的训练和组织工作应该是全国抗战总动员中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以斗争的坚决心和组织生活的习惯而论，农民不如



产业工人，以知识程度而论农民又不如都市的小资产者；然而农民占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并且战争爆发之后，许多都市中的工商业陷于停顿，大批工人、小市民都回乡去了，尤以沿海的战区为然。这更增加了乡村救亡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全国的农民未动员，那么前线的军队和都市中的民众（即使都市中的民众已有组织已受训练的话）还是陷于孤军作战的局面中。这种作战即使在最后还是胜利了，然而所获得的胜利一定小于应得的胜利，所付的代价一定大于应付的代价。

在目前，农民听到征募兵役还要逃避；军队需要人夫、牲口、车辆、船只的时候，还要通过地方当局用行政力量去征取。所以，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但是如果农民有了组织和训练之后，那么军队所到的地方，随处有现成的运输交通队为它服务，军队需要补充的时候，随时可以吸收到受过训练的（政治的，军事的）自觉的战士。此外，如防止汉奸活动谍报向导等工作，以至组织游击队扰乱敌军后方，辅助国军作战等事，都可以交托给可信赖的农民队伍来执行。

再则，农民是我国的主要生产者，是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者。提高农民的生产力，也就是增强全国作战的物质因素。又如在作战过程中，我国弹药枪械的补充（尤其是新式武器的添置），大半要仰给于国外。如果我们不能输出现金去购买这些东西，那就只好增加我们的出口以换取外汇。在我国出口货中，主要的是农产物。如茶、丝、桐油等物的出口量在近年来虽因外货竞争，已经一落千丈，然而仍旧有数千万元的数目。如果我们在抗战期内能够以非常手段来把这些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增加1 000万元，那就是多为前线的战士取得1 000万元的枪械弹药。这是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计划呢？当然不是。一切全靠乡村



工作者的努力。

所以，我们希望都市中热心的爱国分子能够有一部分回到乡村中去工作，而原来在乡村中工作的人员，希望他们能够急速改变自己的工作内容，使之适应战时的需要。

现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已经拟了个战时乡村服务工作大纲，对农民的组织和训练以及农业生产及粮食贮藏都有相当具体的建议。同时听说其他许多团体也有同样的运动发起。我们希望各方面的力量能够汇合起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



《非常时期乡村工作大纲》的修正*

在韬奋先生编的《抵抗三日刊》第九期登载有恽逸群先生的一篇论文《组织农民的主要问题》。恽先生在开首引了一个去访问他的青年所说的话：

“怎样才能够把农民组织起来呢？有许多先生开出一个方案来说农村中可以做什么什么，要做什么什么；还有许多先生叫我们回去时和乡公所等机关协力工作，叫我们做群众中的一员，而不要以领导者自居。这些话固然都不错，但前者仅是局部的工作或组织以后的工作纲目；后者仅为回乡工作的态度和方式，都没有接触到主要的根本问题。我们知道要组织民众必须把所号召的目标和民众实际生活发生联系，仅仅是‘抗日’或‘打汉奸’是不能使农民组织起来的……”

恽先生对于抗日动员和改良农民实际生活的联系说得愈加肯切：

“要人民‘爱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国’之‘可爱’，如其‘国家’——在农民的心目中不如说是官厅——和人民的关糸仅是‘完钱粮’和‘打屁股’，你无论如何对他讲，是没有办法叫他爱国的！要农民爱国，必须改善农民生活，解除农民的

* 本文原载《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第2号，1937年10月10日。



苦痛。”

那位青年所说的“许多先生”不知是谁。不过最近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先后曾经在第1期《文化战线》、第5期《抗战》和第1期《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发表了一个战时乡村服务团工作大纲草案，同时本文作者更另外写了几篇文章在各个刊物发表。所以作者颇有理由疑心自己即是那位青年所说的许多先生（或其中之一）。作者对恽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在大体上是完全同意的，而且愿意在这里把恽先生所提及的问题加以进一步的发挥；但同时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历来对这问题的意见也加以说明。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人向来反对脱离了农民生活现状而从事空洞的抗日号召的。作者在去年出版的2卷7期《中国农村》（7月号）上发表的《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那篇文章中，就曾经说明了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密切联系。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曾经说过：“每个为民族解放运动努力的人，同时也应该为农民大众的解放而努力。因为如果不让农民大众解除自己身上的苛重的封建桎梏，那么怎样使农民大众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中，尽量发展他们的战斗力呢？”上面这句话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同人对本问题的认识。

这次沪战爆发后，上海有许多热心的爱国运动者从上海回到内地去做乡村工作，而原来在乡村中的乡村工作者为了适应抗战开始后的新的要求，也有急速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的必要，他们都要求能够具体地告诉他们，目前在乡村中“可以做什么什么，要做什么什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会为了适应这客观要求，就在匆忙中拟了一个非常时期工作大纲草案。在当时因为恐怕上海同内地的交通要发生障碍，因为我们希望第一



批回乡去工作的朋友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大纲草案随身带了走！所以这大纲是在极短促的时间中拟成的，而且这大纲在刊物上发表的时候也声明只是一个草案，希望大家的批评和修正的。

因为这大纲并不是说明我们对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整个认识，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政治纲领，而只是为乡村工作者列举了若干在抗战爆发后马上应该执行的工作项目而已。当时在我们的意识中，改善农民生活是农民运动中的必要的经常工作，所以在起草工作大纲时倒反而没有把它列入，在恽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使我们感觉到如果不把农民生活改善的工作列入大纲，的确有可能使人发生误解，以为抗战期间农民的动员是可以脱离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而谈的。所以，作者个人是很同意在研究会的工作大纲草案甲、乙两项以外，更加上丙项：农民生活的改善。这一项中应包括：在现行政治机构和现行法令下所允许的经济生活的改善（如实行二五减租，严禁重利盘剥）和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但是希望每一个乡村工作者在执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应该了解，当前的中心目标不是土地革命而是求得民族解放的对日抗战，我们的工作绝对不能越过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立场。

最后，我不能同意访问恽先生的那位青年把工作大纲草案中所列甲、乙两项工作看作是“局部的工作或组织以后的工作纲目”。因为，第一，要组织农民只能在实际抗敌工作中去组织他们，脱离了工作而去组织农民，或是凭空去组织好了农民再来执行具体工作，那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使群众运动走入绝路；第二，若是说到具体工作，那么大纲中所列的各类工作都应该是目前抗战中动员农民的主要项目。不错，这些工作应该是同农民生活改善联在一起的，然而如果以为应该在改善农



民生活的总目标（即那位所说的“主要的根本问题”）之下先把农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之后，再来执行抗战中的具体工作，那就不仅是对于问题（民族解放的任务和农民问题的联系）的了解太机械了，而且是忽视了当前的真正的总目标——对日抗战的总动员。

恽先生在结论中说：“因此我认为当前的农民运动应该是：以抗日为目标，发动农民的组织；农民组织起来之后，以自己的力量解除苦痛改善生活……”恽先生这种说法，也是有语病的，因为这样说法恐怕又会使人发生另一极端的误解：即以为当没有在抗日的总目标之下组织起来之前，解除农民苦痛改善生活的工作是完全不能做的。如果读者对恽先生组织两个字了解得太机械了一些（即是了解成为农民团体之正式成立）那么这误解的恶果将愈加严重了。当然我相信，这种误解并非是恽先生的本意，然而目前一般乡村工作者对民族解放和农民生活改善这两个任务的联系，以及对于具体工作和农民组织的联系本来都普遍地存在有上述那种机械的了解；而他们这种错误观点是很有可能因上述这种语病而扩大的。

但是整个说来，恽先生的意见是很可宝贵的，他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所提的工作大纲草案给了很重要的指正，这是值得大家感谢的；同时，我们相信就是那个工作大纲的具体项目，亦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希望全国的乡村工作者多多指正。



抗战和农村*

一、“以农立国”的新解释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可是我最不喜欢听人家说“以农立国”这一类话。因为许多人在自称“以农立国”的时候，其意思大有以这种落后的社会经济状态“自夸”的神气，或者是企图用这句话来替落伍的“摩登化的”“重农主义”政策作辩护，想叫中国永远停滞在这种落后的农业社会的阶段上。但是“以农立国”这句话的本身并不坏，只要我们不把这句话作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理想，而作为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现状的一种说明。

我们中国号称有 4.5 亿人口，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依靠落后的农业生产来维持他们的生计的。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这个落后的农业生产上的。在目前，我们非但用不着掩饰自己的落后的社会经济机构的弱点，而且只有认清了它以后才能动员我们的主要的经济基础，动员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口来铲除那个阻碍我们改进这种落后的农业社会的最凶恶的敌人——日帝国主义者。我们应该了解：决定我

* 本文原载《东方杂志》，第 34 卷，第 18~19 号，1937 年 10 月 1 日。



们抗战胜利的主要人力和物力的来源是在农村。站在这个意义上解释“以农立国”，才能一扫过去这句话所带有的落后的封建气息，才能认清我们抗战胜利的把握在哪里。

如今，我们分开农业生产和农民动员这两点来说明农村对于抗战前途的重要。不过因为所包括的范围很广，我们这里只能把问题列举起来而已。

二、农业生产

农业本来是我国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过随着战局的延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将愈益增加，这或许是很多人还未曾预料到的。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战争爆发后的初期，工业经济虽因军需生产的增加而呈一时蓬勃之气；可是战局愈延长，因于燃料、原料和人手的缺乏，工厂便逐渐停闭。在大战末年，工业先进国家如英、德等国的工厂都大部停闭了。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在世界大战和革命内战之后，工业生产差不多完全陷于停顿，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到了自给自足的状态。至于农业生产，在战争时期虽然也不免遭受严重打击而趋于衰退，然而终不至于完全停顿。推源其故，在表面上则因工业组织比较复杂而脆弱，原料及燃料等要仰给于外界，在战时容易断绝。但是此外，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便是工业生产产品可以暂时断绝，人民生活除了感受许多不便以外，终不至根本受到威胁。但是农业生产如果一旦中断，那么马上就要使全国人民发生饥荒。再者，在工业方面，生产都是资本家所经营的，只要他们的利润受到威胁，他们对于事业便不愿继续经营了。但是在农业方面，



就是经济发展的国家中，小农经营仍旧存在着，尤其像在中国的农村中，小农经营要占绝对优势，他们种田不是为了奢望利润，而是为了生存。往往他们耕种所得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可是他们还在耕种着。因为他们离开了土地，便无法生存，所以即使在非常时期，农业生产也只有衰退，但决不会完全停顿的。

我们中国的工业本来就很幼稚而落后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基础很脆弱。又因为本国的重工业不发达，所以我们的轻工业的对外依赖性很大。而且大部分的工厂是开设在沿海各省的战区和邻近战区的地点，受战事的破坏也更大。如今虽然有人发起把工厂迁往内地去的运动，但是这事情并非轻易可以办到的，而且即使能够办到，其损失一定还是很大。所以，虽则站在军事的甚至经济的观点上说，我们在抗战过程中应竭力维持国内现有的这一点幼稚的民族工业，对于若干与军事直接有关的工业部门，而且还有加以扩充的必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准备着应付工业生产衰落或陷于停顿的境遇（而且，这种衰落的程度比工业先进国要更厉害）。很有可能在有一天，我们的农业不仅成了军粮民食的惟一来源，而且会成了军费枪械的主要供给者。

大家知道，军备的缺乏是我们最大的弱点（与敌人比较）。虽则我们的民族解放的革命战争并不完全依靠武器来取得胜利，然而对此也不能不谋补救方法。轻便的军械我们是可以自己制造一部分的，但是重军器和新式军器便不得不完全依靠外国输入了。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取得这些军火呢？完全靠友邦的赠送或赊欠是不可能的。然则，用现钱去购买吗？我们又没有这许多现钱。最可靠的办法还是用输出商品的办法去换取外汇。可是我们输出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的出口贸易中，工业生产品



是向来不足称道的。在抗战期间，想增进我们的工业品出口量是更无希望了。惟一可靠的出口货还是农产品。所以我们的农业生产的情况对抗战前途的确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调整农业生产，实在是抗战期中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大家知道，在我们自称“以农立国”的国度里，农产品的入口量仍旧是一笔巨大的数目。根据今年4月间发表的中国银行业务报告，主要进口农产品在以前3年平均输入总价值为2.26亿元，去年因国币汇率变更，外国农产品的价格高昂，故入口量大为减退，但是仍旧有1.72亿元。^①这里所谓主要农产品就是米谷和小麦。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非但不能以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去向外国换取我们抗战期间所迫切需要的军火，而且要把我们购买军火的现款分出一部分去购买粮食。所以，我们战时的农业政策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增加粮食生产，达到粮食的自给。

我们战时的农业政策的第二个主要任务便是：增加而且调整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物——尤其是出口农产物——的生产。在这里，问题不仅在于一般地增加生产，而且在于调整生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几年内，我们在中日经济提携的总路线之下（这是政治上的对日妥协的结果），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敌人的“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政策，把我们的农村经济向单一的商品作物化——植棉——的路上推移。说明白一些，便是我们上了敌人的当，把中国的农村变成了日本纺织工业的原料生产地。诚如章乃器先生所说，这种“向敌人卖身投靠的农业政策”，是敌人设计下的“一个毒辣的阴谋。这一服经济提

^① 《申报》，1937年4月4日。



携的毒药，幸亏抗战发动还不太迟，幸亏我们吃下去还不很多；否则旷日持久，再让产量增加一倍，那我们就真只有死路一条了！”^① 因为我们棉产有一大半是输往日本去的，或是由在华日本纱厂所收买去的。抗战一爆发，这条去路就完全断绝，再加上自己的纱厂的停工，使棉花的销路大大地跌落了。据章乃器先生估计，“今年棉花产量有 1 960 万担，倘使平均以 30 元一担收买，就差不多要动用 6 亿元的资金”。然而“今后一年间的销数，连少数的出口在内，至多只能有 800 万担……那就是说，这 6 亿元的收集棉花款项，大半要变成长期呆账”。^② 在目前，急如星火的军需用款是那样多，要用偌大一笔现款去囤积这种不急之物的确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然而为了维持棉农生计，保持国力起见，这是非常必需的。依照目前的情势，或者不免政府虽费大力来“忍痛救济”，而农民仍旧要吃大亏“忍痛脱手”。因为目下世界棉价大跌，已经只有去年价格的一半左右了。然而，我不同意章先生所主张的，为使明年的棉产自然减少起见，在政策上故意“使种棉的人比种粮的人吃亏”。这是无政府状态的商品经济的一种不合理的“调剂”生产的办法。在这种“调剂”政策下，隐藏着小生产者破产的凄惨景象。在全国团结一致抗战的现今，我们可以比较合理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来减缩棉花的耕地面积。或许有人会笑我迂腐，认为在民众没有组织的时候，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可是要知道，如果民众不组织起来的话，那就是抗战也难有胜利的把握的。

棉花的种植面积，我们是应该有计划地去减缩它。但是有许多出口农产品的生产我们还应该有计划地去奖励它，提高它

①② 《申报》，1937 年 10 月 2 日《专论》。



的产量和品质。例如茶、丝本来是我们的大宗出口货，近年来曾经因于世界经济危机和日货竞争的影响而惨跌过；如今我们应该利用国际间因同情我们的抗战而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来振作我们的茶、丝生产，恢复甚至增强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旧有地位。在这里还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茶、丝的价格比棉花高，所占地位比较小，在包装和运输方面都是比较适宜于战时环境的一种出口货。此外，如桐油和蛋制品的出口，在近一二年来都有相当的增加。我们对于这些农产物的生产都应该给与提倡和指导，希望能够用这些出口农产物去换得我们在抗战时期所最迫切需要的军火和工业品。

末了，我们来简略地说一说，抗战期内增加粮食生产和某几种出口农业品的途径。在这里，我们应该先了解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很多人以为中国农业经济的衰退原因是：技术落后，资本缺乏，农民知识缺乏等等。其实这都是农业经济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残余的束缚。在抗战未完成之前，这两个原因要根本铲除是不可能的，然而相当的解决是可能的。例如帝国主义的压迫虽不能完全解除，但是对于它们的经济侵略是可以给与限制的（战时对外贸易的被封锁和统治对于这一层却有很多帮助）。又如土地问题虽不能完全解决，然而农民负担之相当减轻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相当苏醒我们困急的农村，充实我们抗战的实力。此外，对于改进农业生产相当有帮助的还有下列几项工作可做：

1. 改良农业技术。在目前条件下，要彻底改造农业技术是不可能的，但初步的改良是可能的（如推行改良种籽，兴筑简单小规模的水利工程，推广科学的除害虫法，推广改良农具



等)。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改造现在许多官办的农业改进机关的只吃饭不管事的衙门派头。

2. 举办垦殖事业。这不仅可以增进生产，而且可以安插失业工人和难民。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政府和公私团体已经在考虑举办这种事业，但同时希望中央政府对此做一个通盘计划，并且给与有力的财政上的援助。

3. 推广农村中各种合作社。合作社组织应大众化和民主化，破除过去银行和少数上层分子的操纵。

4. 扩大农村放款。这应该由政府同金融界协同办理。注重在种籽、农具等贷借，避免过去常有的中间分子操纵情形。

5. 改善农产运输。在过去往往某几省输入大批粮食，而某几省却闹着粮食过剩、谷贱伤农的问题。这原因不仅在于交通的不便，而且更有政治上的原因。在抗战期间，交通机关被破坏很厉害，我们应该以极大努力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至于政治上的原因，在目前自然应该完全消灭了。

实行以上各项工作，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农民的动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不论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基本方针也好，抑是实行其他治标的农业改良政策也好，都没有可能成功。所以，我们接着就来讲农民动员问题。

三、农民动员

一般人谈农民动员问题，都是根据政治和军事上的理由。但是，在今天来谈农民动员问题，也有很重大的经济上的理由。例如上面所提出的减轻农民负担固然要动员农民大众用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然而一般的农业生产的改进也需要有农民大众的动



员。

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一个便是生产资料。上面我们曾经说过，在目前要根本改造农业技术是不可能的。这意思便是说，在目前，农业生产的改进不能以生产资料为其动力，而应该以劳动力为基础。在历史上，手工业工场制便是生产技术（生产资料）根本上未有变动，而仅仅依靠劳动组织（即劳动力的配置）的合理化来增进生产力的一个先例。我们现在不能根本改造农业技术，但是可以改进农业中的劳动组织，使之合理化。我们要使得农民在多方面来想法增进他们的劳动效果，并且使他们理解，他们多生产一石谷，不仅他们自己多增加了一石谷的收入，而且是为抗战多增加了一分实力。显然，要做到这一步非有一番切实的组织训练工作不可，即是说，非有农民的动员不可。

大家对于农民动员在政治军事上的效果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抗战要达到胜利必须要有全民的动员。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农民未曾动员起来，那么所谓全民动员是一句空话。尤其随着抗战的延长和都市经济的衰退，都市人口逐渐向乡村移动；因此广义的农民动员，即是一般乡村人口的动员，其意义将愈益增加起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乡村人口的总动员，那么在消极方面至少可以做到防止乡村中一切汉奸的活动；在积极方面便可以协助军队做交通运输、谍报等工作，完成人民在入伍前的军事政治教育；更进一步，便可以编为游击队与敌人直接作战。晋北八路军所以能够连战皆捷，就是因为他们能够注重政治工作，实施农民动员，达到军民合作。所以农民动员可以说是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但是要实现农民动员有两个先决条件：这就是改善农民生



活和提高农民政治地位。

许多下乡去宣传救国的人总是怪农民没有爱国思想和民族观念。但是如果在农民的生活实际经验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他们的私人的利益联系不起来，那么如何叫他们对于国家和民族会发生爱护的心，以至要他们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呢？有人说，在过去，国家——即农民心目中的衙门——同农民的关系，就是要他们“完钱粮”和拉他们来“打屁股”，我想这句话并非过激之谈。然而，即使如此，一般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思想仍旧不会在“识字人”之下，不过他们不大会表达出来而已。他们的这一点爱国思想和民族观念还是我们的敌人教育出来的，因为农民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和别人的传闻中，知道国家如果被“东洋人”灭亡以后，他们的生命财产将更无保障了。如今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农民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以便增强他们的爱国心和民族思想。要达到这目的至少要把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所颁布的关于减租减税、废除苛杂、取缔高利盘剥等法令和决议付之实现。

但是最近从内地传来的消息却很使人失望。农民的旧的负担非但未曾取消，而且又加上了一层新的负担：“救国捐”——即摊派救国公债。救国公债的发行是必要的，是人民应该的负担。但是，第一，根据“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原则，应该多请有钱的人负担；第二，即使在农民中发行救国公债，也应该用劝募方式，而绝对不能摊派。据一位朋友从内地来信说，在该省乡村工作人员的一个会议上曾经提出个在乡村中摊派救国公债的问题来讨论。大多数的出席者都主张用摊派的方式。他们说，上级的命令催得很紧，如果用劝募方式叫他们募捐，恐怕要误公事。不过这中间有一部分人主张先摊派以后，再同农



民做解释工作，如此对公事和农民两方面都可以顾全到了。而另一部分人则根本认为农民没有知识，缺乏爱国心，解释是无用的，他们所根据的是古人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我想发行救国公债而用摊派的方式，本来已经是要不得了，摊派了而连解释的工作都不愿意做，那更会影响到我们为保证抗战胜利所不可缺少的全民族团结。不错，在专制时代，统治者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对于他们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他们维持统治的理由和内幕都是不可告人的（在那时连说谎也不大像）。如今我们发行救国公债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也是为了争取农民自身的解放，这理由非但可以告诉农民，而且必须要告诉农民。若是要根据封建时代的统治原则来摊派救国公债，那么这非但将会发生政治上的恶果，而且对于推销救国公债这工作本身来说，也是不利的。所以，要能实现农民动员争取抗战胜利，先得把乡村行政人员的这种专制思想肃清，把乡村行政机构民主化，换言之，要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论日军进攻华南^{*}

本月 12 日晨 4 时许，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至 22 日下午，日军已经开入广州市区。日军进展如此迅速，恐怕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尤其因为广东是革命策源地，军心振发，民情激昂。我们把广东人民在过去革命中的贡献丢开不说，即以这次全国抗战以后的事实而论，粤省战士在淞沪保卫中，在华中战场上，都曾显示过他们的勇敢善战、为国牺牲的精神，在整个民族解放史上留下了不少光荣的事迹。而这次日军进攻华南的时候，他们反不战而退，把自己的家乡委弃给敌人，让后者去蹂躏，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敌人更乘机造谣，企图动摇人心，破坏中国抗战的根基；爱国同胞亦因为不明真相，而发生了种种猜测，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负责当局对于广州失守的经过情形有所宣布。但根据报纸所载的消息，凭我们对于国内外局势的基本认识，对于促成日军南侵的原因和广州失陷后可能发生的影响，已经可以做出若干一般的结论来了。

日军侵占广州的动机是很明显的，因为这是南中国的门户，是进攻南洋的根据地；尤其是在上海、徐州相继失守，日军向武汉开始进攻以后，广州已成为中国对外联络的主要道路，是

* 本文笔名叶舟，原载《译报周刊》，1937，1（3）。



抗战军需的重要来源。站在日方主观需要来说，早有切断中国抗战中这一大动脉的企图。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到今天才动手呢。关于这一点，伦敦《每日电闻报》曾经有这样的估计：“日本对于华南之攻势，早定计于数月之前，但因其地迫近香港，深恐引起国际纠纷，而延缓至今，日本显因毅然出此之机会已至，值得冒险一试，故乃决议出师……”我们把英国报纸的这句话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在过去，日本人因为顾忌香港的英国人势力（其实还有越南的法国人势力），所以未敢向华南进攻，在捷克问题解决之后，事实暗示日本军阀：英法的势力是不必顾忌的，老实不客气地进攻，反而能够取得让步。因此在慕尼黑会议开幕之日（9月29日），主张对英谈判的日本外相宇垣便被挤出了内阁。在日本内阁改组后不到两星期，日本军队便在香港以东的海岸登陆，又经过10天之后，日军已横过广九路，占据了广州。从此香港已成一孤岛，英法在华南的以至于南洋的利益又直接在日本武力的威胁下了。所以，从国际关系上讲，日军南侵可以说是英法在捷克问题上对侵略者妥协投降之直接结果。在“世界的这一角对侵略者做了让步，将促成世界另一角上侵略气焰的高涨”——这是早就有人说过的。英法利益之受威胁，也可以说是英法妥协外交的自食其报。

但是，日本攻入广东的结果，第一个直接被牺牲的不是英法，而是中国。被奸淫屠杀的人不是别国人民，而是中国人民；被劫掠烧毁的，不是别国人的财产，而是中国人的财产。你如果是中国人，那么在今天决无空暇再为别人利益之被侵犯而悲哀，现在正是中国人估计自家的损失，反省自己有否授给敌人以进攻的机会，考虑如何阻止敌人前进，并且进一步作准备反攻敌人的时候。



从国际关系上说，英法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所表现的软弱态度，当然扩大了日本的侵略欲望。但是中国方面对于登陆日军若能给以相当抵抗，使在广九路以东、东江以南惠州淡水一带相持若干时期，那么在军事上可以造成极不利于日本的一种局面。所以，日本在事前会抓住中国方面的某一弱点，日本军阀即使看到了英法的软弱可欺，亦不至于在华南从事这样的军事冒险的。

我们可以从中日双方的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战略来证明上面的估量。

大家都知道，以目前中日双方整个国力而论，日本对中国的优势是很相对的，所以日本的进攻是有限度的。从时间而论，日本利于速战速决，而中国则利于持久抗战；从空间而论，日本利于集中兵力突破中国防线的一点，而中国则宜于全面抗战，到处发动，牵制日本的兵力，打破它的中央突破的战略。中国的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培养抗战实力，以争取最后胜利。这次日本进攻华南，正在武汉久攻不下，在大江南北的战场上已经丧失了数十万人实力的时候，双十节德安前线，日军覆没两个师团，这正是证明日军正面的力量是如何单薄。日军自称是占领了华北，但是在事实上，它在这里被牵制了“11个师团，兵力过30万，不论进占风陵渡和垣曲或回攻晋冀察边区，都不能抽出4万人以上的部队来。”（见汉口《新华日报》的《论目前抗战形势》，《译报》10月15、18日转载）在这种情势之下，日本分兵南下，再在广东去开辟一个新战场，以常识而论确是不合于日本的作战原则的。

因为从军事观点而论，日本进攻华南只有两个目的，这就是：（1）分散华方保卫武汉的实力；（2）切断广九路断绝中国



抗战的外来接济。但所谓分散实力是双方的，而且一般说来，日方进攻华南应该是中国分散了日方进攻武汉的力量，而不会是日方分散中国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分析中日双方基本战略的时候已经大体说明，后面我们在分析此次日军在华南上陆的实际情形的时候，还要再度提及。至于断绝中国抗战的外来接济这一点，日本所能达到的也是有限的。因为第一，到今天为止，粤汉、广九二路虽然是中国对外交通的主要动脉，然而不是惟一道路；第二，如果中国军队对于日军进攻给与堵住，那么广九、粤汉二路的切断也不是绝对有把握的。

但是，事实的进展，有时是出乎意料的。此次华南的日军估计不过两三个师团，五六万人，自12日登陆以后，竟是势如破竹，在10日之内，便进到广州市。据外电报告，中国方面，似乎完全未曾抵抗，因此便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言：“予日人以政治上及军事上之便利，日方之宣传家自将乘此机会，以背叛中央政府之罪加诸粤省各领袖。及以漠视粤省防务之责加之中央政府。”这两个谣言中，尤其以后一个是日本人用来破坏中国国内统一的最恶毒的谣言。我们根据客观事实，首先予以驳斥。

在全国的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中央政府的一切调度应以全国全民族的立场出发。必要的时候，中央自然有从各省调动大军来对付敌人主力进攻的权力。必要时，且有可能放弃次要阵地，以便保守主要阵地。在这次大武汉的保卫战争中，中央政府确曾从广东调去不少军队。但是绝对没有把广东轻易放弃的计划。因为广东省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后方。所以广东省军队的基本部分仍旧留在原防地，其数量至少总不会少于华北沦陷区的正规军。华北的正规军能组织并领导民间武装牵制了日



本 30 万军队。这次广东方面上陆的日军只有五六万，以广东留下的武力来对付，即使不能阻止日军之上陆，至少也不能让日军如此轻易进展。中国守军如能联合人民武装对进攻日军步步抵抗，可以使日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日方如孤兵增援，则使中国方面反而达到了分散日方兵力的目的。所以，广州的失陷决不能说是中央当局忽视粤省防务的结果。

至于说粤省各领袖叛变中央也不是事实。因为据报纸消息，华军撤退时，粤省当局曾下令将所有公共建筑物加以破坏。又据最近传说，惠州驻军有一部叛变，致牵动广东全局。这消息确实程度如何，我们不敢断言，但至少足以证明粤省最高当局叛变中央之说是确实的。

我们根据事实分析，已经说明日军进攻华南在军事上是一种冒险，它所能达到的是很有限的。然则，日军在最近 10 天以内的成功是怎么解释的呢？日军的进攻除上述军事的目的之外。有没有别的目的了呢？

日军胜利的原因，或中国的弱点至少有以下几点：（1）人民动员不足，使防军得不到人民的帮助。这弱点直到今天为止，还是整个中国抗战的主要弱点，在广东方面亦同样的存在着。（2）军事当局的失职，沿海防务的疏忽。日军南进的计划，在日本报纸杂志上已热烈讨论过的，而且早已有人指出潮汕海陆丰及虎门都不是最好的上陆地点，最好最适当的地点是在大亚湾。可是据报纸消息，中国在大亚湾沿海一带，竟无防御工事，使日军上陆后，华方防军不得不因“技术上的错误”而全师后撤。

至于日军进攻的目的，除了上述两个军事的目的以外，更有一个政治的目的，就是想在政治上完成速战速决的任务。



据报纸消息在最近期间，中国内部确有人在重庆、汉口、香港以至于东京之间，奔走“和平”。这种传说虽然还未经证实，我们也不愿完全信以为真；但汪精卫先生的两次关于希望调停的谈话，是由英德两个半官通信社传布的，总不至于是别人造他的谣。汪先生在这两篇谈话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望和的情绪。汪先生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大亚湾日军上陆的前一日，第二次谈话是在日军进入广州的前一日。我们不能说汪先生的谈话与外间所传的“和平运动”及日军上陆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这三件事情发生在这时期，至少在客观上是中了敌人的政治阴谋。

日军在各战场上已陷于进退不得的僵局，欲在军事上求得速战速决已不可能，因此不得不策动政治阴谋，分化中国内部，动摇中国抗战决心。中国内部的妥协动摇分子之存在，形成了日军策动此政治阴谋的可能性，而日军进兵华南的目的，亦就在促成此政治阴谋之实现。据海通社 21 日东京电讯：“日本报章，现已放弃数日前所持之希望，即希望广东当局不与蒋介石将军合作……”但由此可见日本在进兵华南之初，是的确想以此促成中国内部的分裂的。日本方面有此阴谋是毫不足怪的。如中国内部对抗战没有一人发生动摇之心，而且都愿在最高领袖指挥之下为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战，则日本虽有此阴谋企图也无从施展他们的鬼魅伎俩了。

我们当然相信日本的阴谋是终无实现之一日的，因为抗战到底已是全国上下的一致信心。“战端一开，中途妥协只是灭亡”——这是最高领袖在一年前就昭示全国的说话。中国有领导抗战且为人民一致拥护的领袖，有愿为抗战而牺牲的民众，更有愿为抗战而服务的各党各派——在这种条件之下，策动政治阴谋的日本军阀到头来终要碰壁失败，而“放弃其数日前所持



的希望”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断言日本之阴谋终无成功之一日，即使有少数没骨气的无耻政客会被利用愿意供其驱策，但结果非但不足以破坏中国的统一，终止中国的抗战，而且反足以帮助中国的抗战，完成了一个抗毒的作用，把一切亲日派汉奸的面目在人民面前揭露出来，使他们再不能在抗战的队伍之中。这决不是中国的分裂，而是抗战过程中的排泄，结果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倒反是有利的。

我们断言日本的政治阴谋无实现的可能，但是在军事上，在最近 10 日之内不能否认日军在华南已获得重大胜利，但此后，日军若再欲沿粤汉路北上，或沿西江推进，一定将遇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日军占领区域的扩大，同时也就是它的防线的延长，它的负担的加重。散在民间的数十万枝枪与素有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的华南民众配合起来，将使日军陷于重重夹攻之中。

中国只要能击破日方的政治阴谋，定能促成日军在军事上的失败。这是绝无疑义的！



武汉失守以后*

中国最后一个军事、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武汉三镇——又告失守了。中国不能在保持武汉的条件下，把抗战转入第二阶段，这当然是中国抗战的一种损失。然而这损失不是意外的，也不是不可补救的。武汉的失守是早在意料中的。

武汉的失守决不会影响到长期抗战的继续，而只是证明了中国还不能阻止敌人的进展，还不能立即转入抗战的第二阶段——即双方势均力敌的相持阶段。

然而保卫武汉的第三期抗战和此次中国军队从武汉的撤退已经为争取抗战第二阶段的到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我们不能否认日本对于这次武汉的陷落是抱着极大希望的。尤其是在武汉失守之前，日军乘慕尼黑会议后国际形势之逆转和华南方面防务之空虚。在大亚湾登陆，于旬日以内，由淡水攻惠阳、博罗直下广州。同时更在政治上勾结国际间的和中国国内的妥协势力，策动所谓“和平”运动；在“反共”“反蒋”的口号之下，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摧毁中国的抗战基础。换句话说，日本想以政治阴谋的手段达到它的速战速决的目的。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8，1（4）。



日军的进攻华南，主要的就是想增强武汉失陷时对于中国抗战的精神上的打击（当日军进攻华南时，武汉已在危急中）。

当广州失陷的前后，日本的政治阴谋似乎是收了些成效。当时谣言很多，到处人心惶惶。有的说英法对日已有谅解；有的说中国内部已发生裂痕。好像武汉一失，抗战就要结束似的。可是中国军队从武汉撤退了（而且撤退得似乎比我们所预料的还早一些），而日本军阀所祈望的一切反都流产了。满天阴霾从此一扫而空，人心倒反安定了些，抗战又以更稳重的脚步向前迈进着，日本方面早先安排好的一个政治阴谋又烟消云散地失败了。就以这一点而论，也不能不说是中国抗战的一个大胜利。

这胜利是以抗战发动后 16 个月以来，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进步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进步，那么随着全国最后一个大都市的失陷而来的内部动摇以及对于抗战的打击必然是非常严重，甚至会使中国无法克服此难关。

这 16 个月以来的一切进步也在这次武汉的撤退工作中显著地表现出来。过去淞沪的撤兵以及首都和徐州的放弃，虽然都是在中国军事当局的预定计划中的，然而从没有这次武汉撤退时那样从容和有秩序。虽则过去在京沪和徐州的大战中，日本也不会达到击溃中国主力军的目的，然而中国方面在撤退时所遭受的兵员辎重的损失还是很大的。但是在这次武汉会战中，中国当局却能预先以武汉的物资和人力有计划地移向内地。当日军还未侵入武汉边缘，而此种侵入已绝对无法避免的时候，中国军队便由武汉安全地退出了。当日军追踪而来的时候，一切可用的物资和人力早被中国军队所带走或毁坏了。

胜利的进兵固然不是容易，但要这样胜利的撤兵，更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不论从政治上说亦好，抑是军事上说也好，武



汉撤兵的本身就不能不算是我们的一种新的胜利。

其次，即以保卫武汉的第三期抗战的经过而论，中国方面的进步也是远胜于第一第二两期的抗战。

以兵力的消耗而言，在过去第一第二期作战中，即中日战争开始后，最初10个月间，日军方面的死伤总数有40万人；可是在第三期作战中，即保卫武汉的5个月英勇斗争中，日军的消耗也有35万左右。在最初10个月中，中国和日本的死伤数是一与三的比例；可是自从第三期抗战开始以后，就逐渐改为一与一之比了。

以日军占领的中国土地面积而论，日军在一、二期抗战中，占领了冀、察、绥、晋、鲁、苏六省和浙、豫、皖三省的一部分。可是在第三期抗战中，日军只是占领了沿长江的一条狭道和广东省的一角而已。同时中国在第二期抗战之末和整个第三期抗战的时期，中国军队又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收复了许多失地，在那里建立了许多抗日政权。这里主要的有冀察晋边区政府，冀中、冀东、冀南的区域，晋东南若干县份，苏北、皖南和鲁省的一部分地方。更重要的是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在这时期中已侵入了热河、察哈尔等东北伪政权势力所统治的地方。这种在敌后方展开游击运动的工作在下一期抗战中将占到更重要的地位。

此外在第三期抗战中，中国方面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改进，如统一战线的巩固，政治的民主化等。尤其是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可以说是第三期抗战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收获。

在经济上，中国抗战虽然已经延长了16个月，但中国的财政基础在最近却是更巩固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巨额的出超，外汇统治后法币基础的巩固等——这些都是中国经济政策成功的



重要证明。

中国第三期抗战中所获得的这些胜利，尤其是武汉退兵的成功使一切悲观主义者、失败论者的胆子壮了起来，削弱了妥协者的社会基础，使他们失去了妥协的借口，也就是使日本军阀想以政治阴谋达到速战速决的计划遭了打击。

中国军队不待日军攻入武汉的最后一条防线，便以敏捷的行动退到了更有利的新的阵地，准备给日军以更大的消耗实力的机会。这也是无形中告诉了妥协论者：你们不必那样高兴吧！我们正在准备更有力的抵抗哩。武汉的撤兵等于是对那些热衷于调停的妥协论者的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于是他们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另谋出路了。

揭露日本的一切政治阴谋，肃清中国内部的动摇妥协份子，在新的阵地上阻止日军的前进，使抗战迅速转入第二阶段——这是摆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基本任务。

要完成这一基本任务的条件是已经具备了。

第一，根据过去 16 个月的经验，我们相信抗战前途是可以乐观的。从最近全国舆论界对于妥协运动的一致反对声中，我们可以知道，坚持抗战到底、巩固统一战线已成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共识。谁想来动摇抗战，分裂统一战线，或破坏最高领袖的威信，谁就会遭受全国人民的唾骂。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扩大并巩固民族的统一战线才能争取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也只有继续坚持抗战才能使民族更趋于统一团结。全国人民的这种一致的普遍的觉悟正是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光荣前途。

第二，根据中日双方的现在的实力对比，我们也相信完成上述的基本任务是可能的。

现在日军在华北五省的有 11 个师团，30 余万兵力，在长江



两岸的有 22 个师团以上，60 万兵力。在华南上陆的兵力，最初只五六万名。但现在占领区域扩大，防线延长，粤省军队已在北江和西江的新阵地上站定，在陆军和中央军协助之下将给进攻日军以还击，同时粤省民众武装已开始活动。所以日军要想保持这块便宜得来的占领区，或再向前进攻，那么至少要把这里的兵力增多 2 倍~3 倍。据陈诚将军估计，目下日军在中国境内作战的部队至少已在百万以上。日本全国动员的最高额不过 300 多万，能立刻动员作战的不过 150 万左右。所以目前战局几乎已经动员了日本的全部兵力，这怪不得日军在华北竟不能抽出 4 万人以上的部队去进占风陵渡和垣曲或回攻冀察晋边区了。现在中国主力军已从武汉退到离长江较远的内地去，日本海军已不能从长江中发施它的威力了。如果光靠陆军向内地深入进攻，则牺牲将更巨大，所需兵力也更多。换句话说，日军的战略进攻已将到达最高限度，过此则不能再前进了。所以目前中国方面应在各地发展大规模的游击战，牵制日军，使后者不能抽调大军作战略上的进攻。在这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中，中国应尽量消耗日军，培养自己的实力，使得根本改变中日双方的实力对比。一待时机到来，就可以大举反攻，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

我们的估计并非是过分乐观的空想，否则就无从说明日本军何以如此不能忘情于和平阴谋的缘故了。板垣所说的“不辞打到重庆昆明去”的话只是嘴硬骨头酥的恐吓而已！



展开全面战争*

据 20 日报载路透社重庆电：“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现遣劲旅分入各沦陷区域，在日军后方作大规模之攻击。俟华军抵其目的地后，此项总攻击即将开始云。”同日报纸又向读者报告华军攻入广州近郊以及在豫皖晋绥日军占领区后方华军胜利消息。这些消息象征着中国抗战的一个新局面就快到临了。

从抗战的整个局势而论，中国在主要战场的华中区还未能阻止日军的前进，但是日军的进攻已是非常艰苦。自日军攻入徐州到华军自动放弃武汉为止，日军只是占领了长江两岸的一条线。现在日军主力又沿粤汉路一条线继续向南进攻，但遭遇的困难是更多了。前锋刚到岳阳，后方咸宁崇阳一带又屡次被华军切断。到目前为止，日军仍停滞在岳阳以南二三十里的地方。至于华北方面，在武汉陷落前数月间，日军进攻即已终止，而且华方流动部队已在这时期内克服许多地区。在华南方面日军自大亚湾登陆以后，在旬日间曾连陷淡水、惠阳、博罗、增城、广州等重要城市。但是，日军的这种廉价的胜利只是招致了近日间的空前的溃退。从大体上说，日军的战略的进攻还未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8，1（7）。



终止，但是离这终止点是已经不远了，目前中国方面的战略任务就是在完全终止日军的战略进攻，先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争取到一个相持局面的形成，以作反攻准备。换句话说，目前的任务就是在争取抗战第二阶段的到来。

但是，我们早已说过，要阻止日军的战略的进攻，其责任不仅在中国正面作战部队的堵截，而且更在被占领区域内的流动部队的游击战争。广大被占领区域内的游击战争，虽然是抗战第二阶段的主要战争形态，但在争取抗战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的过渡期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也已经比较抗战初期增加了许多。为什么中国失去了这许多地区而抗战的前途非但不令人悲观，而且反使人觉得更接近于最后胜利的时期呢？惟一的理由便是中国已经用空间换得了时间。日本已经因点和线的占领而陷入了中国的全面抗战的火坑中。如果中国不能在广大被占领区域中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使日军仍能集中主要兵力用于战略进攻，那么中国所已经失陷的地域只是白白失掉的。中国即使也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在正面前线以抵抗日军，其结果也必然失利。

蒋委员长说明中国军队的放弃武汉是为了“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地”。委员长又曾以抗战一贯方针昭示全国同胞：“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日军愿意同中国作点和线的争夺，愿意在这争夺中歼灭中国的主力。这是日军的主动。中国要避免这种点和线的争夺，避免主力的决战，争取自己的主动，便只有扩大全面的战争。所谓全面战争也便是被占领区域内广大的游击战争的展开。中国只有发动了全面抗战争取到了主动地位以后，才能坚持持久抗战；也



只有持久抗战才能达到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任务。

发动全面的游击战争和取得主动的地位，虽然是早已定下的方针，但这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东南各省，似乎还没有很理想的完成。

现在中国军事当局已经遣派劲旅到各沦陷区域中去。这举动当然是为了实现最高领袖所昭示的上面三个基本方针。我们相信这些劲旅开入各沦陷区之后，将能领导沦陷区人民展开广大的游击战，实现全面战争的方针。为了这些部队能顺利地完成任务起见，我们有两点意见贡献。

第一，脱离了国家总后方，深入敌人占领区的部队，他们的惟一的依赖者便是广大沦陷区的人民。这些部队能否顺利地完成任务，就要看他们能否同沦陷区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部队在沦陷区域中不仅应该做到“不扰民”就算满足，而且一定要能够同人民打成一片，成为人民的保护者。部队能保护人民，人民也就能拥护部队。这样的部队在沦陷区域中将如栽在沃地中的种苗一样，很快地繁殖起来，成为广大的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否则，这部队将如栽在沙漠中的嫩芽，经不起烈日一晒，便要枯萎而死的。

第二，在沦陷区域中的部队不仅应该注意对人民的关系，而且应该注意各武装部队间的相互关系。如今在沦陷区域中的武装部队并不是没有，在许多地方而且是很多的。但他们往往相互间因于宗派的成见，或因于过分重视了小我的利益，以致不能精诚团结，甚至相互倾轧，减少了整个民族的抗战实力，为日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蒋委员长的告全国国民书中，特别指出中国抗战的革命意



义。而巩固内部的统一和动员广大人民的参加便正是一切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



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

自“七七”以来，最高统帅总是无情地驳斥了一切中伤抗战和歪曲国策的人们。但是对于某些“胸有成竹”的人，这种驳斥总是不生效力的。或者是因于他们太“聪明”过分的缘故吧，他们总怀疑发表在报纸上的言论，或许还不是最高统帅的全盘意见。因此当有人歪曲了国策，宣称“和平之门未闭”的时候，有些人便想道：这或许是最高统帅授意的吧？做这样想头的人，自以为是比人观察得更深一层了，其实只是看到了自己在梦中的幻觉。这样的幻觉——反映着自己主观意志，即反映自己愿望的幻觉——是对于最高统帅的一种侮辱。蒋委员长在本月13日国民党纪念周会议上已经向全国以及全世界宣布：“中国抗战之前途与日俱进，益见光明”，所以要求全国国民“每人决不容有丝毫妥协思想留于脑际”（见13日海通重庆电，及14日美联电）。这种简明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声明，粉碎了一切自作“聪明”的臆测，扫荡了各种各样的对抗战前途没有信心的软骨虫的悲观论调。这是蒋委员长此次演词中的第一要点。

其次，蒋委员长根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经验以及18个月抗战的总结，昭示全国道：“惟抗战始能维系全国之统一，有精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1）。



诚团结之国族，则强敌虽悍，不足畏矣。”强调民族统一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意义是蒋委员长此次演词中的第二要点。

“惟抗战始能维系全国之统一”——这真理已经由过去 18 个月的经验证实了。我们在这里应认清的是：抗战所以能维系全国的统一，原因并不在于战争本身的威力，而在于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政府领导了抗战，也就是政府实行了人民的要求，实现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任何破坏抗战的分裂运动便会引起全国人民的一致反抗。

但是怎样才能够促成全国更进一步的精诚团结，以达到抗战最后胜利，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呢？

最近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中，向国民党提出了国共长期合作的具体建议。诚如该决议案中所说的一样，“国共两党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建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热望，而且是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中国朋友的希望”。但是对于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的国共长期合作问题，却有很多人表示着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国共合作前途的怀疑是巩固统一战线的一种障碍。因为对于代表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势力的国共两党的合作表示怀疑的人，对于促进统一战线显然是不会有所努力的了。抱有这种怀疑态度的人显然是出发于下面几种错误的观念。

第一，由于对整个抗战前途失去了信心，因此对于统一战线的前途自然就不会乐观了。

第二，单从某一方面或某一负责人的主观意志的可靠与否来判断国共两党的合作以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而不了解主观的意志，是被客观的现实决定的。历史的演进往往是违



背了好些人的主观意志的。正如当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曾经违背了好些人的主观意志一样，今后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也将由客观的现实所决定。

第三，单从已经存在或已经发生的局部的现象中来判断事实，而忘记了可能发生的趋势。只是从统一战线内部过去所存在的缺点和磨擦来判断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而没有看到克服和消除这些缺点和磨擦的可能性。

我们觉得，至少有下面几点可以使我们对于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表示乐观。

第一，中国抗战的前途愈益光明。对于最后的胜利有了自信心，那么自己的队伍当然是更密切了。

第二，存在有共同的目标。在抗战期间，争取民族独立，驱逐强敌便是两党合作和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在抗战胜利以后，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建立也仍旧能够成为两党合作和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建立，在国民党方面说来，这是党的主义的实现，也是走向孙总理所说的大同社会去的第一步。在共产党方面说来，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是达到最后理想的必经阶段。民主革命愈彻底，新社会的建立愈美满，那么便愈加接近于共产主义社会或大同社会的最后理想。

第三，中国的抗战是长期的。在这长期抗战中，国共两党的合作因实际工作而更密切。因此说，抗战过程中的合作造成了战后合作的基础。

第四，10年来国共两党分裂后，所造成的血的教训已为两党党员及全国最大多数的同胞所接受。这血的教训也足以保证此次合作不再走上过去的覆辙。



国共合作不能代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但不能否认，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所以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争取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实现，我们必需首先争取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

蒋委员长说：“惟抗战始能维系全国之统一；有精诚团结之国族，则强敌虽悍，不足畏矣。”——每一国民应该牢牢记住这段话！



向上海文艺界呼吁*

今天中国的抗战是全面抗战——很多人早已如此指出过，蒋委员长在武汉失陷后的《告全国国民书》中更明确地向我们如此昭示着。所谓全面战争，不仅是指军事方面的普遍发动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并且指军事以外的财政经济上的、政治上的以及文化上的普遍动员而说。在全面抗战之下，不论你是金融家抑是经济家，是实业家抑是劳动者，是文化人抑是非文化人——你们同前线的将士只有所站的岗位的不同，却没有基本任务的不同。这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总任务之下的分工合作，相互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某一岗位上的工作成绩的好坏可以影响到抗战全局，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岗位上的工作成绩。尤其在文化界内部各部门之间，互相的关系更密切。在这里，不仅有互相督促和互相指正的权利，而且有这样的义务。

因此，作者本人虽则不是一个文艺作者，但以同一文化战线上一分子之资格，也想向文艺岗位上的战友们说几句外行话。

在上海文艺界方面关于“鲁迅风”问题的论争已经延长了一个半月之久，关于这论争的文章已经发表有数十篇之多。作家们费了无限精力，占了各报副刊不少宝贵的篇幅，可是这论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8，1（9）。



争给与一般读者的印象恐怕只是意气用事和私人攻讦而已。大多数参加论争的作家似乎把论争过程中提出来的理论原则问题的检讨搁置一边，根本不曾企图来解答它。

鹰隼先生在10月19日《译报大家谈》发表的（为鲁迅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所写）《守成与发展》和10月21日的《题外的文章》那两篇短文是此次论争的起源。鹰隼先生在《守成与发展》中开头便写道：

“‘鲁迅风’的杂感，现在真是风行一时。鲁迅有……
‘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苍凉悲壮的诗文，诸多鲁迅式的杂感，也
便染上了六朝的悲凉气概……”

抗战以来每当看到“鲁迅风”的杂文，我总这样想：“如果鲁迅不死，他是不是依旧写着这样的杂文，还是跟着抗战的进展而开拓了新的路？”

我的答复是属于后者的。

我想鲁迅的杂文决不会再像过去禁例森严时期所写的那样迂回曲折，情绪上也将充满着胜利的欢喜。

他的新杂文将是韧性战斗的精神，胜利的信念配合着一种巴尔底山的突击的新形式，明快，直接，锋刀适合目前的需要。

换句话说，鹰隼先生认为我们的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鲁迅的杂文至少是以：（1）六朝的苍凉气概，（2）禁例森严期的迂回曲折，（3）缺乏韧性战斗精神和胜利的信念，（4）不够明快直接为特点的。

因此鹰隼先生在《题外的文章》中便直接向巴人先生质问道：



“（一）目前文坛上模仿鲁迅风气是不是甚盛？

（二）这种倾向的增长对发展前途是不是有害？

（三）如果有害，我们是不是应该表示抗议？以及更基本的？

（四）如果鲁迅还在，是不是依旧写这样的杂文？

然后巴人先生可进一步地反省，自己近期的文章有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模仿鲁迅的所在。如果我的抗议是应该的，巴人先生不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可见在鹰隼先生的心目中，模仿鲁迅的有害，以及我们对于此种模仿鲁迅风气应该提出抗议是一个不容怀疑的非常肯定的前提了，他所要同巴人先生争论的只是后者是否有意无意地走上了这条“有害”的道路的问题了。

显然，鹰隼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学遗产中重要部分之一——杂文——的重新估价问题。但是在这一个半月的论争中，似乎没有谁曾经抓住鹰隼先生所提出的这个中心问题。不是把意气 and 情感作用的话模糊了问题的中心，便是拿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来互相驳辩。例如拥护鲁迅风的杂文的人普通总是拿孤岛的特殊环境作为提倡鲁迅风杂文的理由。这理由在表面上看来是很有力的。其实，这同反对鲁迅杂文的人至多不过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而已。因为这理由无非是证实了鲁迅杂文的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只等于孤岛的生命而已。

显然，用这种理由来为鲁迅杂文辩护的人是同反对鲁迅的人一个样儿没有理解鲁迅的伟大处。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记得若干年前苏联文艺界中也曾有人怀疑到那位善以尖刻的笔调讽刺农奴时代的黑暗腐败社会的伟



大作家果戈里的作品在今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意义。但是苏联最大多数作家的意见却认为果戈里的文笔不仅是暴露黑暗的农奴社会的有力武器，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仍旧是揭露一切内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富农、资产阶级分子、托派反革命匪徒以及各人意识中或多或少地保留着的旧时代的残余——的最厉害的工具。

鹰隼先生在七八年以前曾经提出过鲁迅先生的主要文艺作品——《阿Q正传》——在今日的价值问题来检讨。当时鹰隼先生认为阿Q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死亡了，也便是说《阿Q正传》在今日的中国已经成了历史上的故迹了。可是当时的文艺界一致地指出了鹰隼先生的这种抹煞或降低鲁迅作品的现实革命意义的企图。七八年来在中国更出现了无数阿Q型的人物，证实了《阿Q正传》还是今日的中国所需要的文艺作品。因此使鹰隼先生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对于这伟大作品的轻视观点。

今天鹰隼先生又提出了鲁迅先生杂文的重新估价的问题来讨论，我们相信文艺界对于这问题会同七八年以前一样给与鹰隼先生一个明确的否定的答复的。因为鲁迅先生的杂文不仅是这位伟大的革命文学家的文学遗产的最重要部分之一，而且正是在他的杂文中，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最直接明快地“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正是由于自己的杂文，我们这位伟大的文学家便招致了一切革命敌人——帝国主义者、军阀、托派、汉奸等等——的仇视和痛恨，他们甚至在鲁迅先生死了以后还不肯放过他，还处处想乘机毁他一下。



但是一个半月以来的文坛论争的确使我们相当的失望，大部的精力都花在意气论争上去了。因此我们应向上海文艺界提出如下的呼吁：

第一，希望上海的文艺界不要浪费你们的精力在无意思的意气论争上。在今天你们应负起民族解放战争中文艺阵线上的战士的责任，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互相劝阻自己的战友不作无谓的精力浪费。

第二，希望我们的文艺界能乘这机会更进一步来发扬我们的伟大革命作家的文学遗产的光芒，我们不仅希望学习这位伟大作家的人不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习鲁迅，我们希望我们的文艺作家能以鲁迅先生一样的泼辣尖刻的笔来画出侵略者、汉奸、托派、妥协论者的丑脸。我们不仅需要《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作品，而且需要鲁迅风的杂文。我们深信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意义决不能以孤岛的特殊环境为限，这种风格的杂文诚如祝敌先生所说的一样是“白刃战中最厉害的工具”，只要社会上还需要有革命家存在的时候，鲁迅风的杂文终将为革命家手中的一种有力武器。

第三，在这次论争过程中，充分显露出了文艺界内部的缺乏统一战线。我们认为理论原则上的论争是不能放松的，但是态度应该尽量客气，感情作用和意气用事只会使论争扯到远处去，使我们的讨论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来。要知道我们的论争都还是一条战线内的论争，我们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我们的论争无非是为了求得一致的结论，若因此而松懈甚至分裂了我们的队伍，那真是太不值得了。



进步的一年*

上海的同胞已经是在孤岛的环境下，过着第二度新年。在过去一年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占领”了中国的不少城市和交通线。但是千百万中国的流动部队和人民武装仍旧控制着这些地区，中华民族不承认这些国土已经失陷，而只是把这些地方改成了游击区。所以虽则我们的处境是更艰难了，而我们未来的处境有更恶化的可能；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瞻望是更乐观了。抗战中的中华民族好比是通过隧道的列车，虽处于黑暗中，但每个乘客听着车轮辘辘的声音，没有不相信这列车是载着他们冲出黑暗向光明的前途迈进。反之我们的敌人则好比是船底有着漏洞的巨轮，虽则今天还是浮在水面的庞然大物，但是明天它就将沉在无底的深渊中了。

过去一年来，中国在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进步，正是证明这伟大的民族是在向着自由解放的前途猛进着。在所有这些进步中，尤其要算政治上的进步有最大的意义，因为一切进步都建筑在政治的进步上。没有政治上的进步，其他各方面的进步都是不可能的。

政治上的进步表现在三方面：（1）抗日统一战线的继续巩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2、13）。



固；(2) 政治的民主化；(3) 抗战时期国内施政方针的确定。去年3月底，领导政府，站在国内第一大政党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召集了一次全国临时代表大会。这大会对于中国政治的推进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这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了抗战期内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各方面的施政方针，同时这次大会决定了国民参政会议之召集。《抗战建国纲领》上规定各点的彻底实施虽然还有赖于全国上下的努力，但是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有了极大成就是不能否认的事情。例如政治机构的刷新、对于失职官吏的严厉处罚等这些正是一年来政治发展中的新趋势。国民参政会在召集的方法和职权的限制上虽然还不是由普选产生的最彻底的民意机关，虽则它不是一个立宪机关，但是因为它包括了国内各党派（当然是抗日的党派）和各阶层的人物，所以它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比中华民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意机关还要切实而强大些。去年一年间，国民参政会的两次召集，对于政府行政方针曾贡献了许多具体方案，对国内一切悲观妥协的情绪给了严厉的指正，而第二届召集时所通过的要求政府切实保证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废除书报检查制的决议，对于今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这一点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

在国内各党派之间的磨擦虽然未能完全消灭，但主要的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在这一年来是更加亲密了。敌人一切挑拨离间的阴谋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成立，是国共两党进一步合作的结果。自从这一部队开到前方参加作战以后，对于展开长江下游的游击战争是有重大意义的。

最后，足以表示中国抗战中的政治进步的便是人民抗战意



志的坚决和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全国舆论的统一达到了从来没有的程度，这也是过去舆论统治时代绝对不能达到的事情。每一次歪曲国策的人们发表他的妥协悲观的论调的时候，总是招致全国一致的痛斥。这种统一的坚决意志的形成将是保障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的主要因素。

中国在军事上的进步也是惊人的。在这一年来，中国获得了无数次的胜利，这中间最重要的台儿庄的大捷，南浔路前线马回岭的胜利，冀察晋边区日军五路围攻之被粉碎等。然而军事上最重要的进步还是表现在战略上的彻底变更。中国军队已能从正面的硬打而变成了侧面的袭击，已经以运动战甚至游击战代替阵地战而成了抗战的主要战略。由于战略上的进步，使中日双方的兵员牺牲已从3：1的比例变成了相等的甚至相反的比例。这种战略上的转变，在武汉的撤退中，尤其在此后的作战中达到了最大的成功。在武汉的保卫战中消耗了敌方数十万兵力之后到没有再死守的价值的时候，中国主力部队便在继续保持对武汉外围的控制权之下，安全地退到了新的阵地。结果使日军的占领武汉，不仅是扑了个空，而且反陷入了被包围的局面。从武汉放弃以后，中国军队更灵活地采取了运动战战略，更普遍地在各战场上，在敌人后方发动了游击战争。最近蒋委员长更声称在抗战的今后一个阶段中，将以游击战争为基本战略。这两种战略的采用，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百多万大军陷入了中国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他们处处被牵制，时时遭受到袭击；但是没法找到中国方面的主力所在地。不久前，日本华南总司令安藤的挑战书充分地反映出了日军对于中国这种新战略的焦急态度。

上面所举出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种种进步只是过去一年来各



种进步现象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进步对于抗战前途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看到了这些进步的现象，也就好比是听到了列车前进时的辘辘之声，证明了我们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

当然我们相信光是这些进步还不足以使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然而这些进步群众的本身已足以保证未来一年中将能取得更大的进步，以进入于自由解放的世界。因为中国的抗战是必须继续下去的，但抗战继续下去，则政治、军事以及其他各方面也必然将继续进步下去。中华民族进步解放的列车已经开动了它的引擎，时代的巨轮已经转动了。谁要是成了它的前进的障碍物，谁就要被碾毙，被当作渣子而在抗战的洪炉中被淘汰出去。



驳斥汪精卫叛国通电*

1938年年底，汪精卫因叛国阴谋失败，不得不逃亡河内并且发表了一篇荒谬的通电，主张对日本讲和。从此，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了30多年，而且曾经以革命家身份扮演过若干幕有声有色的场面，但是每次当紧急关头便出卖了自己的战友，因而向来被人看作是投机政客和妥协分子的汪精卫，就同1938年的除夕一样，永远跟抗战和进步中的中华民国诀别了。

汪精卫好像是很凑趣似的，他赶着把自己这个无耻的通电在除夕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要是迟了一天，大家在大年初一的报上读到这样一篇臭东西，岂有不喊大触霉头之理。可是因此之故，汪精卫也就以自身的没落象征了随着旧时代消逝的一切腐败落伍因素之淘汰，同时也预示着随新年而来的一切进步和抗战的光明前途。大家都把割除毒瘤来譬喻汪精卫的出走，认为他的出走非但不足以影响抗战，而且反足以使中枢决定国策和指挥抗战的时候少了一个牵制阻挠的力量，使中国抗战愈加坚决，使中国的进步愈加迅速了。

但是只有这样的认识还是不够的。汪精卫的被淘汰不仅是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进步，而且本身就是已往18个月抗战中中国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4）。



政治进步，尤其是中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进步的结果。

民国 13 年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大本营时，因革命委员会人选问题曾对汪精卫下过一个很适切的批评。当时中山先生不主张汪精卫加入革命委员会，因为他“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现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指汪及胡汉民）当易维持。若另开新局，非彼之长”。（见《孙中山全集》第 4 册，《历年书牍函电》）可见在中山先生目光中，汪精卫从来不是一个革命家，而只是长于调和“不生不死局面”的机会主义者妥协分子。在“七七”抗战以前，中国的政治局面正是中山先生所说的那种“不生不死局面”。但是在“七七”抗战以后，中国的政治，非但已经“另开新局”，而且是在不断地迅速进步着。尤其是站在抗战领导地位的国民党自身，它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更急剧的变更。在这样的一个崭新的局面下，汪精卫非但不能再来负维持之责，而且一天复一天地只觉得这个新的进步的政治环境对于他的投机妥协的本性起着不可调和的压力。这样终于使他自动出走，成了时代的渣滓。国民党中央已经决议把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这更证明国民党已毫不顾惜自己排泄出来的渣滓而大踏步前进了。

中国在 18 个月抗战中已经获得的进步，以及将来必然还能获得的更大的进步，正是预示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光明前途。谁要怀疑抗战 18 个月来中国政治的进步，尤其是怀疑中国国民党的进步，那么他对于抗战的最后胜利决不会有坚决的信心的。因为抗战的胜利是以强大的统一战线为保证的，但是离开了国民党，尤其是没有国民党的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是不能想像的。

汪精卫的出走以及被开除党籍愈加使我们相信民族解放的



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仅能排除外来的毒菌（敌人），而且将清洗自身的一切毒素。

但是如果把汪精卫的逃亡和被开除党籍看得太乐观，以为这样一个大毒瘤被割掉以后，抗战的阵营从此便澄清，中国内部便再无动摇妥协的投机分子存在，那也是极大的错误观念。

第一，汪精卫的群众虽然并不多，然而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自己的爪牙。在他的爪牙中间，有的虽然已经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无法再混在抗战阵营中从事阴谋破坏工作；但有的则因于见到自己的首领已失败在先，不敢再显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来，因而未曾被大家发现。我们对于这些还隐藏着的阴谋分子应继续进行我们的揭露工作（当然在这种肃清队伍的工作中，应十分审慎，不能中了敌人的离间计）。

第二，汪精卫的影响决不能以他直接指挥的爪牙的多少为限。我们说汪精卫的求和主张只代表他个人意见，这句话的意思只是表示汪精卫并不能代表政府或国民党的某一机构说话。然而这并不是说，汪精卫的主张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社会基础，事实上，人民中间对于抗战的局部的动摇，以及任何妥协苟安的情绪都可以成为汪精卫的政治资本。有些人并不是汪精卫的党徒或爪牙，但是他们对于汪精卫的某一部分意见表示同意或是表示了一点动摇。这样的人在今天虽则并不同汪精卫的党羽发生联系，但是这种人在观念上是接近于汪精卫的这种观念，发展下去，必然会走向同一条叛国的道路上去的。所以克服这样的动摇妥协的观念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必须根据去年12月26日蒋委员长在纪念周上的演词，对于近卫所提出而为汪精卫所接受的三个讲和条件在群众中间做一番透彻而普遍的驳斥，指出这些所谓条件后面所隐藏的阴谋。



任何含有毒素的理论或主张，总是用很美丽动听的词调来做掩饰的。多才善辩的汪精卫更是擅长此道。他利用人民在抗战期间所感受的苦痛，利用上层分子对于“共产”的恐惧心理，来进行他的动摇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因此汪精卫在他那个劝我民族投降的通电中，利用这两个弱点，提出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三个和平条件。

在善邻友好的一条中，汪精卫说近卫已经“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这些中国主权独立完整等字眼，的确是很漂亮好听的字眼。可惜太漂亮了，漂亮得简直使人难以置信了。汪精卫既然肯为近卫的郑重声明作担保，我们倒要问一声汪精卫难道日本自“九·一八”以来对我们屡次发动侵略战争，前后花了百多亿军费，死伤了近百万人，动员了全国一切的力量，只是为了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吗？那真是未免小题大做使人难于置信了。正同蒋委员长所指出的一样，隐藏在这些漂亮字眼背后的真意，就是要吞噬整个中国。待中国被它一个吞噬以后，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自然毫不成问题了。日本人不是自称对东三省是无领土野心的吗？“满洲国”不是早就要收回治外法权的吗？然而这除了对其他各国的既得权利给一种威胁以外，有谁相信这是“满洲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完整呢？我们相信除了王克敏、梁鸿志再加上汪精卫一流“中国人”以外，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独立完整”。

至于允许日本人居住营业自由，也就同蒋委员长所说的一样，就等于中国人丧失自由，等于中国的丧失警察权和经济权。



至于所谓经济提携更是承认日本经济侵略、排挤别国在华势力的别名，聪明如汪精卫者对于日本军阀的这些漂亮字眼背后所隐藏的阴谋是不会不知道的。他所以仍旧把这些条件向中央提出，作为可以对日开始谈判的条件，无非是因为他已经存心想出卖祖国，存心想对他的主子屈服而已。

在汪精卫通电所提出的三项条件中，比较能诱惑一部分人同情的，恐怕还是“共同防共”一条。关于此点，不久前国家社会党领袖张君勱也曾有过类似的建议。但是在事实上诚如蒋委员长所说，防共也仍旧是亡华的代名字。有些至今还害着“恐共病”的人们，或者以为汪精卫的这一项建议（当然，实际上是广田近卫的建议）的本身倒并不坏的，只可惜不易成功。想这样做的人，其实真是上了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的大当。

汪精卫主张接受近卫的提议，“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从逻辑上说，国际间防共协定的对象第一应该算是苏联。但从18个月抗战经验中，中国已经深深地理解到苏联是真正的患难朋友，它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与中国的伟大帮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则如今中国竟背弃了这位患难朋友不算，而且还回过头来联合着自己的敌人来对付他，这岂不是帮了自己的敌国来离间自己的盟友吗？这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呢还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利益呢？

况且在事实上，如同李维诺夫所说的一样，共产主义这名词在防共公约签字国代表口中，这只是一个地质名字而已，这是煤、铁、石油和一切富源的代名词而已。因此在过去中国、西班牙、捷克等成了被“防”的对象，而今天则连英、法自身的利益都成了它们的被“防”对象了。对着共产主义的苏联，防共公约的签字国反只敢远远地狂吠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曾屡次



向苏联挑衅，想试探工农红军的实力。但自从后者在张鼓峰一役给了日帝国主义者一个毫不容情的教训以后，便如蒋委员长所说的一样，“它的驻苏大使重光葵向苏联外长如此卑躬却步而最后终于屈服了”。

所以，在事实上，所谓共同防共协定已成为德意日三法西斯侵略国家共同对付民主和平国家的军事同盟。中国如果参加了防共协定，非但将失去苏联一个朋友，而且将被迫着成为法西斯侵略集团的附庸，而与一切民主国家敌对了。所以加入防共协定无异于是断绝了自己的一切朋友，而去认贼作父，无异于伸长了自己颈项去让敌人宰割。一个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中国人决不会同意参加所谓防共协定的，但在出卖民族利益、专以讨好主子的汉奸卖国贼看来，这确是中国应走的惟一外交路线，因为据汪精卫的爪牙、某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英美法苏援助不可恃，中国必须以德意之助力谋取中日冲突之和平解决”云云。

在共同防共的总任务下，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要求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这一要求的提出在原则上是更能取得一部分“恐共病”者的赞助的，但在事实上，这更是上了日帝国主义者及汪精卫之流的大当。因为如果照了这路线去做，那必然又要把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局面取消，恢复过去的一党专政和阶级分裂的局面了。过去10年间惨痛的内战经验已经证明这一条路是走不通的了。

至于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存在已为中央政府所承认合法。边区政府是整个中国政权的一部分，受中央政府的节制；而八路军是整个国民革命军的一支队，受最高统帅的指挥。在这里



已不能说是不合中华民国法律制度的特殊组织。汪精卫在此全国精诚团结一致抗敌的时候，提出取消边区政府及八路军的问题来，我们先不问是否适合时宜，也不问共产党及八路军是否同意。但从国防观点上来说，这也是很有害的。在今天，谁也不能否认，八路军在华北的国防上的意义。我们甚至不要说取消八路军的问题，即使把八路军中的共产党干部抽了出来而把这军队改组一下，就足以使这军队的战斗力大大降低，以致使它不能负起国防的责任来，因为谁都知道今天的八路军及其战斗能力是不能跟共产党相分离的。

当然，我们这些话是不能同汪精卫谈的，因为他是以中国停止抗战，即中国投降日本为讨论的前提的。等到已经决定停止抗战并对日投降的时候，不要说八路军及其战斗力是多余的，就是一切抗日军队都成为多余的了。但是每一个不愿投降日本，不愿停止抗战的人们，在谈论到国共合作问题的时候，却不能不把民族抗战的实力问题作为考虑的基础，我们先不问各人自己的立场和背景如何，凡是解决的办法，足以增强统一战线内部磨擦、减弱民族实力的都应一律避免。

我们不能否认，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后，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是扩大了，但同时国民党的影响和威信也扩大了。这是国共两党最大多数领袖和党员忠于抗战、忠于统一战线的结果。如果两党之中有一个党的领袖都像汪精卫一样不忠于民族，不忠于统一战线，或者都像他那样小心小眼，我们相信这政党一定会像汪精卫一样没落而被淘汰的。所幸两党最大多数负责人都以民族利益为重，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这两大政党都在抗战中巩固强大起来了，正因为这原因，使我们整个民族的力量也一天复一天地强大起来。



总之，汪精卫的通电中所主张的一切意见，只能算是少数民族败类的意见。中国如果依照汪精卫这通电中所提的条件与日本讲和，那么除了促成中国灭亡、使中华民族子孙沦为日本军阀的奴隶以外，决不会有别的结果了（这连《字林西报》也如此指出了）。这怪不得法文《上海日报》要说汪精卫所提倡的和平是“东洋货”，这怪不得日本飞机愿意把他的通电印了出来在上海空中义务散发，而汉奸报纸《新申报》要称扬不止了。

可是在中华民族的子孙中间，这样的败类并不多，因此汪精卫终于成了“潮湿的爆竹”。陷于泥淖中的日本军阀对汪精卫的“和平”阴谋是寄托着极大希望，他们本来想借这“爆竹”的力量把他们从泥淖中浮起来的，结果是湿了这个爆竹不算，还带倒了他们的内阁。

我们相信日本军阀的这个政治阴谋失败之后，为了挽救自己的泥足，势将孤注一掷，动员他们所有的人力物力来作最后一次冒险进攻。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彻底肃清自己队伍中的动摇妥协分子和叛徒奸细，并准备迎击日本军阀的新的进攻。



世界革命导师 列宁逝世 15 周年纪念*

1 月 21 日——这是苏联人民的一个沉痛的纪念日，也是全世界劳动大众的一个沉痛纪念日。因为 15 年前的今日，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失去了它的创造者，世界革命运动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导师。这便是列宁。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他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实际材料进一步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列宁的数千万言的遗著成了国际革命运动的重要武器。列宁的著作所包括的方面很广：有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的问题的；有的是关于革命策略的问题的；有的是关于哲学的；有的是关于经济问题的。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有下列几种：《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怎样跟社会民主主义者作战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国家和革命》；《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等。

但是列宁不仅是革命的理论家，而且是革命的实践家。他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5）。



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他为了革命工作坐过监狱，曾经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曾经流亡在国外。他一手建立而且锻炼了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训练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他创立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第三国际。他更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肃清了一切革命敌人和机会主义妥协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列宁主义理论中，关于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占有非常重大的地位。反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不谈的农民问题和民族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为列宁是真正的革命实践者，所以对于他，珍惜和团结革命的每一份力量被看作是革命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列宁把农村中的劳动大众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主要同盟者；而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看作是世界无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始终便关心着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他从前世纪末便坚决反对沙俄对中国的一切侵略和压迫。他对于 1911 年中国的辛亥革命曾寄与极大的同情。他曾写过文章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把中山先生所代表的一派势力称为革命的急进派，而把袁世凯所代表的势力看作是革命中的保守派。不用说他在当时就对于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一派革命势力抱着极大希望的。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政府，根据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第一个以平等立场与中国订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在中国 1925 年~1927 年的大革命中，苏联人民更给了革命的中国以极大的援助。如今，中国又处在艰难困苦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而它在国际上的最可靠的友人也仍然是以列宁主义为立国基础的苏联。

当着我们的最可靠的友邦的国父——伟大的列宁——逝世



15 周年纪念的今日，我们将以继续巩固两国团结作为中苏两大民族的共同任务。



“一·二八”7周年*

1932年1月28日，中华民族在上海发动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战争，到现在又是第7周年了。这一次抗战只继续了一个多月便失败了，结果是使中国又接受了一个屈辱的条件。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一·二八”抗战的光荣的历史意义。

7年前的“一·二八”抗战是中国此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一·二八”抗战的失败，只是鼓动了人民对于抵抗侵略的勇气，只是唤起了全国对于民族解放的自信心。在“一·二八”战役中，中国只是以十九路军为主的少数部队——而且在军备上并不是最优秀的部队——对于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对于经过长期准备而且存心起衅的侵略者给了有力的还击。在“一·二八”战争中，中国军队不仅以显然劣势的兵力抵抗了一个多月，而且在这时期内建立了许多惊人的功勋。要不是政治上的种种原因，我们相信“一·二八”的抗战可以成为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起点的。“一·二八”的抗战虽然是失败了，但是打击了中国内部的不抵抗主义和失败主义，英勇的抗战军人以自己的血肉写下了第一篇最有力的反失败主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6）。



义情绪的檄文。“一·二八”的抗战告诉了全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不仅是应该抵抗的，也不仅是可以抵抗的，而且是抵抗而可能获取胜利的。

“一·二八”的抗战不仅鼓动了人民抵抗侵略的勇气，而且给了全国人民许多重大的教训。

第一，“一·二八”抗战的失败教训我们，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没有全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战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当“一·二八”抗战爆发的时候，表面上中国已经统一，但是在事实上，一方面存在有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对立，另一方面存在着中国两大政党和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阶层的对立，而且后一种对立在当时采取了内战的形态。因此“一·二八”的抗战便成了少数部队的局部抗战，使日军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消灭抗战力量。这样抗战当然是不会胜利了。

第二，“一·二八”抗战在淞沪遭受了初次失败以后，中国便接受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样就使得抗战不能继续下去，使敌人得到了休息的机会，以从事第二次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多受了5年半的国难。中途妥协只是招致了更大的屈辱。

第三，“一·二八”抗战的失败，告诉我们，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是无止境的，同时，侵略者是最无信义的。《淞沪停战协定》在我们看来已经是一种屈辱的条约，但侵略者却并不以为满足。“八·一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进一步侵略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它便撕毁了亲自签订的条约，又发动新的战争了。

中国人民在受了这样的教训之后，便逐渐地觉醒了。全国逐渐从对立和分裂进步到了团结和统一。到“八·一三”第二



次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不是“一·二八”时代的中国了。“八·一三”的淞沪抗战已从局部的抵抗而扩大成了全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淞沪的撤退非但不再成为中途妥协的理由，而且成了持久抗战的起点了。

如今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了在中国 1 年半以上的抗战的教训，已逐渐知道它今天的对手已经不是 6 年以前的对手了。为了解救它的危局，便想来分裂中国的内部，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分裂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想结合民族败类如汪精卫之类的汉奸来发动中途妥协的运动。但是经历过“一·二八”失败和以后许多次教训的中国大多数人民已经不会再中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了。统一的中国是分裂不了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不能中途妥协的。经历过两次淞沪抗战的上海人民将以最大的热忱来拥护这神圣的战争，坚持民族的统一，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策动中途妥协的叛国运动。



抗战建国的好榜样*

中国在过去 19 个月的抗战中不用说已经给了敌人很严重的打击。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隐讳，可以承认在这 19 个月之中，中国自身所遭受的破坏也是非常厉害的。数十万士兵的牺牲，数百万平民的死亡，无数工厂住宅被毁，无数田地被荒废，有千百万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我们相信，抗战再继续下去，这种破坏是还要加深扩大的。这是中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劫难，每个稍有人心的人想到这样凄惨的景象没有不毛骨悚然的。侵略者和汉奸也就利用人们对于战争的这种恐惧心理来策动所谓“和平”运动，诱引中国人民接受亡国屈辱的条件。因此，在芦沟桥抗战爆发后不多时，汪精卫便故意曲解焦土政策，夸大抗战的破坏力，想用这种话来嚇退拥护抗战的民众。例如他在前年 7 月底所发表的关于焦土政策的演词中曾说过：“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现在汪精卫的假面具已经被撕下。抗战爆发后到今天还不满 19 个月，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当初说什么“一齐牺牲”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18）。



“俱成灰烬”的人恰正是最阴险的傀儡种子，而他所说的话也是完全为侵略者的危言耸听的恫吓而发。

19个月以来愈打愈烈的中国抗战已明白表示出“傀儡种子”的这种恫吓并没有发生多大功效。但是因为抗战的结果要发生重大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有些人就发生了这样的见解：“现在侵略者已迫着我们不得不实行抗战，因为除此以外已经没有别的生路了。但是抗战的结果又怎样呢？那时候，我们即使不致于‘一齐牺牲’‘俱成灰烬’，恐怕也要筋疲力尽，难于恢复今日的元气了。我们要消除少数人心中的这种狐疑，可不必从远处引经据典，发挥什么高深的理论。在我们眼前便放着绝好的抗战建国榜样——这便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苏联产生在经过了3年多的世界大战的破坏之后。它的前身本来就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在新政权成立以后，又经过了三四年的内战和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武装侵略的大破坏。到1921年战争在大体上结束的时候（完全结束在1922年），全国国民经济几已完全停顿。当年全国生铁产量只有11.63万吨——即战前产额的3%，有若干产业部门则完全停止了出货，全国农业的生产额降到了只有战前的半数左右。但是战事一结束，前线的炮火一停，全国人民便在新政府领导之下，从事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27年时（即战事结束后5年间），苏联的国民经济在大体上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此后经过两届五年计划的奋斗，整个国民经济便发生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先进国，在1937年年底，苏联的工业生产比战前帝俄时的工业水准增加了7倍。全国社会主义经济部门在工业方面占到了99.8%，在农业方面占到了98.6%，在贸易方面占到了100%，全国人口



94.4%已直接从事于社会主义经济，或与其有密切关系。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大大的改善了，仅仅在第二届五年计划内，苏联工人的实际工资便比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苏联国民经济的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例如资本主义各国的总生产量经过了1930年和1933年的经济危机，在1937年年中只勉强达到了1929年水准的95%~96%，而到1937年下半年又踏入了新的经济危机的阶段。至于苏联呢？全国国民经济仍然是加速度地在发展着。据最近报纸上所发表的莫洛托夫在苏联共产党十八届大会上提出的关于第三届五年计划的报告纲要，苏联在三届五年计划期内所规定的任务，不仅要在工业发展率上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将在生产总额上追上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度（即美国）。共产主义将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苏联承继着落后贫乏的帝俄的产业，又经过了七八年的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但在短短的十数年中不仅医治好了战争留下来的创伤，而且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工业国度。苏联在最近10年内的经济建设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帝俄时代数世纪的发展总和。这事实正足以鼓励了抗战中的——也即是破坏中的——中国人民，使后者了解到战争的破坏并不可怕，而且这破坏反而成了为未来的建设清除地盘的必要工作。从这意义上说破坏愈彻底（当然不是汪精卫式的一齐牺牲，俱成灰烬），我们的未来的建设也将愈加顺利。因为在革命（抗战）的过程中，一切物质的破坏，必然将陪伴着一切旧的腐败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而后者的崩溃，却足以解除生产力的一切束缚，使后者得能自由发展。革命（抗战）时的破坏好比是病人施手术时的流血，这在病人是一种损失，然而这是施行手术



时不可避免的现象。为了病人的新生，医生决不会顾惜手术施行时的流血；同样我们为了中国的新生，也决不能顾惜抗战时期的破坏。



租界当局和居民 对日方恫吓应有的认识*

最近，日本方面借口上海租界上汉奸被刺案件，向租界当局接连送了几次抗议。日本方面的用意，无非是借此压迫租界当局，扩大日本人的警权，以备日后进一步来实现他们占领租界的旧梦。最近半月以来，中外报纸对于日本人的这一种企图已经有过种种驳斥。日方抗议的不成理由是显然的事。

第一，上海的治安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值得使人忧虑的地方。即以汉奸的被刺而论，这责任不在租界当局或租界居民，而在日本人自身。如果日本军队不来侵犯中国，不雇佣他们的鹰犬——汉奸们——来扰乱中国的法治，破坏中国的主权，那么就决不会引起中国人的仇恨。而这些汉奸们如果只被养在日军的占领区内干他们的卖国勾当，不到租界上来阴谋活动，那么也就不会被中国的爱国分子刺死在租界区域以内了。日军的侵略造成了亿万人民的仇视，但还要唆使他们的走狗在这些人民面前阴谋活动，而不叫这些被侵略者动怒，那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所以日本军人，如果要不使他们所雇佣的走狗在租界上被杀，那么最好的办法，便是命令后者不要到租界上来阴谋

* 本文笔名孙一洲，原载《译报周刊》，1939，1（20）。



活动。若是要使中国人民根本不发生反日反汉奸的情绪，那么最好就放弃他们的扶植傀儡的政策，并且使自己的武力退出中国领土。

第二，若是以治安而论，那么据我们所知，在全世界上，治安最不好的都市恐怕就是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因为在那里，首相和大臣们常会被在职的军官刺死，而维持治安的军队，却忽然会称兵作乱，与政府对敌。若以中国而论，那么治安最不好的便是皇军所统治的地区。在那里，特务机关成了绑匪的组织者，地痞流氓都成了傀儡新贵，一切目无法纪的匪徒都成了维持社会治安的要员。远的不讲，就以原来同属租界而现今在皇军控制下的虹口区域以及同租界相毗连的越界筑路区而说吧，后者已成了烟赌绑匪的集中地。虹口区的新亚酒楼是“维新政府”的办公处，而同时也是暗杀党绑票匪的总司令部。正当日本当局责备租界警务处不能负治安责任的时候，却有负着维持治安责任的日本巡路兵 2 名在皇军直接控制下的杨树浦被人暗杀，而且连该日兵所带武装也都遗失。同时在华西越界筑路区，却有日本人所雇佣的 3 名汉奸被斩首示众。这些事实对于虚伪的日本当局确是一种难堪的嘲弄。如果我们承认了日本方面对工部局所提抗议的理由，那么，我们觉得樊克令总董和费信悖总裁大可根据此理由向日本军事当局要求收回东区和虹口的警权，因为一年多的事实早已证明日本方面对于维持这一区域内的良善治安是缺乏能力更缺乏诚意的，更何况根据各种事实材料，租界中区的治安的威胁也是来自前述区域的。

我们说明了上面的事实以后，就知道同日本军人来争论抗议书中的理由是很无谓的。因为根本上，这些理由都是日本军人拿来作为驱逐欧美势力，进一步取得对于租界上 400 万居民



更直接的统治权的一种借口。所以我们的任务在于说明下面三个更基本的问题：（1）日本方面提出这些抗议的真正的原因；（2）租界当局和英美法三国政府对于这事件应有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态度；（3）租界居民——尤其是中国人——对于这事件应有的认识和应采取的态度。

先来解释第一问题。我们认为日本军人对上海租界当局的这种专横态度是英法美等国政府的一贯的妥协政策和租界当局的一贯的迎合迁就和委屈求全的态度所促成的。日本军人的目的，则是在根本铲除华北和长江流域的欧美利益的最后根据地——上海、天津的租界。

自从日本军事势力到达长江流域以后，欧美势力早已从该地区以北的整个地带中被扫除出去了。英美两国的政府，虽然屡次要求开放长江航路，但是每次总是被拒绝了。最近，就连欧美商轮原来可以停靠的长江下游几个小港口（如南通天生港等）都被日军封锁了起来，于是长江以北偌大一个地区内，欧美的势力和经济活动却只能局限在天津、上海这两个小小的地区以内了。但是欧美在这一区域内的势力却决不能同租界的狭小的地区作同比例的估计，因为天津和上海的租界在过去是华北和华中的两个经济中心。尤其上海原来是全中国的心脏，是东方第一个商港，这里是中外资本的集中地。这两个地区的存在始终是日本垄断中国经济的一个大障碍。英美法等国掌握了这两地区，可以作为目前保全实力和将来恢复攻势的有力据点。所以上海、天津的租界在日本军人看来，始终是眼中之钉一般，一有机会，便要去摇动一下，直到它完全拔去为止。

显然，到最近期内，在日本军人看来又是再来摇动一下这个“眼中钉”的时机了。因为自从慕尼黑会议以来，英法两国



一贯执行妥协政策的结果，白白牺牲了自己的许多同盟者，减弱了自己的战略地位，使自己实际上陷于孤立。于是德国在事实上征服了整个捷克，意大利在事实上占领了 3/4 的西班牙，以后，复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天然要求”，英法两国自己的领土（虽则主要是殖民地）竟成了德意侵略者的要求对象。而当英法在西欧招架不及的时候，日本便发动了海南岛的战事，总是不客气地单刀直入，刺进了英帝国的交通线，威胁了法国的安南殖民地（海南岛虽是中国领土，但在今日，对华军事上并无多大意义，日军占领目的无非为了未来对英美法的海战）。而英法的回答，却只有空洞的抗议而已。既然如此，于是日本军人就索性进一步便来压迫一下天津、上海的租界，对租界当局的抗议就仿佛是流氓敲竹杠的口吻：“我明明地欺侮了你，又有怎么样？不识相些，我就……”侵略者的来势汹汹的样子，确实是可怕的，但他们的惟一的依靠，却只是预料英法是不会“有怎么样”的。如果英法态度转为强硬，而且准备以实力对付，那么日本军人也就……只有吃瘪而已。日本武士在张鼓峰事件中的屈膝，不就是这种流氓敲竹杠手段破产的一种极好证明吗？说明了事件的本质，也就是指出了英法美各国政府和租界当局对这事件的应有的认识。但是他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在这里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便是继续过去的委屈求全的退让政策。但这样只有更进一步地引起对方的侮辱，招致更大的纠纷；并使日方在租界上的势力更为扩大，成了日后日方更进一步向租界进攻的根据（我们认为日军现在要完全占领租界是不可能的）。另一条路便是根据苏联在张鼓峰事件中的教训“武士道”的经验，坚决拒绝日方的一切要求，而且明白地向后者指出，如果要租界当局能切实负起维持治安之责，那么，第一，日方应



将东区和虹口的警权交出；第二，日方应自动肃清越界筑路区内所树立的一切赌窟、烟窟和匪窟，因为这两个地区（东区、虹口和越界筑路地带）是租界上一切骚扰的惟一来源。过去的许多恐怖案件，发源于这两个地区，而最近伪“外交部长”陈籛之被刺，也是发生在越界筑路区内；第三，今后一切傀儡应禁止在租界上活动，以免刺戟中国人民的情感。我们对于最近租界当局维持治安的苦心，是十分同情谅解的，但我们觉得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莫过于要求日方履行上述三条件，并与租界居民取得密切合作。若是继续退步，并为了取得日方欢心而增强对居民的防止压迫，那只有更刺戟居民的情感，使租界治安更难维持而已。

至于租界居民——尤其是中国人——向来以租界为保障自身及自己财产的惟一保险库。可是，如今应该了解真正的保障，只有把掠夺者逐出国境，待祖国解放完成之后，方能取得。虽然是挂了卍字旗的轮船，亦竟被抄，以至于被没收拍卖，挂了卍字旗的纱厂（在南通）也竟被派兵接收了。这些事实，以及最近租界所受的种种威胁，希望能惊醒了租界上一切想在外旗保障下做苟安之梦的居民，把一切物力财力运入祖国最后方——这最安全的处所——以争取国家生命的最安全的保障，即争取抗战的胜利。



关于土地改革中的“推平”政策问题*

方毅同志转华中分局各同志：

我自改行做货管工作以来，一心学习本位工作，与群众运动接触极少，了解也不多，即如当前的土地改革运动，除阅读文件和新华报以外，知道的很少（即连文件在机关支部中也不能经常和迅速地看到）。上月底我曾偶然听说，乡间算账献田，有侵犯到中农利益的，我曾从此询问方毅及一氓两位同志。后一氓同志从分局开会归来告诉我说，据五地委报告，侵犯中农利益只是个别现象，于是我亦安心了。因为我懂得，在一个大运动中，没有个别出轨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对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五四指示曾仔细研究过，知道党中央对中农和富农的正确政策曾有十二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分局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初几次指示，基本上也是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加以说明和具体化，因此更深信此种侵犯中农利益，确像个别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近数日来，根据我们驻地附近几个乡村的调查和别处来的同志所谈的情形，似乎此种侵犯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根据一种“推平”政策（即平分土地）和机械的阶级划分法（多少亩以上为中农，多少亩以上为富农）产生出来的。如果我

* 作者于1946年8月21日给方毅同志的信。



们的确实行了“推平”政策，则侵犯中农利益将是必然的结果，而中农利益若被侵犯，则中农必反对我们，贫雇农亦因自觉陷于孤立而对斗争畏缩。这样便会影响农民反顽斗争的积极性；再加上机械的以田亩数划分阶层的办法，便使中农利益虽被侵犯，而下级对上级报告总说是富农献出了田（而且说是“自愿的”），因为真正的中农已被当作富农，而富农或已被当作地主了。五地委认为中农被侵犯仅是个别现象或即由此。

因感觉这是一个威胁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虽明知不在其位，不知其政，可能我所见到的乃是井蛙之见；但心有所患，若不对党提出，倒是变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者了。我分数段来说明我的意见。

一、我们对中农的政策

中央的五四指示中对于中农的态度讲得很明确：“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求得全部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照顾的人们以必要的照顾，那就会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因而就不能保持90%以上人口和我们在一道，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极大的力量，就要使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极大的阻碍，这对于群众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说明群众全部遵守上述各项原则，对于群众方能真正有利。”我觉得对于中农的照顾不能比中央此指示更明确而肯定了。

不仅内战时期苏区失败的惨痛教训，而且有联共的经验告



诉我们，必须团结中农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知道，使托派与联共党发生意见分歧，以致于最后使托派脱离党走向反革命、走向法西斯道路的基本问题即在于这个中农问题。1919年联共八大大会上列宁还专门为此问题做了一个报告，并通过一个专门的决议案。虽则自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以来，很多同志早已把引经据典（尤其引洋经典）作为教条主义的证据，但我却还要在这里引段列宁在联共八大大会上所讲的话，因为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同志注意的。当联共八大大会时（1919年），是已在十月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一年多的时候，当时革命在俄国乡村中的任务已经是反富农的斗争为主要内容，也即是说，比了今日中国的革命已经是更深入更进一步，但列宁和联共党对中农的态度是多郑重呀！他说：

“因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没有经验，因为问题困难，所以预定对付富农的打击就往往落到了中农身上。我们在这里犯了非常大的过失。”“把中农和富农混淆起来，把对付富农的办法在某种程度内推行到中农身上，那就不仅是最粗鲁地违背苏维埃政权一切法令及其全部政策，而且是最粗鲁地违背了共产主义一切基本原则。”

我们今天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的打击是预定打击封建地主的，而不是打击富农的；如果现在把这打击推行到中农身上去了，我想这将更是“粗鲁地违背了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原则”，是犯了更重大的过失。

列宁又认为中农是我们的长期的同盟者，将同我们一直走到共产主义社会，特别在落后国家，中农的社会基础较巩固，这同盟者对我们便特别珍贵，这里我再把列宁的话引在下面：

“因为农业技术比较落后之故——甚至于在先进国家里，更



不待说在俄国——中农是具有比较坚固的经济根基的，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以后，中农还会支持到颇久的时间。因此，苏维埃工作人员以及党的工作人员在农村中的策略应当是计算到与中农实行长期合作。”（列宁在八次大会的演说）

列宁说的是经济比较发展的俄国（比中国而言），而且是在革命已走向更高阶段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一年多），但尚要党与中农实行长期合作。斯大林是遵照这决定一直与中农携手走到了集体经济，走到了社会主义。我们今天是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是处在比俄国更落后的社会中，即在中农的社会基础更强大的环境中，我们更不能单单依靠贫雇农而得罪中农和疏远中农。

二、“群众绝大多数的要求”和“中农多数同意”的问题

在基本上，分局各次指示是遵照中央五四指示中关于中农问题的精神的。特别在5月28日决议中，分局决议对于这问题说得非常明确而坚决：“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可靠的同盟军，绝对不容许侵犯中农土地。算旧账绝对不能算到中农身上，要坚决用一切办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在分配土地时应使中农得些利益。凡中农利益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已借的粮要打借条，保证如期归还，侵犯土地退还，并向中农作适当解释，以取得中农的同情和拥护。”在6月9日的指示中还说：“中农所有土地不应算作分配，已分配者应退还或赔偿，中农土地不够者应补足他。”但是6月21日分局致一地委信中曾说：“关于分地力求平均是指清算汉奸地主之土地而言，不是将中农及富



农的自耕土地通盘平分。但群众绝大多数要求全盘平分，又得到中农多数同意者，亦不必阻止群众之分田运动……富农自耕土地太多，群众坚决要分者，也可分一部分……平分土地是好事，而不是坏事……”6月28日给各级党委信中又说：“有些地方农民坚决要求平分土地，又得到中农同意者，应赞助此种平分运动，不要害怕均产思想。”我觉得以上几句话很容易给了底下的同志以侵犯中农利益的不正确的借口。我认为，首先，要中农自己真正同意拿出田来平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中富农献田在事实上是在群众压力之下（怕斗争斗光）做的。至于群众要求平分的理由亦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不仅与中央及分局指示中的“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中农是我们在农村中可靠的同盟军，绝对不容许侵犯中农土地”等话相抵触；而且中央指示中还明明写着：“必须说服群众全部遵守上述各项原则，对于群众方能真正有利。”这就是说：即使真的是群众要求平分中农土地，我们也应去说服群众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是会使群众分裂，使贫雇农及我党陷于孤立，使革命极端不利的。而且事实上贫雇农群众决不会如我们干部这样做法的，他决不敢自陷于孤立，以二对三的形势同时向地主、富农、中农要土地。分局指示中说：“我们要依靠贫雇农，而不是依靠富农，所谓团结中农也只有贫雇农起来之后……”又说：“如果贫雇农不起来，不仅地主富农靠不住，连中农也是动摇不定的……”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只指出了真理的一方面；而真理的另一面是：“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就会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党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极大的力量……”而在敌人力量增加的条件下



又失去了同盟军，陷于孤立的贫雇农，也必然就会丧失了斗争勇气，增加了他们的变天思想，即增加了他们的动摇，削弱了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主要依靠。因此，我认为凡是侵犯及中农的平分土地绝对不会是“大多数群众所要求”的，事实上是干部自己的包办代替，群众的积极性是并不高的。在我们住的这一乡就可以看到，不仅献田者是日夜不安，即使进田的贫雇农也带着糊公事和疑惧的心思的。

三、机械的阶级划分法

农村中的阶级划分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使我们中国革命者感觉头痛，而且也曾使苏联的革命者头痛过。但现在我们下面似乎相当普遍地流行着一种错误的机械的阶级划分法。这办法便是把某一乡的人口数去除当地的耕地数求出每个人平均可分得的田亩数（例如每人可分得3亩），凡合乎此标准者为中农，超过此标准者为富农，不足者为贫农。过去我们在白区做农村调查时亦曾做过类似的分类法（根据田地产量与农民一般生活标准求出维持一个农民的普通生活所必须的田亩数），我深知此种分类法有极大毛病。因为用这方法求出的田亩数只是一条线（如3亩），即使你把此线拉宽些，也只能成为一条带（如3亩~4亩或5亩），刚刚在这线或带上的（即中农）总是少数，在这线或带以上和以下的，总是超过了富农和贫农的实际数。用此种统计方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上的假设是可以的，例如知道某一地区内有地5亩以下者多少农户，5亩~10亩者多少，10亩~20亩者多少，20亩~30亩者多少等等……便可知道此一地区农户分化之大概情况。但若用此方法去决定每一



具体农户的阶级分类，则必然会错误百出，使贫农特别是富农户数远超过了实际存在的数字，即是把一部分中农也划入富农类中去了。富、中、贫农之间的阶级划分不是简单的数字上的差别，而是有严格的本质上的差别的。根据列宁说法，贫农是乡村中的半无产者，即被剥削者，富农是农村中的资本家，他的经营基本上是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剥削上的，但自己也参与生产。不过在中国，由于半封建社会特性，往往富农经济不建筑在雇佣劳动剥削上，而建筑在地租剥削上。至于中农则是较复杂的一种社会等级。列宁认为：“按经济含义来说，应把‘中农’了解为这样一些小农人，这些农人按所有权或租佃权而占有也是一块不大的土地。但终究是这样一块土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是不仅使他可以勉强维持家庭和产业，而且有可能得到某些能够——至少在好年份——变为资本的剩余；这些农人是很时常雇佣别人劳动力的……”（列宁在共产国际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演讲）显然，中农在资本主义不发展的中国，得到某些剩余以转为资本的可能是较小的，然而在原则上，列宁也允许这样的中农很时常雇佣个别劳动力（但基本上是自耕的），而且能有些积蓄。由于列宁所指出的农业一般比工业落后的缘故，特别是在落后的中国农村中，“中农是有较坚固的经济基础的”，属于这一阶层的农民是较多的；亦由于同一理由，富农应是较少的。一般说，中农在中国乡村中，终占人口 30% 以上，即 1/3 以上，而富农人口一般不会超过 5%。但据最近各地献田的情形来说，中农往往被当作富农而献出了田。如我们驻地夏圩乡 637 户中，献田者有 108 户，占 17% 左右。又如 8 月 12 日新华报所载涟水王集区四庄、花朱两个村中富农献田的消息说：两村 300 余人的农民大会上 28 家富农和 9 家富裕中农



献出了田地，有 81 家贫苦农户分到了田地。我们不知道这两个村的总户口多少，但富农（28 户）占贫苦农户（81 户）的 35% 左右，富农和富裕中农（37 户）占贫苦农户（此中包括贫农、雇农）的 46% 左右，即半数左右。若中国农村中的富农有如此多，我们早可庆祝革命成功，亦不会再有什么农村破产之类的话了。因此，我虽未经实地调查，但也大胆武断一句说，这 28 户富农和 9 户富裕中农一定有不少是被我们的干部“官升一级”了。特别是在分局几次指示中三令五申严厉警告干部勿把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之后，更使此种升级成了普遍现象；而由于此种升级便造成了一种假相，认为侵犯中农利益仅是个别现象而已。

四、平分土地政策必然会造成普遍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

由于我不了解全面情况，不敢断言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到底普遍到什么程度。然而只要力求其平的平分土地政策被执行着，那么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一定很普遍，也可以说，凡是地主少自耕农多的地方，中农的利益一定会被侵犯的。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不侵犯到中农利益，就无法力求其平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例如最近从淮北来的蓝东同志即曾告诉我如下材料：她原在淮北参加泗阳西邵乡的群众工作，她这一个乡在第一次布置土地改革工作时，因根据不得侵犯中农利益的原则，不曾要中农献出田；但到发动的前一晚忽接上级指示，说要拉平，于是临时又重新布置。而根据全乡人口和田亩数统计结果，知道如不动中农田地，就无法拉平。那时支部认为拉



平的原则更重要于照顾中农，于是就决定要中农也把田献出。据说，淮阴市及淮阴县也是因为地少人多，而使中农“自动”把田献出了一部。华中有很多地方是小自耕农经济，而各地力求其平的分田政策似乎掌握很紧。因此，我估计中农利益的被侵犯一定很普遍。

五、富农的田是否应献出

以上我所提出的是中农献田的问题。如果中农的利益已普遍被侵犯，则富农的田当然已被献出了；而且有不少的田是被斗出来的，被斗结果，所留土地比自动献田者留得更少。但富农的田是否应该献出呢？关于对富农的态度，中央指示中也说得很明确：“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即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影响解放区生产。”据我了解，中央此一文件所指出的方针是保存富农的自耕地，至于出租的田地可清算出一部分，但不能打击太重，因为要把地主与富农分别看待。我认为中央此方针是完全对的。因为今天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因此，我们只能削弱或取消富农的封建部分的剥削——出租部分土地，而保留其自耕部分。特别在老解放区，许多富农是在我新民主政府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前两年刚提倡吴满有方向，奖励劳动英雄，而今天便要他把超过平均数以上的地献出，甚至斗他，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在人情上也讲不过去，更不要说与党的政策、与革命的战略目标不符合了。淮南劳动英雄张性道，在前年劳



英会上得过奖，今天的献田会上却要他拿出田来。提拔他，奖励他，使他上升为富农的是共产党；打击他，削弱他，使他又跌下去的仍是共产党。反动派说共产党反面无情靠不得，而我们此种政策正使反动派得到了求之不得的好材料。

六、自耕农区域不侵犯中富农利益、贫雇农得不到好处、群众运动发动不起来的问题

据说，主张平分土地的主要理由是：在地少人多的自耕农区，如不主张平分，不侵犯中、富农利益，则贫雇农得不到好处，群众发动不起来。我们且不说这种得罪两个人讨好两个人的办法在策略观点上是否聪明，被讨好的两个人是否会被发动起来。我觉得这样说法，在思想方法上，在对于土地改革的基本意义的了解上是大有毛病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土地改革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目的是彻底铲除封建剥削，这是革命的战略问题，而非革命的策略问题。虽则土地改革问题如被正确解决，对发动群众有决定作用，因此是起有策略作用的，但解决土地问题，铲除封建残余，基本上是革命任务问题，是战略问题。策略随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随时变化，战略则在整个革命阶段中不变的。如某处没有出租田的地主，无依靠封建剥削为生的阶级，就没有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对象，我们就不能硬去制造一个，更不能误友为敌，把革命提升一个阶段，把革命的同盟者（在民主革命中富农基本上仍是同盟者）当作革命对象去反对。若说不如此发动不起群众来，那更是不对。这不是表示群众观念的强，而是表示自己对于为群众谋利益和发动群众之无能。因为这些同志觉得，只有分田地给农民（过去是减



租)才能替农民谋利益,才能发动群众。作这样想法的人无异是自认一朝土地分完了,他就不能再替群众谋利益,再不能发动群众了。列宁就曾经教育过这样的同志。列宁在联共八次大会上演说中,在讲了团结中农和争取中农的必要以后,他就提出了如何为中农谋福利的办法。他说:“我们还没有什么物质福利可以给中农,而中农却是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具体福利,而这种福利是我们现在还拿不出来的,而且国家也许还要在没有这些福利的情况下度过那些在现时已表明有完全胜利希望的艰难斗争月份(作者注,当时正在内战时期,土地分配已毕)。可是在我们的行政实践中能做出很多事情来:改善我们的机关,纠正大批滥用职权的现象。”我们有许多同志就认为,如果没有具体的物质福利就不能为群众做任何事,因此,就只好在减租或分地的办法上打圈子。如无租可减无地可分,或已实行减租分地之后,便无事可做,或者只好要求政府掏腰包,希望财政部门或银行公营商店来救济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条件比列宁时代好多了。我们除减租分地以外,也还有不少物质福利可给群众,如兴水利,发展生产,办学校卫生事业等;至于改善机关,纠正滥用职权,我们可做的事更多。例如我初到乡下的10多天中,我住的这家老百姓翁媳二人几乎每天终有一人要去开会。那时正在收稻头。老头天天向我发牢骚,说开会荒了他的事,不开会又怕受罚。他说往年二三天就可把稻头收下来,今年十来天尚未收完。这几天刚收完又天天下雨,稻头在场上发芽。据说他家里要糟蹋一担粮食(共收八九担)。他说,如果早几天不因开会误工,就不致损失这许多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多替老百姓想想呢?这正与他们分田侵犯中农利益一样,一半是因于幼稚,一半是因



于他们把对党负责、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这两件事对立起来看了。他们的群众观念在事实上是不完整的。

七、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方式问题

分局6月28日信中曾批评土地改革运动中因袭过去算账运动的错误观念，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得到土地，如果地主把地拿出来，那就不必斗争，如果不肯把地拿出来，我们就要与他斗争，算账也好，退租也好，没收也好。如无账可算，则采取任何其他方式都可以，目的总要把地拿出来，否则就不答应他。”我们的目的在使农民得到土地，这话在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我觉得我们不能说实行土地改革可以不择手段，不考虑方式。因为中央提出用现今的方式来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用内战时的无条件没收办法，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策略方针；而所谓策略也就是组织群众进行革命的方式方法问题。如果说可以不择手段，不管方式，那我们就干脆由政府下令没收好了。这样做我们原来便有十二分理由的。“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口号本身便有着十二分充分的理由。我们今天不如此做而用算账说服等等方法来达到“耕者有其田”，不是因为我们的理由不充分而是在于找一个更好、更合“人情”（当然是旧社会的人情）亦即更策略的方式来实行这伟大的事业。而现在因为没有账亦要算账，于是有些算账理由往往变成强词夺理。例如在我驻地附近的一个斗争会上，曾有一个人上去说：“去年我在集上给你提过一次菜，你未给我报酬，今天应算还我。”我认为这样斗法，不如干脆宣布没收。因为这样的“理由”正是反把一个有十二分理由的伟大的光明磊落的革命事业（实行耕者有其田），说成为



毫无理由的事情了。这是多笨多不策略呀！

我觉得一切策略的最伟大最巧妙处，是在于如何用最巧妙的方法组织、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性，争取更多的同盟军，而同时又要麻痹敌人，减低敌人的抵抗。因此，我认为斗争会上许多侮辱对方人格，如吃粪、戴高帽子、游街等，除了真有广大群众热情拥护，以对付少数万人痛骂的恶霸以外，一般的我觉得不要采用。但现在有些干部却是把这些方式作为刺激群众运动的一种法宝而加以采用。我在清江就曾见过这样的一个游行，一个老头（据说是工头）戴着高帽子，被捆着手在前走，后面是数十个打锣鼓拿着纸旗子、阴阳怪气跟着走的群众。过路的人无精打采地瞟一下，或瞟也不瞟，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我看了这样的游行有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此种游行（或类此方式）对群众运动是得不偿失的。

听说中央正在考虑对无账可算的地主地将用发公债收买的办法。我是十二分的赞成此举的。1934年我与位老讨论到中国革命的转变前途时，我就提出过发公债加上通货膨胀的这个办法。这样的公债，我们在10年20年以后，就是加厚利归还也是负担得起的，而这办法是比强词夺理的斗争好多了。

八、我的结论

根据以上意见，我提出以下具体办法：（1）立即通知各地停止平分政策；（2）已平分之中富农自耕田，一律发还，对于先分到田现在又须退出的贫雇农，为照顾其情绪，可由银行以农贷或其他方式来照顾他；（3）中富农出租的田，一般的要他



们拿出来，但为避免打击过重，仍可允其收回一部自耕；（4）分局集中一批能力强的干部检查此工作。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作为一个党员既有这些意见，不能不向组织提出。据分局最后两封指示信的精神而论，分局所反对的是“害怕均产思想”，把“富农当中农”的右倾，是惟恐右而不怕左的精神，我却认为此精神是助长了下面的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的。我的意见可能错误，但我个人希望分局能讨论我的意见，并给我指示。我更要求分局不论同意我的意见与否，把我此信转与华东局。

敬礼！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

瑞龙同志并请即转分局各同志：

最近我才在六地委看到 9 月 1 日分局关于团结中农的指示。我对指示中中农的部分基本上是同意的；但对中农定义中仅指出“平常年成不亏空，够吃够穿”，我觉得还是不够的。因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中，都可以证明，中农不仅在“平常年成不亏空，够吃够穿”，而且还可能有某些积蓄，以致于上升为富农。如果这种积蓄和上升在顽占区是稍有的、偶然的現象，那么在我们解放区，这应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吴满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我觉得，如果不如此说明，我们下面干部就很可能把稍有积蓄的中农算作富农，而使农村中省吃省穿、勤俭起家的良好作风，一律被看作是富农剥削行为（富农与剥削者本是同意语）。

其次，指示中规定侵犯中农的土地主要须靠加收的一成公粮来赔偿。但据我估计，这一成公粮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据淮阴夏圩乡的调查材料，中富农的自耕田地献出 1 513.3 亩。又据我们了解这些献田户中只有 4 户雇长工，可称作富农。即使把某些雇短工的亦作富农算，这 1 513.3 亩田地中，至少有

* 作者于 1946 年 10 月 25 日给刘瑞龙同志的信。



1 000亩是中农献出的。再退一步讲，夏圩乡可能是例外的情形（自耕农特别多）。我们平均以每乡被侵犯中农田地作200亩计（这是最小估计），仅淮海1 000多乡至少有20多万亩。每亩代价以3石小麦计则须60万石小麦，每石以150斤计，须9 000万斤小麦，淮海一年两季公粮全部赔偿还不够。这是值得考虑的。

至于指示中关于富农的部分，我在基本原则，仍有些想不通的地方。因为不仅指示中第三节，在原则上允许富农“自耕土地，必要时亦须拿出一部”，而且指示第七篇中更具体规定“在土地改革拖延迟缓地区……政策上可采取……两头平（地主富农、贫农雇农拉平）的办法”。若根据此原则去实行，例如，我们克复七分区以后，切实执行这个两头平的政策，则富农自耕土地决不仅仅是“必要时亦须拿出一部”而已，而且必然会一律划到与中农相平，甚至比中农所有地还少（在自耕农占多数地区）。结果必然会使得我们的土地改革变成同时向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富农两面开刀。我想这是不是会把革命的题目弄错了呢？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呢？

瑞龙同志在《华中通讯》第8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也强调“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土地应当彻底平分，力求拉平”的原则（整个第8期华中通讯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以及9月16日新华日报巩固团结中农的社论，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纠正了平分中农田地的倾向，但认为平分富农田地是必须的）。瑞龙同志文章也驳斥了借口妨碍农业生产而反对土地改革的谬论。此种谬论在中国是连表面的理由亦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地主向来是以从事封建性的租佃剥削为主的，经营地主更是凤毛麟角。因此，中国的农业经营向来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土地改革只是



变更了所有权，而未变更使用权，并未分散农民经营面积。这与西欧土地改革中拆散地主的大经营，因而授地主代言人以似是而非的反对土地改革的借口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我觉得平分富农自耕田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削弱了富农经济的问题（仅此一点，在经济的意义来说，还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会影响到中农的生产情绪。因为中农看到苦吃苦做、勤耕劳作没有多大意思，再向上爬，反被拉下来，连中农地位都保不住了。这与我们过去的吴满有运动的精神是大相矛盾的。而中农的生产情绪低落之后，即将影响及整个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因为诚如分局“九一”指示所说，中农生产方式“在解放区最为普遍……中农生产积极与否，对整个解放区经济有决定影响……中农生产情绪降低，解放区经济无疑要遭受极大打击”。据我所知，说土地改革后影响农业生产，主要是指侵犯中富农利益而言，在我觉得这也并非没有理由。

在这里，我又想引一下洋经典了。当苏联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以后，托派曾说，这是托洛茨基早已经提出过的呀！斯大林只是实行了托所早提出过的纲领罢了！当时联共中央，可能即是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中曾指出，当初托派所提纲领不仅本质上与联共后来所实行的有基本差别（托派是一般的不信任农民力量，主张侵犯所有农民的利益），而且根本是时期不同，情况改变了。没有工业发展，没有五年计划，就没有乡村的全盘集体化；而没有后者，就不能消灭富农阶级。因为富农所生产的粮食没有集体农场所代替供给，取消了富农经济就要使社会发生粮食恐慌。斯大林认为消灭富农阶级是与农业的全盘集体化以及消灭一般的阶级划分是不能分开的，而这一切是社会主义革命完成时期的任务。因



此，消灭富农阶级若在五年计划以前提出便是不正确的了。如果我们彻底实行了平分富农土地，那么在基本上也等于实行了消灭富农阶级。但我们今天的革命不仅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连土地私有制也未根本取消呀！当然，中国革命不能用苏联的情形来作机械的比较的。然而，这只能说明一点，即是我们处理问题，也即一般的处理资本主义剥削问题时，应比苏联更慎重些。

分局负责同志都是亲身领导过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的，对于当初我党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因对富农的政策过“左”而遭受的损失，当然是体会得很深刻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段是值得我们今天参考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与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与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富农以至中小地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或反对这些思想的……它们（左倾路线）都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反对富农。”

今天的中国革命还没有脱离新民主主义阶段是没有问题的了，然而是否“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是很广泛的”呢？我想不仅是的，而且在最近不仅很广泛，而且更靠近我们了。那么，我们在这时候，对这些中间阶层，尤其对富农不仅不进一步的去争取，而且反加强对他们的进攻是否应



该的呢？是否策略呢？对此问题，我想了很久。我总觉得分局对富农的平分政策是值得考虑的。平分富农土地的惟一理由便是从发动群众的观点着想，但这从革命的战略观点来看都是不妥当的，对此，我在前信已详细说过，不再重复。

最后，我觉得分局以下各级党委对下面干部执行土地改革中有缺点或有不同意见时，不要轻易从干部出身成分上去批评检讨。固然，很多干部的地主富农的出身很可能影响到某一党委或地区的土地改革的深入，然而这种影响很可能是不自觉的，亦可能另有客观原因，或上级决定中本身尚有不尽妥善的地方。更主要的是即使确是干部的成分影响到了他的立场，但领导机关必须首先从思想上与他打通。我想既做共产党员，而且负有相当责任，一般的说，故意要保持地主富农的立场是不会的。若不从打通思想着手，而即检查其成分，必然使下级有意见亦不敢提。特别是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在强调审查成分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敢提意见的，因为谁愿意被上级说某人代表富农说话呢？据说，六地委对于侵犯中富农土地问题，当初也曾向分局提出过意见，后因分局曾去电六地委质问是否淮海党委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太多，影响到了土地改革之彻底执行。从此以后，他们便不仅不敢再向分局提意见，而且火上加油地向中富农进攻了。

我想这妨碍了分局获得真相，对领导是不利的。



给少奇同志的信*

少奇同志：

我们正在研究列宁主义中“方法与理论”的一章，我在读了列宁的“做什么”以后，觉得在中国党的历史上，虽不曾有过“工人事务报”派那种公开赞扬自发性，反对自觉的领导的尾巴主义观点（对理论问题）；但在陈独秀时代，在党内教育政策上，似乎轻视理论教育的倾向是有的，当时任卓宣（叶青）领导下的旅莫支部的态度就是如此的，他们反对学生学习，有人稍稍埋头读书，即赐以“学院派”的美名，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曾公开反对理论对实践的意义，但说过：“理论学习是党的领导者的任务。”（这话亦不曾公开向一般党员说过）因此，不管如何，当时机会主义者在客观上仍是妨碍了党员理论修养之提高，间接是削弱了党对群众自发运动的觉悟的领导；虽然他们似乎没有把这种错误主张公开发扬成为一种“理论体系”。不知我这意见对否？我不知道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领导者本人，对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如何？但只知道任卓宣等旅莫支部负责人的政策确是如此，学员们喜欢举中国例，故来问你，请给以答复，并致布尔什维克敬礼！

* 本文笔名宋亮，原载《论党》，1947年。



《孙冶方全集》(1—5 卷)

出版	山西经济出版社(太原市并州北路 69 号 030001 0351-4044102)
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制	山西人民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125
字数	1412 千字
印数	0001~3000 册
书号	ISBN 7-80636-219-3/F·215
定价	190.00 元(全套)